



中评周刊 | 第 89.90 合刊目录

专题 | 纪念邓小平：40 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

1. 许章润：低头致意，天地无边 | 谨以此文纪念 1978 年开启的“改革开放” P. 3
2. 盛洪：改革开放四十年，邓小平的转型智慧 P. 12
3. 特奥·索寞：邓小平应比毛泽东在历史书上占更大篇幅 P. 19
4. 张维迎：知不知，小平也 P. 30
5. 向松祚：世上再无邓小平 | 纪念小平同志开启伟大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P. 36

专题 | 基因编辑伦理审查 急待国际法规出台

1. 李珊珊：第一例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在中国可能是一种必然 P. 50
2. 福山：我们为什么担忧“基因编辑”？ P. 58
3. 张悦悦：生命科学崛起，缺乏公众有效参与的僵局何解？ P. 65
4. 韩大元：当代科技发展的宪法界限 P. 70

观点文章

1. 盛洪：如何让民营企业家相信政府？ P. 82
2. 哈耶克：开放社会的道德与封闭社会的道德 P. 89
3. 安希孟：柳暗花明又一人 | 鲁迅论个体的价值 P. 93
4. 张林：让竞争中性原则为民企保驾护航 P. 98

随笔散记

1.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 P. 100
2. 许章润：法无正念，必成恶法 P. 105
3. 金雁：唯成分论年代的经历 P. 108

读书

1. [马维：恐惧、监控与告密:秘密警察阴影下的东欧文人](#) P. 117
2. [陈彩虹：在无知中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 P. 125

预告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P. 136

[订阅](#) | [往期下载](#) P. 138

许章润：低头致意，天地无边 | 谨以此文纪念 1978 年开启的“改革开放”

[许章润 著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许章润教授为纪念“改革开放”所作三篇系列论文的第一篇，余篇将陆续刊发，中评周刊-与 FT 中文网同步首发，此为全本]



本文作者、法学家许章润教授 图片来源：中评网

1980 年代以还，中国重启大转型进程，历三十五年而未止，实为整个近代中国已然超逾一个半世纪文明大转型的有机组成部分。换言之，此番大转型，作为近代中国大转型的第三波，在“抗战”爆发导致常态转型进程中中断四十年之后，终与前此两波大转型接甬，而前赴后继，连缀构成了“现代中国”第次成长的完整历史。其之起伏跌宕，惨烈异常，而风华无边，以“改革开放”笼统，真切得很，得体得很，要命得很。也就因此，所谓“改革开放”是并且只是在这一意义上措辞，并非等同于一般的行政调整与吏治整饬，更非“部委行业重组”一类操作层面。具体而言，第三波“改革开放”起自 1978 年 12 月“三中全会”，下迄 2013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其间辗转，考其心态，审其章法，实以“向后倒退向前进”的方式，顺应这一转型大势，而致力于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有限政治开放，为这个叫做“现代中国”的庞大实体接生。从而，终究而言，意在改天换地，而势必撼天动地，未几席天幕地，终究感天动地。

看官，说是“向后倒退向前进”，就在于其间的经纬铺展和纲目排列，无他，实在不过就是在四个

维度上“低头致意”而已。下面对此逐一分梳，重在最后引导出“择善而从，昂首做人”这一主题。

一、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

首先，向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低头致意。从 1860 年代初期启动洋务自新运动以还，超逾一个半世纪里，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也就是人民公意与民族愿景，经磨历劫，渐次显豁，最终提炼定型。它们不是别的，就是追求“富强、民主与文明”，以此为一切政经活动与文化事业的鹄的。通常所谓政体变革、国家建构、经济社会开发与文教铺陈，战争与革命，悉数围绕这一轴心打转。为此，在“文明开化”这一总体框架下，标举“自由与平等”，将“法制人权”和“宽容开放”等价值，慢慢收纳入怀，力争落地生根，而于移植西洋文明中启发华夏生机，缔造现代中国及其现代文明。此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旋律，亿万同胞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虽历经跌宕，而流离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考其进程，虽屡遭打断，时见偏差，而内里脉络连绵不辍，并在历经战争与运动冲击后，终究于晚近三十多年里汇集一堂，蔚为主流，愈见其茁，而终成全民共识。

实际上，纵观一个半世纪的中国近代历史，可以看出，但凡违逆这一主旋律，昧于这一历史意识，背离这一政治意志，则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而终究为中国现代成长进程所抛弃，在激烈对垒后雨打风吹去。晚清皇族内阁拒延深化改革，玩完了；袁大头悍然称帝，立马玩完；国民党一党独大，也玩完了；“文革”式极权暴政，同样玩完了。因而，晚近三十五年里，所谓“拨乱反正”，扭转“文革”式极权，正不外醒悟到这一历史意识，回归于这一主流政治意志，而于建设现代中国的日迈月征中，向着这波大转型的最终目标而日就月将。从此迈步，磕磕碰碰，屡仆屡起，康庄大道也。否则，势必天怒人怨，而“吾与汝偕亡矣！”

故尔，从 1980 年代以还之发展经济、追求富强、修复社会与重建伦理，到此刻的政治参与意识高涨，而呼唤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在可见未来政改终究势必逐步提上议事日程，而以“立宪民主、人民共和”来最后收束，道出的是“现代中国”的成长必须解决国家建构和政治建设升级换代这一时代课题，必以开辟新局为终局。此时此刻，新局未开，则终局姗姗来迟，正面临着非先破局而后迈步开局不可的当口。当此之际，几年来，层峰不进则退，居然诉诸文革式理念与治理方式，汲汲于所谓“家业”永固，可谓昧于时势，愚不可及，而终究难以为继。同时，三十多年里，随着国民生活水准递次提升，行止出处渐求雅驯温文，伦理社会渐次恢复和公民友爱滋长发扬，展现了华夏民族追求文明仁爱的心理脉动，说明其非强势党国文化所能全然阉割得了的。凡此诸端，三十五年里，分头合击，万流归宗，演绎展示着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历史意识和强毅政治意志。

换言之，此间出现而延绵至今的十九世纪日耳曼—斯拉夫式意识形态及其变种，仅为暂时现象，进而，奠立于此的政制及其宪法，是并且只能是“过渡政体下的临时宪法”。其之消长，亦必以是否顺应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为取舍从违的准绳。眼光囿于短程，便只见其力大，一手遮天；

放眼大历史，则明了其恶盈，早已人人憎恶，实为强弩之末。从而，其之明显违逆此间历史意识，而背逆此种政治意志，遂愈发显豁，亟需于抛弃淘汰之际，最终拥抱普世价值，建立迄今为止世界文明所能开示的最佳政体。此亦无他，就是如笔者所一再申说者，现代中国的成长，需于建设“民族国家—文明立国”这一维度和层次之上，更新换代，再上层楼，引入“民主国家—自由立国”这一现代国族 2.0 版本，藉此奠立华夏文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政治大厦，而完成秦汉以还中国历史上最为宏大的这一波文明大转型。

朋友，历史脉动强劲，政治进程不可阻遏，则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与政治意志，舍此其谁欤？！

进而言之，此一面向历史意识与政治意志之低头致意，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在向全体国民，所谓亿万人民服软，被迫向千门万户的柴米油盐、婚丧嫁娶这一生存事实让步，故尔才有“改革开放”后生民稍得喘息、民生渐次复兴的欣欣景象。而此刻大家忧心忡忡，就在于担忧照此以往，伴随着“短缺经济”与“票证时代”再度回复的，是毛氏极权政治重临华夏，则民不聊生矣。就此而言，考其内里，不妨说凡此表明基于华夏文明正宗的历史理性战胜了云山雾罩的政治谵妄，屡遭压抑的新型公民理想初步获得了反抗党国意志一统独大局面的柔弱能力。今后的历史进程与政治努力，当在此低头致意之后，紧接着一个直接赋予国民选票、面向亿万国民真正低头致意的政治进程，而这也就是“公意时刻”降临，现代立宪民主政治沧桑落地，华夏邦国终成现代国族而走向政治成熟之日。吾所唤矣，而万民待矣，祖国馨香祷矣！

二、中国文化传统与文明典范

其次，向中国文化传统与文明典范低头致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古今维度，一言以蔽之，就在于逐步抛弃以“十九世纪的日耳曼—斯拉夫式意识形态”取替“中国文化传统—文明典范”的企图，回归中国文明及其典范正宗。此间基本背景在于，近代中国尝试过种种主义，实验过不少思想，西洋东洋皆有，古代现代齐至。其间，冥行擅埴，祸福相倚，一旦选择错误，则祸莫大焉。举其显例，则上述十九世纪日耳曼—斯拉夫苏俄式意识形态及其政制，不幸降临吾土，其刻薄寡恩，暴戾恣睢，祸害深巨，最为昭著。某种意义上，语嫌夸饰，不妨说此为华夏文明历经蒙元入侵、满清入主中原后的第三度蛮族入侵，而了犹未了。它们作为“中国问题”的误诊处方，危害深广，致使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实为中国近代历史中最为重大惨痛的负面事件。故尔，经此折腾后，今日中国，依旧是主义的万花筒，举凡文化民族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温文社群学说与大同共和理想，都有市场，都有活力，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其之尽力粘连古今，悉心贯通中西的用意，也愈见明显，就在于历经百多年激烈反传统思潮震荡之后，经过批判梳理后的文化传统及其文明典范的基础意义与现代价值，已然重获认同，有待持续慎思明辨而勃然发力也。

揆诸近代历史，不少拥有悠久历史与厚重文明的后发国家，也包括法国这一秉持狂飙突进方式挺

进现代的先发国族，时当现代突破初期，求存求荣，都曾经历过激烈反传统主义。风云震荡之后，痛定思痛，多半会出现向文化传统的再认同现象。就其优质层面来看，此非简单复古。毋宁，其为创造性转化后的历史自觉与文明自觉，亦甚显明。职是之故，不难理解，迄而至今，几番挑拣，为何吾国官民一体，向孔孟正义多所回归，而且，其势汹涌，原是物极必反，有以然哉。这不，包括清明、端午成为法定假日，倡议立法规定孔诞为教师节，以及执政党第一把手礼拜孔庙，再三致意，凡此种种，在在意味深长也！毕竟，仁爱、理智和信义，民胞物与的人道精神、天人合一的圆融智慧、王道政治的道德张力、诗礼文教的文明范式，以及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士志于道的君子人格，本就是普世理念，也是华夏民族作息生聚的文明典范，恰与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与民主法治、人权宽容的现代价值若合符契，岂是秦制苛法与阶级斗争、专政偏锋所能轻易取代者也。是啊，它不仅表明吾族吾邦的文化意识和政治意志挣扎重回中国文明主脉之势，反视回照，即温即厉，而且，期期于作育更张，更上层楼。曾几何时，“中国传统文化”蔚为贬义，备受摧残，却转而复兴有像，证明那个十九世纪的日耳曼—斯拉夫意识形态早已破产矣！就此而言，原教旨毛左申言必须防范“以儒代马”，确也触及了时事痛点，噫嘻。

不过，话说回头，当此之际，泥沙俱下，必须严予分辨。文化传统是活的，而传统文化可能是死的，或者，不少皆为糟粕。所当致意而转化的是文化传统，而非化石般的传统遗存。既为化石，就已无法转化，因而，所当致力体悟传承而发扬光大者，毋宁，乃文化传统与文明典范也。进而言之，且不说所谓“中国文化传统”非止儒学一脉，其文明典范更非儒义所能垄断，即就当下世道人心而言，任何一种学说思想，特别是类如新儒学这类希冀有所作为的庞大思想体系，乃至一切醉心于也似乎必须致力于修齐治平的意识形态，倘欲真切有所作为，都至少不得不面对下述四项重大考验，而检验其德性，表明其成色，落定其功效。

第一，无法回避对于权力的态度，而必得在道势两端取舍，于德位之间从违。尤当公权恣肆缺德之际，总不能做缩头乌龟，甚至于反而唯唯诺诺，响应风从；第二，必得正视社会苦难，包括面对恶政腐败之不公不义而慨然回应，发挥社会批判效能；第三，勇敢而深切地关注人性之恶及其政制形态，绝不能视而不见，集体失声，却袖手谈心性，逍遥扮鸵鸟；第四，最后但并非无关紧要的是，在回应与解决上述问题之际，对于程序和方式的选择，有关程序理性与正当程序的思考设计，其之是否切应贴合，有无目的与方法的背反之虞等等，展现审慎的方法论思考与深切的道德紧张。

综此四端，不妨说了无新儒学的声音，现今中国的这拨新儒家大多不合格。其之信誓旦旦，要么缅怀曾有的儒门阔绰，继续徜徉于悲情叙事，汲汲于恢复往昔的思想中心地位，而无视其之面对现实之苍白孱弱，早无解释迎应之力。因而，此番作业，无异于以学术公器谋取一己之私，迹近笑话。要么奴颜媚骨，佯论“只要尊孔，就当合作”，彻底放弃价值判断与道德立场，进而不明所以地礼赞领袖，公然为威权放歌，无视政体转型尚未完工与近年国族整体局势逆转之严峻，大言不惭“终于迎来了最好的时光！”经此仿佛一拍即合，在在暴露了千年延续的无骨市侩吃教陋儒本相。若说“判教”——现时

代条件下，新儒学居然祭如刀锋的一个谵妄念头——则此脉者流，恰恰了无原典儒义之刚健正大，违连了以德抗位的圣人之教。再者，在此作业过程中，不是将儒学儒义当作理性领域，却奉之如教义，概为其心智缺陷所在，而根本背离了儒义本当蕴含的启蒙意义。近年新儒学中人与倡言威权政治的“新左派”和“毛左二代”颇多勾肩搭背，你依我依，似乎于此可以找到部分答案。至于坐无坐相，站无站相，满嘴污秽，面对一介小吏便懦弱不堪，眼前蝇头小利顿时蠢蠢欲动，还敢以儒门中人自居，面对“文质彬彬，而后君子”古训，真不知怎就能毫无无地自容之压力。

三、普遍人性

再次，向普遍人性低头致意。所谓人性，起于人类之为自然存在，诚如夫子自道，食色性也。进言之，以一己为中心，而以人类为同胞，争求温饱，享受情色，厮守爱情，免于冻馁，免于恐惧，免于无家可归，岂非人性之常，莫非人世之福，而为天之经也，地之义哉。由此往上，作育德性伦理，涵养规范伦理。进而，循此前行，追求自由，力争平等，造就美好人世与伟大社会。——凡此种种，道尽了求存求荣的人性本根，蔚为人性之必然和人生之本然，而不得不引导出有关于此的道德议题，无法回避基于人性的政治纠葛。

正是在此，置身现代立论，无论着眼发生论，还是基于生存论，政体是因应人性而来的政治设置，而政治不过是合众共处的和平哲学，以分享自由为德性，因而不得违连人性，却又规范人性，总是铁则。政治不及，需要行政与治安；政治失败，乃有战争。故尔，若果政治蔑视人性，必致残害人生，早为东西历史所一再证明，更为二十世纪中叶以还吾国吾族三十年的血雨腥风所再次佐证。——干什么，都不能与人性对着干，这是晚近七十年历史最为深重的教训，而无所谓“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就此不难理解，回看晚近三十多年，这叫做中国的十三万万子民的浩瀚家园，其苦斗，其挣扎，其劳生息死，不就正在于向着逐步承认普遍人性而非只是阶级性，承认人性的自私与幽暗，承认人性自私的合理性以及利他的必要性这一方向，一步一步地蹒跚前行吗！而前行恰恰意味着回归，落定于人性之常。灵肉之间，人命危浅，人命之花就系在这人性之常的枝头，深植于亿万生灵所汇聚的人世之根。生死两头，虽说“欲动情胜，利害相攻”，可人就是这么个物种，所谓“早知世界由心造，无奈悲欢触绪来”，没辙！——朋友，常识源于漫长人世累积，极高明而道中庸，于人于事，最为要害，于此可证，于今可证，在在为证也！

此间堪为要害而得引申的，不外私产之不可侵犯与自由之天经地义。无论是以国民财富的创造传布、分配消费最大化为目的的货殖经济，还是追求平等尊重与幸福生活的自由权利，包括公民横向联合方式的自主选择及其天经地义，悉均深植于人性之自保自强，而善自发育，进而涵养出社会政治目标与社会政治设置。它们不仅展现了人性的洪荒伟力，也是对于人性惟危之深度怵惕，表明的是人性之浩远深邃及其无可奈何。就此而言，尊重私产而赋予私产以神圣不可侵犯之位格，一如尊重公民自

由，营造共和国的共同自由，才可能祛邪匡正，就是尊重人性，也就是在保育涵养正派人生。反之，则为蔑视人性，践踏常理常情，在在反人类也。——党国垄断一切之际，小民百姓讨生活过日子，连家居生计、一砖一瓦都难能长久预期，朝不保夕，时刻惴惴不安，还谈什么涵养人性，而保育人生者也！？

由此可见，人之生物本性、市民属性与政治天性，以及兼具道德理想的超越灵性，凡此四端，构成了普遍人性的基本面相。自然身躯与理性造物，于此汇融；世俗欲求和自由追求，在此激荡。由此而人性生机勃勃，基此而人生轰隆创造。故尔，承认人性就意味着对于它们的全体尊重，而这恰是人类理性的判断力所在，也是一种道德的优美与真理的德性。正是在此，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于生物本性、市民属性两项多所认同，渐次宽容，而于后两项则迟迟不肯正视，甚至于多所打压，近几年更是打压加剧。后述两项非他，其实不过就是政治参与的天性与精神信仰自由的灵性，表现为结社自由、公民示威游行权利、政治参与和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现实政治诸端，虽有《宪法》明文规定，却未能兑现，正说明刻下中国政制尚未跨过现代政治门槛，而民情积压，蓄势待发，则势者时也，有待深怀怵惕中而接续努力者也。大转型“历史三峡”两百年，所谓“临门一脚、最后一役”，其枢机在此，其机运亦在此矣。

四、大西洋文明时代的世界体系

最后，向英美主导的大西洋文明时代的世界体系低头致意。现代文明秩序，萌发于17世纪以还的地中海文明，繁盛于19世纪中晚期登场的大西洋文明，迄而至今，赅赅乎三四世纪矣！而有模有样，也就是一两百年的事儿。此前的古典枢纽文明，东西南北，各表一枝；所谓现代文明，为地中海北岸抢得先机，发为嚆矢，再接续以大西洋文明。近代中国的大转型，包括晚近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恰巧发生在英美横跨大西洋合纵连横，盎格鲁-撒克逊国族逐渐称霸地球这一时段。它们在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什么经验理性逻辑理性，什么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什么自然法普通法，裹挟带动着全球颠儿屁颠儿的。一两百年下来，所形所塑，至再至三，不过就是上述大西洋文明时代。由此形成的世界体系，统治地球超过一个半世纪，于今虽现衰象，却依然蔚为霸主。整体而言，人类尚未走出大西洋文明体系。因此，若说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首推还是跨大西洋联盟的欧美协调，其次才是中美关系。——顺说一句，说中国晚近三十多年的经济成长与社会进步得力于美者甚多，如同其大量借力于港台、日本的投资和技术，后者亦且于此获利于中国的廉价劳力与市场开放，两方情形，均于据可考，当致谢再三。就美利坚帝国持续展示的大国繁华与民主盛景，所予吾族吾国的道德冲击和典范想象，特别是“接触”政策释放的宽和氛围，进而促进了“借开放而改革”的中国现代历史进程来看，怎么说也不过分。至于1945年“抗战”结束后拉扯吾国一跃而为“世界五强”，其相濡以沫的情谊，更当铭记于心，载记于史。但是，僥言晚近三十年美国“重建了中国”（we rebuilt China），似乎无视华夏亿万百姓胼手胝足、含辛茹苦与冲天创造，如副“伯理玺天德”彭斯所论，则大言不惭，贪天之

功，纯为扯淡也。

回头一看，中国 1860 年代启动“改革开放”，晚近三十多年的“第三波改革开放”，不管明里暗里，均以汇入此一世界体系为务，而孜孜于“与世界接轨”，免于“开除球籍”。而且，究其实质，还真的就是藉此进入世界历史进程，而汹涌澎湃矣。接什么轨？其实就是向大西洋文明主导的世界体系低头致意，以向曾经的侵略者学习而自救，于自新更张中汇入这一体系，进图文明复兴。此间心路历程，既是无奈，也是识时务，更是择善而从。在此，反帝反殖反霸也好，接轨接管接洽也罢，正反合，不离主题。到如今，这大西洋文明时代似乎为仿佛正在冉冉升腾的太平洋文明时代所取代，更升级换代，进境至三洋互动、五洲震荡的新版本，则小小寰球，不同此凉热，见证了盛衰兴亡，印证着河东河西，而向时间再奉上一阙赞辞也！

所谓三洋互动，就是印太格局初现，“民主国家联盟”发力，而发轫之轴心仍在大西洋，更早已深入亚洲腹地与远东海疆，这才三洋连缀一体，于文野之战与古今之变中，更叠加上海陆之争与中美之争。凡此四端，如笔者将在“自由主义的五场战争”一文中所述，它们既是合纵连横的国家理性使然，演绎的是权势重组时刻大国争锋的国家间政治，也是民主体系的道德理想驱策的结果，表明了立宪民主蔚为政治高位之际价值理性之不可折辱。值此情形，无论实然还是应然，中国的基本姿态不是另起炉灶，其内在心态亦非希冀根本替换既有体系。说真的，此时此刻，倘论以“中国方案”解决世界问题，什么“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吾国吾族，既无此本钱，也无此必要，不自量力器器然，势必陷入毛氏虚幻全球憧憬而实为“帝国情节”陷阱，为沉重“帝国负担”所害。一个不能善待国民、亿万人连一张选票也无的国度，有什么方案不方案的，谈什么方向不方向的。毋宁，仍需“低头致意”，将政治高位那一套悉数学习到手，则天宽地宽。此非策略，更非什么战略，而是中国以大转型未竟之身，仍需完成现代事业，然后才能再作他图之现实使然。尤其是优良政体未立，时时维稳，处处捉襟见肘，一切难以伸展，若果因为内政不修，却搅合于国家间政治而再次中断历史政治进程，则祸延千古，罪莫大焉。说一千道一万，中国必须翻过“现代”及其“现代政治”这道坎，在此进程中超克其野蛮性，才有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进而为世界人类展现普世人生的地方智慧。此间转折，千言万语，绝非什么“反现代的现代性”之流所能讨巧卖乖者也，更非其所能转移搪塞者也。

揆诸历史，如同近代曾经发生过的大规模种族奴役与大屠杀，“日耳曼—斯拉夫”式意识形态及其极权政制，恰为此野蛮性之所在，而中国晚近三十多年与世界融合的现代进程及其拨乱反正，正在于摆脱洗涤此野蛮性，努力于反思更张中求得超克。所谓邓氏路线，起点在此，不过如此。这才动用了包括儒学儒义在内的各种可能思想资源，而不问“白猫黑猫”矣。经此转折，达臻前述转型重点，则对于政权存亡的担忧不复存在，而维持政府稳定有效运作的公共政策掂量必然走上前台。——朋友，但凡转型落定的常态国家，只有政府危机而无政权危机；否则，便是政府强固，而政权危殆，提心吊胆中惶惶不可终日，临了只能以“绝不作末代皇帝”自我充值，打肿脸充胖子，硬撑。这哪里谈得上长治久

安，更不用说什么永久和平。再者，权势转移与体系更替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端看国族智慧能否率先触及未知，引领文明潮头，造福良善人生，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有效促进永久和平，在为国族增益之际造福全球人类。否则，以强力政治硬性介入，甚至于诉诸蛮力政治，为那个啥而啥，不啻白日做梦，而劳民伤财，内外交迫，自取其辱矣。同样在此，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此守成大国遭临新兴大国成长挑战之际，特朗普老白男式的认知失调性歇斯底里，以霸道姿态对付世界，而以巨婴心态修理他国，动不动一甩手了事，导致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摇摇欲坠，透支的是历经百年方始奠定的美利坚信用体系与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德性权威，并给正在向民主政治蹒跚迈进的新兴国族以民主政治溃败的大众印象，而为全球性的民主批判浪潮添油加醋，实实在在，既不可欲，亦不可取。见不及此，而拍手鼓掌，实与红脖子们一般无二矣。

五、择善而从，昂首做人

综此四项，荦荦大端，千回万转，万世一时，构成了晚近三十五年所谓“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路，也是我华族文明历经磨劫、贞下起元的一段心路历程，惨烈而慷慨，低徊复昂扬。朋友，一切的天翻地覆，所有的恨爱情仇，万水千山，愁肠寸断，都发生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下，既构成了这一时代，并为此时代作证也。

其实，以生民为本，为生命祝福，一切围绕着人生打转，为亿万人过好日子而打拼，管他这个那个的，则低头致意，天地无边嘛！而且，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善而从，哪里是什么低头；迎头赶上，止于至善，明明是昂首做人；并驾齐驱，美美与共，这世界才是人间居所。而且，也只有奠立于富强基础之上，拥抱民主政体，修炼文明涵养，提澌人生境界，才能够挺直腰杆，真正昂首做人！在此，落笔前述主流历史意识与政治意志行文，就国族自保与生命起居所需之“富强”指标而言，吾国进步多多，亟需广布公义；就民主政治来看，民情积累，輿情汹汹，有待临门一脚；而就文明修炼提澌立论，则不妨着眼长远，日进一步。但是，不论如何，切不可固守既得利益，孜孜于一党一派之私利，视天下万物为党派的囊中之物，做万年专政之南柯美梦，而不顾苍生痛痒，与天下对着干。否则，必灰头土脸，死路一条也！

邓公当年喟言：不走“改革开放”这条路，无论走什么路，都是死路一条，正为此预作陈词矣！

前文屡现“晚近三十五年”或者“三十多年”这类表述，就在于最近五年间政道逐渐逆转，治道宽严张弛失据，背离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与政治意志，也不再“低头致意”，却多所回归毛氏极权，从而致令大家深感难以昂首做人。岂惟不进则退，更且倒行逆施，致使威权政治向极权政治大幅回归，“文革”那一套做派借尸还魂，而亿万国民胆战心惊，左邻右舍惊诧莫名，早已不是昂首做人的问题了，而是还能不能安生苟活的问题了。故尔，这第三波“改革开放”大转型，不过三十五年，下迄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其实就已终结；至十九大全面树立个人权威与领袖崇拜，特别是 2108 年 3 月

11日“修宪”废止元首政治任期制，等于宣判其死刑矣。此时此刻，历史进程蓄势待发，正有待启动“第四波改革开放”，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大转型也。至少，先回到邓小平，回到“十八大”，重申彻底否定“文革”，断然切割前后三十年，以扳回全民信任，再作他图。非如此，置身世界，总为异数，无法真正昂首跻身文明国族行列，可谓无端烦恼，自找麻烦。当此时段，恰如“风波”至“南巡”间的过渡期，熬人而焦灼，期待却忐忑，切切有待“新南巡”登场。大家对此心驰神往，却因现实情势不进则退而心慌意乱，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朋友，以中国之体制与国民之忍受，中美贸易之争本不至于造成如此风浪，可因着人心向背，致令信心不再，这才导致如此局面也。信心，还是信心，来自政体是否有德有方，尤在是否兼具价值理性的感召力量，其之表现为宪制安排，端看是否兼具基于公意的“政权的永久正当性”，而非仅只“政府的周期合法性”，则一切指向的还是那个中国必须翻过现代政治这道坎方能昂首做人这一浩瀚主题也。迄而至今，终于顾忌经济下滑的严峻，而向民企喊话连连，甚至连“自己人”这种看似江湖帮会用语、而实含阶级政治阵营划分意味的修辞都用上了，可大家就是不信，压根儿不信，就在于政体毫无转型诚意，连姿态也无，却动不动重祭1848年那份骇世文献这类令人恐怖的“初心”，则大家惶恐还来不及，哪来信心！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柯斯汀侯爵（Marquis de Custine）以对于沙俄专制政体的深切观察明世。当其时，浩瀚国度，广袤大地，苦难深远，而人民蒙昧，令这位侯爵不禁喟言，彼土彼水，“君王与臣民同醺共醉于暴政的酒杯……暴政乃民众亲制的工艺，非只独夫的杰作矣。”（Sovereigns and subjects become intoxicated together at the cup of tyranny... . Tyranny is the handiwork of nations, not the masterpiece of a single man.）。伸行其言，中国今日情形，不仅是历史进步遭遇政制倒行逆施才有以然哉，而且，实是“本届人民不行”使然，所以然哉。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此而言，你我他，男与女，咱全国老爷们，吾亿万万血肉同胞，置此邦国，值此时代，遭逢当下，均难逃其责，亦难辞其咎，呜呼！

2015年春草稿，2018年11月30日定稿，于清华无斋

[【返回目录】](#)

盛洪：改革开放四十年，邓小平的转型智慧 | 在 2014 年 9 月 11 日《邓小平与今日中国》研讨会上的演讲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经济学家。本文首发于中评周刊，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经济学家盛洪

他是一个凡人

今天还是应该将邓小平作为一个凡人来看待。凡人就有优点、有缺点，有成就、有错误，放在这个位置上，才可以比较冷静地来评价一个人。当然，对他的错误要批评，但是对一个凡人也不要期待太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还是高度评价邓小平。

应该说，邓小平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推动中国转到使人民幸福和国家繁荣的方向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邓小平改革了中国的基本宪政原则

首先，其实邓小平所有的改革，并不是在技术层面的改革，而是宪政原则的改革。谈到宪政，可能很多人认为宪政改革要有一个宪政改革的宣言，或者有很多重大的修法行为。其实“宪政”的含义，即

“宪政主义”这个词，是包含“基本原则”意义的词。在现代国家中，所谓宪政国家未必有一部成文宪法，比如英国就是如此。

所谓宪政原则，就是在社会中普遍认同的基本原则。回头看一下邓小平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发生了重大变化。

邓小平有一句名言，看起来是一句俗语，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宪政原则——“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一个原则是用来解构毛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这很重要。过去毛的意识形态系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对社会所有行为全用这样一套意识形态的话语判断，不管这种行为和政策是否对百姓富裕和社会繁荣会产生正面还是负面影响。所以也能看到在邓小平的改革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阻力。一个最重要的阻力，实际上是原来的那些话语体系，包括“姓社姓资”，包括“是不是变了颜色”，这些说法都是毛泽东时代当时的基本原则的一个回声。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查良镛（金庸）先生及其亲属，
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
1973年金庸小说在内地尚属禁书，
当年3月，复职后的邓小平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并对其爱不释手

比如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个电视剧中，很多当时的情境还是做了一些回放。比如在谈到包产到户的时候，曾经有过辩论。谈到包产到户时正方就说：“给我们带来了生产力的增加，农民的致

富”；反对派就说：“会出现两极分化，不几年就有人娶小老婆了”。这些话在很多记录中有，是毛泽东的原话，所有这些反对意见其实都是毛泽东的意见。邓子恢在一个自述中谈到，他在1961年晋见毛泽东时，劝毛泽东接受包产到户。他的理由是包产到户可以解决社员积极性问题，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农民生活，扭转粮食不足挨饿的局面。毛泽东立刻反驳，说“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这是原话。

所以，邓小平面对的是基本的宪政原则，即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一个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是对是错，一个社会中政府的政策是对还是错，这个基本原则的变化是非常根本的。



邓小平和孙辈玩耍

破除“政神合一”

第二，邓小平和陈云共同改变了一个规则，表现为陈云说的一句话——“毛泽东是人不是神”。这句话是非常根本的。因为在1949年以后，尤其到文革时期，其实中国政治体制是“政神合一”体制。什么是“政神合一”？就是政治领导人本人被视为神。

这个体制在世界历史中曾经出现过，比如在中国的商代，商代的君王在武丁以后就被当作神来祭祀。他被当作神祭祀，他的后代也是神。所以，商的统治者本身就是神。到后来商纣王时期就是酒池肉林，有人劝他说，如果你还这样做，老百姓就会造反；商纣王就说我有天命在身，哪个敢造反？就是他认为自己就是天生的政治领导人。还有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创造国家神道教，最高的神叫做天照大神，天照大神就是当代天皇的祖先，也就是天皇本身就是神，这也是“政神合一”。

这样一种制度带来的是灾难性的结果。商纣王被周推翻了。在周以后是政神分开的，周祭天，祭祖是作为配祀，周的祖先不是神，他们很清楚。在日本战败以后，当时盟军司令部有一个《神道指令》，

命令政教分离，后来写入日本宪法，所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变化，这是一种非常根本的宪政变化。

所以，到了文革以后，中共中央 1981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表示“反对个人崇拜”，这就是把陈云提出的基本原则变成了执政党的基本原则，此后没有一个中共领导人敢把自己当成神，实现了政神分开。它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认为政治领导人会犯错误，他是凡人，如果认为领导人是神，就不会犯错误，领导人就会拒绝所有批评，就会坚持错误，那么中国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



1980 年 邓小平在峨眉山

从邓小平来讲，他一直持有这个观点，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邓小平经常说，你不能把过去错误全归于毛泽东一个人，我们都有错误，“我也有错误”，他几次坦率地说这些问题，包括中苏大论战，大跃进、三面红旗等问题上，他都承担了错误。这一点他和毛泽东非常不同，毛泽东基本上是不承认错误，坚持错误。所以这一点恰恰是“政神分离”的宪政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到今天为止，哪一个中共领导人也不敢搞个人崇拜，多多少少还是要接受批评。

走向市场经济，引入平等和自愿原则

还有一个结果，既然是凡人，就不再讲那套所谓的高深莫测的理论和理论描述的理想社会，只讲现实的东西，讲自己的理性有限，所以他才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在认识论上是对的，为什么？有人批评“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完整的方案。其实一个社会本来就很复杂，一个复杂系统不可能完全被参透。个人的理性不能完全把握，也根本不能完全把握复杂系统的变化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摸着石头过河”恰恰是一种试错过程，其实人类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试错。

还有一点，就是从“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推导出来的。按照邓小平的解释，就是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和社会繁荣，邓小平强调发展经济是唯一标准，这个标准怎么实现？计划经济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市场经济可以实现，事实上就是他在肯定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基础性制度。这是基本判断标准变化后，导致走向市场经济制度，而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是一个基础性的宪政原则。

对一个社会来说，就是由政府来统治整个社会、控制和支配全部资源和所有人的制度，走向了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是什么？从经济学讲，就是政府从私人物品领域退出，把这块空间让给市场决定，其实就给了非常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老百姓自由选择的空间。

由此还有一个派生的观念，就是要看百姓是否自愿，是否接受。杜润生的回忆录和邓小平的一些说法中，都有像当时包产到户问题的类似争论，当然很多人说包产到户能够提高生产率，反对的人说要造成两极分化。最后谁也没说服谁，妥协结果是不争论，看看农民愿不愿意接受，遵循自愿原则。邓小平其实经常在各处考察和百姓交流中，就是在判断政策。一个判断的依据就是政策百姓接受不接受，是被迫接受还是自愿接受？在社会中，自愿原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如果是强制的，经济上无效率，也是不公正的。

另外，还有公平的原则。这一原则虽然在共产党内部表面上讲的很多，但实际上很少人把公平作为非常优先的原则。在讨论恢复高考是不是知青也要参加的问题上，当时考虑很多功利性目标，但是邓小平提出一点，说这是否有利于公平，我觉得他还是有这个观念的。应该说，自愿和平等这样一些在中国实际操作中不太顾及的基本原则，通过邓小平的主政和影响，也在中国产生了非常大的转变。

还有一点，就是对观念开放的影响，或者说是对我们今天讲的思想市场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毛时代，尤其是对国外各种文献、各种数据是完全封锁，对国外各个电台都是完全封锁。邓主政以后，一直在强调要开放国外这些文献进入到中国。所以他一恢复工作以后，就强调要进口外国的教科书和各种各样的书籍。其实这种做法的重要性在于，我们必须要在思想和学术上开放。

虽然到今天我们还对开放的程度不够满意，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尊重思想市场的国家，有很多限制，但是反过来和毛泽东时代对比就会发现其前进。今天很少有人公然反对我们从国外翻译一本书进来，所以邓小平的开放带来了国内相对丰富的思想资源，各种思想资源涌入到中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关键的就是在于他颠覆了毛时代的基本原则。

总体来讲，我认为邓小平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将毛时代的那套原则从根本上转变了，转变了多少？180度，是非常重大的宪政改变。

实现社会和平转型的政治智慧

邓小平在中国转型时做的事情，换一个国家可能要经历一场战争或若干场战争。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方向突然转180度，恐怕就是要有很多人流血。但邓小平在做这样的一个重大转变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基本是和平的，还包括雷颐所言，共产党基本是没有分裂。在当时实际上有很多毛时代遗存的意识形态惯性，还有很多有这种惯性的人存在。邓小平如何做到这一点，也需要讨论一下，其实反映了他在实施社会转型时的政治智慧。



退休后的邓小平在家中阅读报纸

第一点，邓小平对所谓传统意识形态解构的本事非常大。《历史转折时期的邓小平》提醒了我发现一个问题，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肯定不是公然反对。他反复讲一句话，有点儿四两拨千斤，像一个万能武器对付所有复杂武器一样，他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就把所有的所谓的理论问题都化解掉了。他在共产党内肯定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但是他可以把党内的所有的教条用这样的“实事求是”化解。刚才茅老师说邓小平读书不多，他确实读书不多，但是他却有这样的政治智慧和对语言的把握来化解那些意识形态的攻击。第二点，也是中国改革可以总结的经验，就是勒庞讲过的“所有政治家天生就是社会心理学家”，邓小平明白社会心理转变的机理。所以，在非常巨大的转变过程中，他都是每次先走一小步。比如说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一口号并不是一开始提出来的，因为一开始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然后就走到了“商品经济”，然后才走到了“市场经济”，一直走到今天，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

场制度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制度”。

可以想见这样漫长的转变过程，如果从一个转型的起点就提出一个彻底的、理想的、伟大的框架和原则，基本上就无法推动了。实际上这是人的观念和实践，和改革结果的互动。也就是当放开包产到户，有了正面的结果反馈，就实行下去，也就有更多的人去实行；当实行商品经济，发现商品经济带来很多好处。在过程中逐渐使人的思想发生转变，转变之后改革遇到的阻力相对来讲就会变小。



少年邓小平

第三点，是邓小平的实施能力。对比很多的政治领导人，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实施能力比较差。很多领导人可以通过一个很好的决议，但是并不能实施。比较突出的就是上一代的政治领导人胡温时代，我们看到的很多比较好的决议，比如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改革的决议。但最终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包括温家宝通过的两个“非公 36 条”等等，其实没有实际效用。当然，应该说跟邓时代比，胡温时代就像是罢工，现在就像是怠工，就是改革速度比较慢。如打破垄断的改革，国企改革，和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很慢。例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企改革唯一有时限的措施是“在 2020 年达到上交利润 30%”。我们都不知道，这到底难在哪。邓小平一旦认准了，就着力去推行和实施。

所以可以理解，在邓小平恢复工作短短的时间内，尤其是头两年时间做了大量的事情，立刻改变了中国面貌，包括内政上恢复高考、支持包产到户，外交上和美国建交、解决香港问题等等。应该说从个人风格来讲，他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家，他懂得区分什么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原则，什么是技术性问题。在决策时很果断。邓小平说“我拍板”，“拍板”就是果断决策。虽然有一些争议，但他可以放在一边，又能坚持原则。 ■

[【返回目录】](#)

特奥·索寞：邓小平应比毛泽东在历史书上占更大篇幅

[特奥·索寞 Theo Sommer, 德国《时代周刊》的创始人、主编, 国际关系专家。本文转载自 2016-11-15 华声在线]



特奥·索寞 Theo Sommer, 德国《时代周刊》的创始人、主编, 国际关系专家, 1975年随德国总理施密特首次出访中国, 在5次中国之行中, 3次与邓小平长谈, 作品有《中国牌》、《施密特传》等

这个画面里的人和事都上了些年纪。68岁的《时代周报》(DIE ZEIT)办公室里, 84岁的Theo Sommer先生正对我们回忆历史, 黄昏整点的连绵钟声荡进谈话之间。钟声来自一路之隔的汉堡圣雅各教堂, 它759岁了。

Theo Sommer冲我们眨眨眼睛, 用相对论打破了这种“中国记者拜访德国耄耋老者”的怀旧气氛: “我是这栋大楼里最古老的物件”, 他又指指天花板, “可我们还有楼上的施密特先生, 9月份, 他就96岁了。”

他说的是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两人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在德国广为人知, 上世纪70年代, 施密特担任西德国防部长期间, Theo Sommer任国防部第一顾问, 他也是德文版《施密特传》的作者。今天, 同为《时代周报》联合发行人的施密特, 每周来报社两三天, 两人讨论报纸内容, 施密特“会用黄色笔标出喜欢或不喜欢的段落”。诞生于二战后的《时代周报》, 文风优雅, 崇尚思辨, 主力读者群为德国精英、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在德国, Theo Sommer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媒体人, 更因亲涉政坛(1970年曾被邀出任德国联邦政府国务秘书, 后拒绝), 被视为具有洞察力的国际关系专

家。Theo Sommer 与中国的交往来自施密特。1971 年，时任国防部长的施密特敦促总理维利·勃兰特与中国建交。施密特担任总理后，于 1975 年首次访华，并在之后 30 年内十余次访问中国。Theo Sommer 曾随施密特首次访华，并在之后的中国之行中与邓小平有过 3 次长谈。

现在，Theo Sommer 在腿上摊开一张布满字迹的纸片，上面浓缩了他对邓小平和中国的个人记忆。显然，与看清今日中国相比，回忆 40 年前的历史对他来说更容易一些。



1975 年施密特访华迄今，同为“烟鬼”的施密特为邓小平点烟

回忆从 1975 年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开始。“施密特和邓小平都是大烟鬼 (heavy smoker)”，施密特是德国唯一一个被默许在任何地方（包括室内与电视直播间）抽烟的人-“施密特用打火机点了一支烟，邓小平立刻说，这是先进的东西，中国还没有，我们还很落后，但我们会向国外学习。”他评价邓小平是“一个把中国从中世纪里拖出来的实用主义者”，“应该比毛泽东在历史书上占据更大篇幅”。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邓小平对时间的耐心，“1978 年，当我们问他，如果他的改革计划在中国顺利推行，未来中国将是何面貌？他说，让我们再等一二十年评价改革不迟。放在今天的中国，这个等待仍然适用”。

正如 Theo Sommer 主掌的 DIE ZEIT 报纸之名（Zeit 在德语中意为“时间”），经历了二战、冷战、东西对峙、亚洲崛起，今天的 Theo Sommer 表示，“仍然看不懂这个新世界”，因为“从未经

历过，地球上这么多地方在同一时间内战火交加，危机四伏”。他选择信任时间，对世界抱持耐心。

人物：

PORTRAIT = P

Theo Sommer = S

“中国突然踏上了世界舞台。欧洲花了四五年的时间才反应过来，这一切真的发生了”

P：听说你目前还在《时代周报》网络版撰写专栏，名字叫“8点差5分”。它是什么意思？你都写什么话题？

S：这是一个评论国际时事的专栏。每周二早晨8点差5分上线，你会看到，9点钟时，会有两三百条网友的评论。

比如我最近写了苏格兰独立的可能性，写了乌克兰危机，我也关心中国在南海的动作。今天刚写完一篇，话题关于北约增加军费的最新决定。北约成员国承诺在未来10年内，各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将提高至2%。这毫无道理，如果美国声称它使用了北约50%的军费是因为处在冷战的特殊时期，可现在它用了75%，它抱怨我们，但这并不是欧洲的责任，而是因为美国让自己卷入了各种愚蠢的战争，这是我的观点，让75%这个数字降下来。

P：我感兴趣的是，经历了二战、冷战等等之后，今天，这个新世界，什么样的话题能让你提得起兴趣？

S：要知道，理解这个新世界并不容易，我在试图分析它，试图拎出未来的主流趋势，未来的前景，以及也许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新世界了。在我近50年的记者生涯里，我不认为自己经历过地球上这么多地方在同一时间内战火交加、危机四伏。我们现在有巴以冲突，有“阿拉伯之春”-现在已经变成“阿拉伯之冬”了，有乌克兰问题-一个内战与欧洲俄罗斯对抗的混合体，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叙利亚问题、伊拉克问题、中国南海问题、钓鱼岛争端。

你看，问题多多，我真替奥巴马总统捏把汗，他能不能想出一个万全的策略来搞定所有事。

P：与之前几十年相比，你认为现在这个世界变好一些了吗？

S：对一些人来说变糟了，对一些人来说变好了。

对那些坏运气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更糟糕的世界。他们不幸身处正在失败或已经失败了的国家。坏运气的人太多了，比如非洲、亚洲、南美。这真是个奇怪的现象，当有这么多人的生活于繁荣和相对和平的世界，而与此同时，又有那么多人似乎还生活在15世纪至17世纪的欧洲，事务无人监管，人们互相残杀。

但对中国的四五亿中年人来说，这是个好时候，他们步入盛年，忽然发现自己身处繁荣、现代的世界。对3亿印度人也是，另外还有那些从全球化中获益的数目巨大的人群。

P: 中国的繁荣离不开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你在上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曾 5 次访问中国，并与邓小平有过 3 次长谈。你第一次见到他，对他有什么印象？



Theo Sommer (中) 与施密特、基辛格在一起纵论世界局势

S: 1975 年，我随德国总理施密特第一次访问中国，见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时候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当我们第二次去中国，他下台了。第三次去，他又回到权力核心主政。牛棚里的经历显然没有击垮他。他是个小个子，精力充沛。毫不忌讳地使用痰盂，并且百发百中。

我们会面的时间很充裕。第一次长谈时，邓小平首先对我们预测，俄罗斯和西方阵营之间将有一场战争，施密特以北约作为回应，表示我们有足以自卫的能力，邓小平则说，若你们考虑与俄罗斯对话与合作，无异于慢性自杀，战争不可避免，两败俱伤；另外，他没把美国放在眼里，他说美国是“一只跛足老虎”，“你们欧洲人别指望美国”。

这时候施密特用打火机点了根烟-你知道他烟瘾很重-邓小平在这时换了个话题，“这是先进的东西，中国还没有，我们还很落后，但我们会向国外学习”。我认为那段时间，正是他下定决心，对中国实施改革的开始。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点很特别，他反复提到他的名言：向国外学习。

P: 他挺有幽默感。

S: 而且直言不讳。他对自己的出身毫不避讳，“我是农家子弟”。另外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他说“有些人占着茅坑不拉屎”。

P: 当时这句话意指什么？

S: 他认为有人说得多，而在真正动手去推动一个国家实施改革这件事上，做得太少。我认为，当时他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职能部门在周而复始地强调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但行之甚少。他批判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认为那些被事实证明无效的实践必须被抛弃，必须做出改变。那是在 1975 年，

中国人口大约 9 亿，而现在，你们超过了 13 亿。

P：他那个时候已经在考虑改革。



1975 施密特访华时与邓小平共进国宴试用筷子

S：他正在考虑，但不久就被批斗，再一次下台了。（我听说）他被批斗的罪名里有一顿饭吃 16 道菜，总动用私人飞机诸如此类。有人说他下台后被软禁在一间小屋，也有人说他被流放到猪圈。1977 年，他回来了，在华国锋政府担任第一副总理。



1975 年邓小平到机场迎接施密特

我第二次见到他，是在 1978 年底，我随德国科技部部长带领的 16 位德国记者团访问中国。1978 年，他已经开始了改革的动作。记者团与他聊了近两个小时。他再次谈到向国外学习，并且告诉我们，到 2010 年，中国将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之列，不再被落后束缚住手脚。

我们问他，中国为世界和平将会作何贡献？他张开嘴，用手指了指。“我们还是个弱国”，“我们还只能用嘴说而已”。

我们接着问他，如果你的改革计划顺利推进，未来中国将是何面貌？他的回答是：让我们再等一二十年，谁知到时候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呢。

P：你认为他说的“系统”具体是指什么？

S：我认为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正是中国今天在走的路。

那一次，我们一行记者有机会随德国驻华大使一同游历中国人迹罕至的地区。我们去了敦煌，一路向南，到了昆明，我们在中越交界的边境线上行驶，那是在 1978 年 12 月，而 1979 年 2 月，中越开战，也就是说，当时我们途经之处，中方军队很有可能正在集结，而我们毫不知情。



1975 年，邓小平到机场迎接施密特

P：你对邓小平处理外交事务的风格有什么看法？

S：他是一个谨慎的人，同时充满智慧。例如，在钓鱼岛争端面前，他奉行搁置论，把问题先藏到毯子下面去，分歧和冲突在未来自有解决之道。在这一点上，他和日本当时的首相福田赳夫立场一致。1979 年，邓小平在日本拜会了刚刚下野的福田赳夫，人们问邓小平为什么这么做，他回答：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P：那么你最后一次见到他呢？

S：他看起来没有之前那么有活力，感叹自己老了，快要去见卡尔·马克思了。那是在 1979 年，我

们发现改革已经拉开序幕。

几次中国之行后，我写了一本书，《中国牌》（Die Chinesische Karte）。这一手牌，你们今天还在打。现在回头想想，我认为邓小平说等一二十年看改革的成果，是明智的。2000年前，你们在稳步上升，一过了2000年，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已经不容小视，你们突然踏上了世界舞台。而且，我们（欧洲）花了四五年时间才反应过来，这一切真的发生了。

P：在你与他近距离交谈并深入观察之后，是否认为他是一个有独特风格的政治人物？

S：他很有魅力，但显然他的对手不这么认为。他不是光坐在那儿，看着事情进行，他知道如何促成事情实实在在地发生。他知道怎样取得权力，并持续掌握权力。

我认为，邓小平应该比毛泽东在历史书上占据更大篇幅。

P：为什么？

S：他把中国从中世纪里拖了出来。毛泽东解放了中国，同时也导致了很多人的死亡。毛泽东自己用古体写诗，却不允许他以外的人这样做。而邓小平是一个实干家，正如他的名句：“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我还记得1975年第一次到访中国的一个早晨，在钓鱼台国宾馆附近，一位老先生向我走来，他四下张望之后，压低声音对我说：“我会说英语，可是平时不能说。我能不能用英语和你说两分钟话？”而当我第二次去中国，出租车司机已经开始自学英语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让中国对世界开放，看世界，同时让世界看见中国，于是拥有了转型成现代国家的可能性。



1974年9月5日，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与邓小平亲切握手，
Theo Sommer 认为，邓小平应该比毛泽东在历史书上占据更大篇幅

25年前，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有中国年轻人在我的办公室和我聊天。我还记得，1978年的中国，北京城里满是胡同，人们都穿着灰色、蓝色制服，女孩们把鲜艳的衣服藏在里面，但外面全是灰色。而当我游历中国，走过戈壁滩里的绿洲，再深入中国农村，那种感觉像是在时间机器里穿行了1000年。我不想说谎，在当时的田野里，只有木头犁，我甚至没有见到过一辆拖拉机。

但现在，即使不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出口国。看看你们的出口数据，从1978年到2000年，它是这样（手在空中画出一条向上均匀爬升的直线），过了2000年，突然之间这样（曲线陡增）。外国对华投资也很惊人，我的一个好朋友，1985年负责在中国建立大众汽车的第一间公司，他形容当时的浦东是“一片沼泽地”，现在它看起来像曼哈顿。

在欧洲，当我们谈论“亚洲崛起”，我们实际上谈论的是“中国崛起”。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些荒谬，中国并不是“崛起”，不过是回到1820年至1830年时的样子，那时候你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国。地球上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如此剧烈的转变，在别的国家需要200年甚至300年。我近年来主要研究印度，印度要达到中国的改变程度，至少要花你们10倍，至少5倍的时间。



文革期间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天安门

P: 你认为邓小平留给今日中国的经验是什么？

S: 向国外学习，然后发展你们自己独特的能力。你们正在达到一个临界点，不必抄袭他人。韩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模仿，抄袭，但现在它很强大。

另外一点是外交政策。邓小平试图与所有亚洲邻国建立良好关系，他没有把邻国都逼到美国的保护伞下面去。

让我看今天的中国，我会像邓小平 1978 年对我说的，再等一二十年，评价中国经济改革不迟。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一个什么样的体制下往前走，我很确信，中国的首要任务是稳定，你们可不想经历另一个苏格兰独立。我也确信中国共产党会发生一个代际式的变化。

至今我没有答案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有 30 万年轻学生在美国，有人告诉我，他们中半数多一点的人选择回到中国，其他的留下了。这些回家的年轻人将如何改变中国？他们会激发改变，还是被旧思路同化？我们拭目以待。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的**邓小平**形象

“用手和大脑工作的人，与用钱生钱的人，两个群体之间越来越不平等”

P：中国正在热播一部名为《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电视剧，纪念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一种声音说，这传达了一个信息：政府将继续深化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力度。你对此有何看法？

S：我同意这个做法并希望你们成功。中国政府正在大刀阔斧与腐败斗争，在一个 2000 年帝制历史的国家，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大的转变，这是一块硬骨头。这件事日本花了 200 年，韩国和中国台湾至少花了五六十年。腐败的滋生来自人性，在短时间内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于是便有了空隙令人快速地、不合法地获取金钱。

每种文化都是错综复杂的。许多习惯往往不被同时代的其他文化所理解，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深植在文化中的根源已经生长了成百上千年。而有一个问题是目前中国与美国、德国共同的：用手和大脑工作的人，与用钱生钱的人，两个群体之间越来越不平等。对当政者来说，这是极端危险的状况，我想这是中国政府花大力气与腐败斗争的原因之一。你们的百万富翁可比我们多太多了。

P：2012 年的汉堡峰会“中国与欧洲遇上”，你主持了施密特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对话，你

问他们“欧洲如何应对中国”，你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S: 10年前, 15年前, 德国的主要担心在于中国会抢走许多工作机会。人们在担心, 是不是宝马、梅赛德斯和奥迪未来都会放在中国, 再也不在德国制造了。但现在这已经不是重点了。今天的重点在于, 许多人认为, 中国将会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一部分, 在WTO, 在世界银行等等重要组织, 它会不会成为游戏规则的缔造者之一? 会不会给现有秩序注入新的血液? 或者是它会创造一个全新的、多变的, 甚至带来冲突的规则?



Theo Sommer 与**基辛格**, 他们都是对中国颇有感情的人

P: 你曾表示过, 亚洲的崛起意味着欧洲以及之后美国统治世界的长达 500 年的时代宣告终结, 同时也不认为中国崛起会导致新一轮的东西对峙。那么你认为, 中国在未来的世界图景里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S: 中国毫无疑问会是将来世界的一极。未来世界也许有 5 个极: 中国、俄罗斯、欧洲、美国、印度。我认为围绕这 5 个极, 会呈现邻国的同心圆现象-你也可以称之为“势力范围”。

在欧洲, 我们在 19 世纪有类似的图景。德国、法国、英国、奥匈和俄罗斯, 也是五极。它们互相制衡, 直到 1914 年, 它们一起进入了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在经济上相互融合, 所有人都认为, 如果彼此在经济上有关联, 战争便不可能发生。可是突然之间, 战争来了。这是我们要记住的历史。

我认为中国要扮演自己该扮演的角色, 在国际秩序与和平上发挥更正面的作用。而美国应该意识到, 中国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同样有分一杯羹的需要, 美国要适应这一点; 另一方面, 如果中国走得太狠, 美国会反弹。



特奥·索莫 Theo Sommer, 摄于 1967

未来的世界五极将像 19 世纪的欧洲一样，相互制衡。如果出现差错，也许会有新一轮的冷战上演。

而对于中国，我倾向于相信你们是理性的人。比如你们在考虑买下一个哈佛大学的学院时，也会有自己的标准（意指香港富商陈启宗捐赠 3.5 亿美元至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获得学院命名权一事。哈佛大学首次因慈善捐款为一个学院更名，此前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是为纪念美国前总统而命名）。

P：实际上他是捐赠，并不是“买”下一个学院。

S：归根结底来说，他就是买下了它。至于孔子学院，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思想武器。

最后说回对中国的态度。在德国有一句俗语：“轻松对待年轻马驹”。意思是，不要让它过度兴奋，不要用力过猛，慢慢来，不催促它，不让他害怕。 🍷

[【返回目录】](#)

张维迎：知不知，小平也

[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本文转载自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官网，图片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



邓小平访美演讲

邓小平是一位坚定的市场化改革者。他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位改革者，是因为他是有大智慧的人。他最大的智慧就在于知道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的“无知”。正是因为知道自己有所知有所不知，知道没有人无所不知，他相信市场经济才是实现民富国强的康庄大道，并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道路。

智者知不知

人们习惯于用知识的多寡区分人的聪明和愚笨，如说聪明人满腹经纶，愚笨者愚昧无知。

其实，就智慧而言，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拥有某些特定的知识，而在于是否认识到自己在知识方面的不足。

智者知道自己的无知，也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愚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或者即便知道，也不愿承认。

所以，老子说：“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又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苏格拉底说：“我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I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据说有个雅典人曾宣称自己无所不知，要和苏格拉底辩论。辩论之后，苏格拉底对他的学生说：我比这个人聪明！学生问：何以见得？苏格拉底答道：我们两人都不知什么是善恶，但他以为自己知道，而我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我比他聪明一点。

莎士比亚说：“傻瓜认为自己是聪明人，而聪明人自认为自己是傻瓜。”

哲学家罗素说：“有关我们时代最痛苦的一件事是，那些自以为什么都确定无疑的人都是些傻瓜，而那些有一定想象力和理解力的人则充满疑惑，犹豫不决。”

任何科学发现，都从承认无知开始。

无知者无畏

为什么聪明人知道自己无知，而傻瓜不知道自己无知？

因为，一个人产生和拥有某种知识的能力，也正是评价该知识本身所必须具备的能力。缺乏这种技能，不仅意味着他没有可能获得这种知识，也意味着他没有能力认识到自己不具有这种知识。比如说，一个不懂得语法的人，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语法上犯了错误；反之，一个懂得语法的人，知道自己写的句子是否犯了语法错误。

在心理学上，这被称为“杜宁-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基于四个心理学实验（涉及欣赏幽默的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语法能力等），贾斯汀·克鲁格和大卫·杜宁于1999年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给出如下结论：低能力的人有一种“虚幻的傲慢”（illusory superiority），会错误地高估自己的认知能力；这种认知偏差来自他们没有能力认识到自己能力的匮乏；由于缺乏元认知（metacognition）的自我意识，他们倾向于高估自己的实际能力和业绩，而且高估程度与实际能力成反比。比如实验中成绩最低一组的参与人，平均实际成绩排名在第12个百分点，但参与者的自我评价排名在第62个百分点，不仅远高于实际排名，而且高于平均排名（第50个百分点）。

杜宁-克鲁格效应在现实中比比皆是。比如，1977年参加高考的时候，和我同考场的几个考生每门课考完都谈笑风生，感觉良好。但他们没一个人最终考上大学。越不知道什么不是正确答案的人，越不可能知道自己考得糟糕。

杜宁-克鲁格效应的一个表现是俗语讲的“无知者无畏”，作者在他们论文开头引用的犯罪例子对此提供了很好的注释。1995年的某一天，一个名叫麦克阿瑟·惠勒的男子，在光天化日之下相继抢劫了两家银行，并且在抢劫时没做任何伪装。当天晚上11点，电视新闻节目播出了银行的监控录像，惠勒很快被拘捕了。当警察给他播放监控录像的时候，他一脸愕然，喃喃自语道：“我脸上可涂着柠檬汁啊！”原来，他以为只要脸上涂上柠檬汁，监控摄像机就难以识别其真面目。正是这种错误知识导致了他的不幸。

杜宁-克鲁格效应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不仅因为它给无能者带来个人悲剧，更在于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灾难。不止一位哲人曾说过，人类历史上许多坏事是好人干的。好人之所以干坏事，十有八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无知。计划经济的悲剧，就是好人干的坏事。

哈耶克的信徒

哈耶克为什么在他年富力强、学术声誉大振时，从经济学转向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的研究？要不是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几乎被主流经济学界遗忘，而他获奖的理由是20世纪30年代初对商业周期理论的贡献，这一理论至今不被主流经济学待见。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曾猜想，哈耶克之所以“改行”，是因为他意识到在经济学领域自己竞争不过凯恩斯。毕竟，许多原来他的追随者相继变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并且博得大名，这不能不使他心灰意冷。

我现在认识到，这个猜想太肤浅！哈耶克转向哲学研究的真正原因是，那场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辩论使他认识到，如果不能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的角度理解市场，就不能为市场经济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就不可能摧毁人们对计划经济的信念。他知道，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内，市场和计划难分伯仲，这就是当时许多经济学家欢呼奥斯卡·兰格已赢得大辩论的原因。兰格正是用严格的新古典经济学证明计划经济的可行性的。事实上，直到今天，计划经济的幽灵仍然不时登堂入室，它的护身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

哈耶克为市场经济提供的认识论基础，集中包含在他跨越半个多世纪写的五篇论著中，包括：《经济学与知识》（1937年）、《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1945年）、《作为发现程序的竞争》（1968年）、《假装有知》（1975年）和《致命的自负》（1988年）。其中《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可以说是他学术思想的精华。

哈耶克的基本思想是，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可行、市场之所以优越于计划，就是因为人类的无知，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传递的困难。在一个由众多人组成的分工社会，与经济决策相关的知识分散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有关资源、技术和偏好的信息都是私人信息，不可能由任何人全部拥有，对任何人都不是给定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些局部知识，每个人又都是无知的。因此，社会经济问题本质上是如

何才能够以最优的方式，把那些资源用以实现各种唯有这些个人才知道其相对重要性的目的的问题。简而言之，经济问题实际就是一个如何运用分散化知识的问题。

在哈耶克看来，从根本上讲，市场是一个认知装置，是一个生产和传递信息的过程。通过价格和蕴藏在每个个体中的企业家精神，市场把分散的知识传递给分散的决策者，从而使他们能彼此协调行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断生产出新知识、新资源和新技术，推动社会进步。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分散化的知识不可能集中于一个统一的中央计划机关，任何试图这样做的行为都会导致信息本身的消散。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有关资源和环境的知识是不断变化的，更由于大部分与经济决策有关的知识是主观的，是如迈克尔·波兰尼讲的“默性知识”（tacit knowledge），这些默性知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能像科学知识那样编码，因而没有办法以非价格的渠道传递。

在西方学术界，对计划经济的失败，最普遍的解释是它不能给个体提供恰当的激励。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人的自私。这种解释当然没错。但哈耶克证明，即使撇开人的自私，仅仅由于人的无知，就足以导致中央计划的失败。利他主义并不能挽救计划经济的命运。

计划经济的拥护者，实际上既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也没有认识到人类知识的本质。他们以为，经过适当方式挑选出的专家组成的某个权力机关，只要被赋予足够的权威，总有办法收集到制定经济计划所需要的信息，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实际上，他们把有关事实性的“科学知识”和统计信息，理解为制定计划唯一需要的知识，没有认识到，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重要但不能系统组织的知识——默性知识，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每个人比所有的其他人都更具某种优势，只有当立基于这种知识的决策是每个个体做出，或者经由他的积极合作而做出的时候，这种知识才能得到运用。哈耶克批评计划经济拥趸的幼稚是“致命的自负”，这种自负使他们无法洞见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和分散决策中体现的企业家精神，野心勃勃地试图用中央计划取代个体决策，导致了人类的灾难。

当然，人类的无知也意味着，市场可能出现协调失败，企业家也会犯错误。

但是，在考虑一种经济制度的可欲性时，我们不应该把现实中的某种制度与经济学家想象的、完美无缺的乌托邦相比较，而应该在不同的实际制度之间做比较。市场经济之所以优越于计划经济，不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总是有效率的，而是因为市场经济下，由于逐利动机和竞争压力，人们总是有积极性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无论这种错误是别人犯的还是自己犯的。一个企业家犯的 error，就是另一个企业家的赚钱机会。纠正别人的错误有利可图，纠正自己的错误可以减少亏损。因此，市场是一个不断纠正错误的机制。相反，在计划经济下，大权在握的决策者既没有纠正错误的竞争压力，也没有纠正错误的盈利动机。事实上，他们最有积极性做的，可能是错上加错地掩盖错误，结果通常的情况是，一系列的小错误累计成大错误，直至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没有读过哈耶克的著作，甚至可能压根就不知道哈耶克是何许人也。但从中外计划经济的实践中，他领悟到了哈耶克从认识论角度证明的结论：市场优于计划。他认识到人类知识的局限性，认

识到自己的“无知”，因而相信农民自己种地比公社干部指挥农民种地好，“傻子”年广久比想抓他的人更值得尊重，企业家决策比官员决策更有效，地方分权比中央集权更有利于因地制宜和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这就是邓小平发起市场化和分权化经济改革的认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讲，他是哈耶克的信徒。

在西方学术界，对计划经济的失败，最普遍的解释是它不能给个体提供恰当的激励。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人的自私。这种解释当然没错。但哈耶克证明，即使撇开人的自私，仅仅由于人的无知，就足以导致中央计划的失败。利他主义并不能挽救计划经济的命运。

遗憾的是，由于不理解哈耶克的认识论，时至今日，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仍然陷入“致命的自负”不能自拔。他们或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或者假装自己无所不知，貌似“艺高人胆大”，实则是“无知者无畏”，一会儿建议搞产业政策，一会儿沉迷于刺激总需求，结果是，根据他们意见制定的政策不仅扭曲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且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受到伤害。

改革就是干中学

邓小平有关人类及他本人知识局限性的认知，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而且影响了改革路径的选择。

与哈耶克一样，邓小平认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制度，一定是持续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因为没有人有足够的信息和能力设计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完美制度。任何人为设计的制度都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这正是计划经济体制难以为继的原因。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但邓小平明白，经济-社会改革不同于盖大楼、修大桥，不可能按事前设计好的图纸施工，而必须采取“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

“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渐进式改革思路最直观、最朴素、最形象的表达。它的认识论基础是，与经济制度运行的所有知识一样，改革所需要的知识也是分散化和地方化的，任何个体和领导集团都不可能拥有操作改革过程所必须的所有知识，邓小平自己也不例外。

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不断受到批评。不论批评者对它的缺点讲得如何头头是道，他们实际上染上了“致命的自负”，自以为知道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东西。就我所知，国家体改委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制定总体改革方案为己任，先后出台了十多个总体改革方案，但每一个方案充其量只是提出改革的一些原则性建议，没有一个方案称得上是施工蓝图。这不是因为起草这些方案的人不努力、不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有制定一个改革蓝图所需要的足够知识。

邓小平明白，改革所需要的大量知识是实践知识，改革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不同改革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只能在改革过程中陆续地显现出来。因此，他主张改革从容易的地方开始，先易后难，循序

渐进，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不能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搞“眉毛胡子一把抓”。邓小平对“一揽子改革方案”不感兴趣。

由于同样的原因，邓小平主张搞改革先搞试验，试验取得成功后再大胆推广。最为世人称道的试验是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它们可以说是市场化改革的综合试验区，承担着为未来中国探索一条出路的使命。

事实上，在邓小平时代，没有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不是从试验开始的。价格改革、流通体制改革、工资和用工制度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等等，概无例外。即使像在上海和深圳建立股票交易所这样重大的举措，他也说，可以先试试，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实在不行了再关掉。

邓小平知道，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科学预测是不可能的，改革过程中免不了犯错误，但不改革没有出路。所以在重大问题上，他往往愿意在摸清全部事实之前就大胆推进，同时为可能发生的必要调整留出余地。他总是鼓励各级官员大胆地试、勇敢地闯，不要像小脚老太太走路，不要怕犯错误。他说，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因而在他的领导下，宁可改革犯错误，也绝不允许不改革，便成了一种官场文化氛围。许多成功的改革举措都是各级地方官员冒着风险闯出来的。

邓小平知道，中国改革和发展所需要的许多知识和思想观念存在于别的国家，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他对外开放的决心从未动摇，他从来没有想过害怕苍蝇飞进来就把大门关上。1978年访问日本时，他曾说来日本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仙草”。他坚持“拿来主义”，派遣官员出国考察，鼓励年轻学者出国留学，邀请外国专家为中国出谋划策。他把吸引外资当作引进先进技术和思想观念的战略举措，拒不接受“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的指控。他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并且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他知道，国际友人提供的信息，可以减少由于无知导致的决策失误。

邓小平有自知之明。他行事果断，但不刚愎自用。即使不是他发起的试验，只要行之有效，他就给予支持。他做出的决策，如果事后证明有误，他会适时调整。对他没有知识和信息做出判断的新事物，他不轻易表态，而是采取“看看再说”的态度，等自己有了足够的信息后再一锤定音，因为他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明白自己在经济事务上不是高手，因而把经济决策委任于更熟悉经济事务的其他领导人。即使在他最擅长的外交领域，他也不急于解决那些棘手但并不迫切的难题，因为他相信，后人比今天的人更聪明、更有智慧解决好这些问题。

知不知，小平也！ 🍷

[【返回目录】](#)

向松祚：世上再无邓小平 | 纪念小平同志开启伟大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向松祚 人大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本文转载自作者新浪微博]

1

母亲说：他领导下我们能吃饱饭，他是好人。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想写点文字纪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每次坐到书桌前，却又不知道写点儿什么好。



我是1965年生人，15岁之前，基本没有吃过饱饭。我想大多数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有一次看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的一个访问，记者问他对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莫言回答就一个字：饿！我听后感同身受。我时常想，假若不是邓小平同意让安徽小岗村农民“歃血为盟”、承担巨大风险尝试的包产到户扩展到全国，我们还要忍受多少年吃糠咽菜的日子？这还真不好说啊。

我出生在湖北秭归九畹溪罗圈荒一个“鸟不生蛋”的极端偏远山村，村里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小时候家里唯一的一套书是被烟火熏得黑乎乎的四卷《毛泽东选集》，从来没人翻过。父母从没上过学，几个姐姐和哥哥也是如此。我时常想，假若不是小平同志果断决定恢复高考，我上大学的机会绝对是零，最大的可能是继续生活在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沟里，脸朝黄土背朝天，终老一生。

1997年2月19日，小平同志溘然长逝。当时母亲随我住在深圳。母亲不识字，平时从不看电视。但是我记得小平同志去世后两天里，母亲一直坐在电视前，很认真地看小平同志的纪实片，很少吃饭，有时还悄悄落泪。后来我偶然问母亲：邓小平去世您也很难过啊？母亲说：他领导下我们能吃饱饭，他是好人。

是啊！小平同志是个好人，这是我不识字的母亲对人的最高评价了。我想有很多很多像我母亲这样朴实的农民也会这样说。

前不久读到秦朔先生写的关于广东长隆动物园和珠海横琴海洋世界主题公园的创办人苏志刚先生创业的传奇故事，有一段话是这样的：“他很感恩，从公司办公室到家里都挂着邓小平的像，感恩共产党和改革开放。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时，苏志刚带着一家人跪地，向邓小平祭拜。”是啊，我想很多很多第一代企业家都会像苏志刚先生那样，从内心深处对小平同志满怀感恩之情。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原主任傅高义历经十年时间撰著的《邓小平时代》，很多朋友都读过。他在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2000年夏天，我在韩国济州岛遇见我的友人、20世纪美国最了不起的东亚事物记者奥博多福尔。我对他说，自己要退出教学工作，想写一本书，帮助美国人理解亚洲的重要发展。奥博多福尔毫不迟疑地说，你应该写邓小平。思考几周后，我断定他说得对。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 国，而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

是的，对于过去数十年的中国、亚洲乃至世界历史而言，有哪个人比邓小平更值得学者去研究呢？

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很多人都深切怀念小平同志。今年已经有很多文章回忆和纪念小平同志。每当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命运遇到重大挑战或处于重要时间节点的时候，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小平同志，或许，这是衡量一位伟大领导者持久影响力的最佳指标吧。

2

《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说，在那个时代，中国有邓小平这样一位领导人，是中国人的幸运。

伟大的中国改革开放，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我认为是英雄造时势，这个英雄就是邓小平。

有一种观点认为没有邓小平，也会有其他领导者开启改革开放。另一种观点认为，在1970年代后期那样的历史时刻，唯有邓小平才能领导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我同意后一个观点。

历史无法假设，亦无法推倒重来。遥想1970年代，长期的集中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和制度机制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束缚着中国人的思想；长期的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早已成为任何人都不敢逾越的“生死雷区”；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让中国经济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政治昏天黑地，经济全面萧条，真可谓饿殍遍野，率兽食人；学校教育基本停摆，科研事业全面停顿，知识分子被关进牛棚，说是斯文扫地，算是很客气了；对外则完全闭关锁国，先是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倒向苏联，很快和苏联也闹翻，双方陈兵百万，剑拔弩张；同时大搞所谓“输出红色革命”，与多数亚洲邻国关系也非常紧张；天天自吹自擂“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资本主义一天天坏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实际上对西方发达国家科技突飞猛进和经济持续增长一无所知；肚子饿得难受，还要高喊解放全人类，把红旗插遍地球……197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怪象，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荒诞的一页。

处于那样的历史背景，要扭转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所谓“拨乱反正”，谈何容易！一般政治家可能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也不敢下手。

能够扭转一个濒临崩溃的“乱摊子”大国的发展方向，需要我们能够想象到的伟大政治家可能具备的全部能力：超凡的政治智慧，非凡的政治勇气，深远的政治谋略，高超的政治艺术，卓越的组织能力，崇高的个人威望，迷人的个人魅力，先知般的远见卓识，广阔的国际视野……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悲天悯人的菩萨情怀和勇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和魄力。

1970年代，只有邓小平具备所有这些素质和能力。他三落三起，百折不曲；他身经百战，指挥若定；他饱经沧桑，洞察世情；他内政外交，举重若轻；他沉默寡言，内心笃定…《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用来形容邓小平，最是恰当。

《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说，在那个时代，中国有邓小平这样一位领导人，是中国人的幸运。善哉斯言！

3

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我以为，邓小平能够领导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能够成功扭转中国的发展方向，最关键的还不是他超凡的政治家素质和能力，而是他真正懂得那时的中国人民需要什么。换句话说，他深深知道“民心”所在。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中国人对人类政治哲学的最高概括。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最大的民心永远是生活的富足、安宁、和谐。

1970年代，中国人最大的民心就是温饱。吃饱穿暖，最普通最平凡最迫切的要求，可是多少年来，这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最大的奢望！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以这个最大的民心为出发点。正式的语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我们穷了几千年了，不能再穷了”

邓小平说：“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

这是常识，这是真理，也就是民心！

4

小平同志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实事求是”。

小平同志能够成功开启和领导伟大的改革开放，扭转中国前进的历史进程，如果说有一个法宝和秘诀，这个最重要的法宝和秘诀是什么？

那就是：实事求是！

小平同志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实事求是”。1992年著名的南巡讲话里，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只是最简单的四个字，然而小平同志思想里的实事求是却具有最丰富的含义。依我粗浅

的理解，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至少包括如下重要含义：

- 其一、尊重常识，尊重事实，尊重老百姓的愿望。
- 其二、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改正错误，勇于放弃成见或偏见。
- 其三、反对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官僚主义。
- 其四、强调做比说重要，强调实际效果。
- 其五、反对个人崇拜，不宣传自己。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著名的“傻子瓜子”的故事，最能说明小平同志尊重常识，尊重老百姓最基本的愿望。一个炒瓜子的个体户雇佣了超过七名员工，当地官员把他当做“剥削阶级资本主义分子”，准备抓起来。事情报告给小平同志，他果断地说：先不要动！当时一些人给中央领导写信，说马克思说过，雇用不超过七个人不算资产阶级，超过七个人就算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据说小平同志只说了一句话：这不合情理嘛！后来在一次讲话里，小平同志还专门谈到“傻子瓜子”事件，强调领导干部要尊重老百姓最基本的愿望。

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曾经说：邓小平是我见过的做的比说的多得多的极少数领导人。小平同志沉默寡言，却言出必行，一言九鼎。很多和邓小平有过直接交道的全球政要都知道，邓小平话不多，总是单刀直入、直击要害。

对于任何领导人来说，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放弃成见，恐怕都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小平同志堪称典范。

在同意大利著名女记者的谈话里，小平同志坦承：“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有多少领导人能够坦承自己犯错误？主动认错？向所有人民认错？

新加坡国父和前总理李光耀曾经如此回忆邓小平：“我从未遇见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能够勇敢地放弃一切成见，尊重现实，尊重事实。这就是邓小平的非凡和卓绝！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反对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官僚主义。1992年南巡讲话里专门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多做少说！这不就是针对今天说的话吗？

小平同志没有系统的大部头著作，他自己坦承读书不多：“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

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是啊，实事求是，尊重常识，尊重人性。今天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奇葩政策，就是完全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小平同志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学习他的讲话，他也没有什么著作，他强调的是行动而不是空谈。南巡讲话里那些著名的语句，人们至今耳熟能详：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些话，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今天那些极左的东西不是又开始沉渣泛起了吗？

5

小平的回答就是简单一句话：这些年来，凡是和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发展得不错！

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尤其体现在谋划和处理对外关系上。邓小平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也是伟大的外交家。正是他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和果断决策，给中国赢得了数十年和平发展的历史性战略机遇。



一位研究党史的资深学者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开启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之后，需要重新谋划中国的对外关系。当时外交战线负责人认为，既然要改革开放，营造和平环境，首先要想办法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当时双方在边境上陈兵百万，剑拔弩张。但是邓小平决定首要的外交任务是和美国建交。当时外交战线的负责人起初不太理解，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我们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最需要的是资金、人才和先进技术，苏联能给我们什么呢？



中美建交的全部谈判过程，小平同志都是亲自参与，亲自决策。双方谈判几次遭遇“谈崩”的时刻，都是小平同志力挽狂澜，果断拍板，推动中美两国迅速建交。

为什么邓小平如此重视和美国建交？有这样一个故事足以说明：中美建交之后，小平同志访问美国。随行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问小平同志：您为什么如此重视和美国建交？小平的回答就是简单一句话：这些年来，凡是和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发展得不错！

6

小平同志有很多名言。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现代中国，小平同志应该是真正懂得教育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而且真正能够身体力行、高度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的伟大领导者。

1975年小平同志临危受命，主持国民经济的全面整顿恢复，他选择的突破口正是教育和科技领域。1977年小平同志正式恢复工作之后，他主动请缨，要求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须知，在那个时代，教育科技领域是所谓的风口浪尖、是非之地，很容易惹上意识形态犯错甚至犯罪的祸。



小平同志深知，中国一切都落后，但最落后的则是教育和科技。

小平同志深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富强，最根本的推动力是教育和科技。

1977年，他力排众议，当机立断恢复高考，开启了中国教育真正的崭新时代。

1978年，他倡议和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中国终于迎来科学的春天。

他多次会见海内外著名科学家，恳请他们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献计献策。

他不仅强调技术的重要性，而且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他全力支持李政道教授到北京建立正负电子对撞机，并亲自出席奠基仪式。他多次说：“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今天，当我们面临中国经济和产业升级的重大挑战，当我们面对美国贸易战的严峻形势，我们更加深刻感受到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精辟论断的极端重要性。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内生增长理论的开拓者保罗罗默。罗默用严格的数学模型证明了邓小平的著名论断，可算是对邓小平思想严格的科学注释。

远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和产业转型要想取得成功，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深入改革和完善教育和科研体系，建立能够鼓励和弘扬“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真正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教育科研体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激发和创造出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

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让我们反复重温 and 深刻体会邓小平的伟大论断吧。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回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峥嵘岁月，小平同志实际上是两次领导和开启中国的改革开放。

1978年是第一次。经过举世瞩目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小平同志成功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吹响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号角。《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改革开放的宣言书。小平同志入情入理、情真意切的讲话，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改变了整个世界。

1989年事件几乎完全中断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体制裁中国，和平稳定的外部国际环境突然逆转；国内大搞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向左转的步伐突然加快，改革开放几乎完全停顿。中国人民再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所有人都在彷徨、观望、焦虑、忧心甚至恐慌。国民经济再一次陷入缓慢增长乃至停滞不前。

中国向何处去？改革开放还要不要继续？

就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再一次挺身而出，从北京出发一路南巡。所到之处，他时而大声疾呼，时而严词批评，时而语重心长，时而喃喃自语。所有的讲话都传递出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信息：谁不改革谁下台！

东方风来满眼春！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方“画了一个圈”，以深圳经济特区为突破口，杀出一条血路来，为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政策探索道路，积累经验。

当改革开放面临逆转甚至夭折的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再一次来到深圳，发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历史最强音。南巡讲话的伟大意义和重要性一点儿不亚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南巡讲话的许多经典段落，早已成为人们讨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趋势的基本思想和判断准则：

7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精华！是判断一切是非的试金石。

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的这段话应该是最精辟和最正确的回答。你还能想到第二个更好的社会主义的定义吗？只是，我们今天离邓小平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还差得很远。

正是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正是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加快加入 WTO 的谈判进程，并最终在 2001 年正式加入 WTO，中国经济从此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10 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正是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大幅度放宽对民营或私营经济的限制，大力鼓励民营或私营经济的发展。如今，民营经济或私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真正的主体。民营经济或私营经济贡献了 GDP 的 60%，财政收入的 70%，出口的 80%，就业的 90%。

正是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决定加快上海浦东开发。如今，上海浦东已经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

繁华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之一。上海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毫无疑问，邓小平伟大的南巡讲话领导和开启了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

8

开放是全面的开放；改革更是全方位的改革。不仅经济体制要全面改革，政治体制更要全面改革。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是全面的、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开放是全面的开放；改革更是全方位的改革。不仅经济体制要全面改革，政治体制更要全面改革。



1986年后，邓小平多次讲：不改革政治体制，经济改革也搞不通。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真正成功。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可能毁于一旦。

有人统计过，1980年代，邓小平专门同中央领导人论述和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超过20次。30多年过去了，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精辟论断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依然是我们分析、判断、规划、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原则。

邓小平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历史进程磨炼出来的全能型政治家，曾经负责领导政治、军事、外交、教育、科技、改革等等几乎所有国家大政方针。有谁能比邓小平更深刻更透彻理解中国政治体制的内在弊端呢？

1982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他全面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经典文献。在这篇讲话里，邓小平以异常尖锐犀利的语句，深刻剖析了我国政治体制的主要表现和危害。邓小平说：

“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

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经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小平同志的严厉讲话过去快四十年了，今天中国官场又怎样呢？老人家天上有知，是不是会再次拍案而起？

小平同志谋划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解放思想。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里，有一段掷地有声的精彩论述：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小平同志之所以始终带头反对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就是一种极端的“迷信盛行”。

小平同志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主要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任期制；二是推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

对于共产党如何执政，邓小平有极其深刻和长远的思考。他甚至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方向是实现领导干部的全民普选。

关于党政分开，他说：“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

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

关于官员是应该对上级负责还是对人民负责，他说：“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吾走笔至此，不仅仰天长叹！今日衮衮诸公，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说：自己是对人民负责，不都是对上级负责？小平同志天上有知，他对今日政治生态该作如何感想？

9

古人云：四十不惑。

然而，改革开放进入四十周年，很多人却开始迷惑不解，甚至陷入焦虑和恐慌。

为什么会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小平同志曾经严词谴责的那些近乎胡说八道的“争论”又开始时髦起来。所谓“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的争论又开始沉渣泛起，卷土重来。2018年中国最热门的话题竟然是所谓的“国进民退”。

大名鼎鼎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举行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会议，讨论得最热烈的主题是“国进民退”，是对民营企业或私营企业的歧视。

连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都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国进民退”问题。2018年9月16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佐利克说：“在外界看来，中国好像转向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我们担心中国私营企业没办法公平竞争。”

年初，人民大学那位周教授发表“消灭私有制论”、某报纸胡大主编发表莫名其妙的“暂时不消灭、终究要消灭论”、两位名字也唤做小平之人发表惊世骇俗的“退场论”和“职工管理论”...怪论百出，令人惊诧。

很多人有恍若隔世之感！仿佛又回到那个不可理喻的时代。

莫名其妙的怪论让所有民营或私营企业家心理忐忑不安，引发恐慌情绪，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企业家的信心或情绪，影响力民营企业家的投资和经营活动。

邓小平开启伟大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不争论”和“不折腾”。怎么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竟然又开始争论那些早就有定论的问题？难道真是有人又要开始“折腾”吗？思之极恐！

幸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及时出手，亲自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亲切地称呼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再一次给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

但愿小平同志始终倡导的不争论、不折腾、实事求是、少说多做的务实精神能够重新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内在精神。

但愿小平同志振臂疾呼、身体力行的“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改革勇气和魄力能够激励我们勇敢地跨过改革的深水区，激励我们下决心啃下改革的硬骨头。

但愿小平同志语重心长的教导“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能够真正遏制那些极左的怪论阻碍国家和民族的前进步伐。

但愿小平同志始终强调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谆谆教诲，能够激励我们真正痛下决心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建立真正的法治制度，让中国真正从人治的封建窠臼里走出来，迈向自由、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 🇨🇳

[【返回目录】](#)

李珊珊：第一例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在中国可能是一种必然

[本文首发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微信公号：偶尔治愈，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所有的必然都是偶然。11 月 28 日午间，消失多日的贺建奎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他按照计划出席了香港的基因编辑大会，发表讲演。在提问环节，他回应了对于试验的多项质疑。他留给现场的最后一个回答是，如果换作是他自己的孩子，他也愿意参与试验。然而，现实不是假设。

中国，这个诞生了全球第一例基因编辑婴儿的地方，向来盛产“科学狂人”，除了试图“定制人类”的贺建奎，还有痴迷于“换头术”的教授任晓平，以及电击治疗孩子的网瘾，发了 100 多篇论文的主任医生杨永信。从医学伦理出发，贺建奎和他身后的这片土壤，值得认真审视。



贺建奎出席香港基因编辑大会，
他的研究受到了其他科学家的强烈谴责

两个让全人类措手不及的女婴

两个让全人类都毫无准备的双胞胎女婴露露和娜娜出生了，她们的基因是被修改过的，暂时还不知道她们的父母是谁。基因编辑的操刀者、南方科技大学的副教授贺建奎，在体外受精阶段，就直接修改了胚胎的基因——让两个女婴出生后就天然拥有抵御艾滋病毒的能力。乍听起来似乎是一件科技造福人类的大美之事，但几乎所有相关的从业者都将其视为对整个基因工程领域的一个重大的打击和威

肋。

在一份 122 名中国科学家的联署声明里，将此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称之为“潘多拉的魔盒”，并呼吁“还有一线机会在不可挽回前，关上它”。

诞生于 2012 年的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并不是一项全新的技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可以熟练地将它运用在食品、药品、猴子胚胎、甚至 14 天以内的人类胚胎上。

通过这项技术，人类可以通过对特定的 DNA 片段进行“敲除”或者“插入”，对目标基因进行编辑，用于预防或者治疗某种疾病，更远一点，可以更强壮，更美丽，更聪明。

不加约束的话，理论上，人类可以定制人类。

不过，此前从来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讳，突破 14 天早期人类胚胎这个伦理和法律的禁区，更不用说，直接利用这个被修改过基因的胚胎生出两个几乎让全人类措手不及的婴儿。

技术本身不是难题，真正的难题在于基因编辑技术脱靶的不确定性，所谓脱靶，指的是，错误地编辑了基因，出现了不可预知的改变。

如果利用被修改的人类胚胎生下孩子，这些可预知的、不可预知的改变都将永久写入人类基因，并且按照遗传学的规律世代相传。

在 2015 年，人类第一次跨越红线，将基因编辑技术运用在早期人类胚胎上，就有三分之一的胚胎出现了脱靶突变。值得一提的是，那次的研究团队也来自中国——中山大学黄军就领导的实验室。

如果用在植物、甚至是动物身上，基因编辑发生了不可预知的错误，植物可以直接销毁，动物执行安乐死也并非完全无法接受。

但是这种不可预知的错误出现在活人身上，我们能怎么办？

122 位科学家的联合声明提到，“这些不确定性的可遗传的遗传物质改造，一旦作出活人就不可避免的会混入人类的基因池，没有人能预知将会带来什么影响。”

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正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

如果将露露和娜娜所要承担的风险和微不足道的收益对比，你也会发现这次所进行的基因编辑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露露和娜娜的父亲是艾滋病毒的携带者，母亲不是。

根据研究者贺建奎的说法，修改过基因后，露露和娜娜生来就拥有抵御艾滋病的能力。

但问题在于，对艾滋病毒，我们有非常成熟的阻断技术。哪怕母亲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大概率不会被感染，如果只是父亲是感染者，阻断的成功率只会更高。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哪怕生活在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家庭，通过正常的防护措施，感染的几率也不高。

露露和娜娜能从这项技术里，得到的非常之少。她们将要面对的，又是什么呢？

除了不可预知的遗传类疾病，考虑到中国公众对于转基因农作物的态度，露露和娜娜在成长的过程中，要面对的是什么不言而喻。

在社交媒体上，甚至有对这两个婴儿“人道毁灭”、“限制生育”这样毛骨悚然的言论，你就不难理解科学家的巨大恐慌，以及为什么说，这是两个让人类措手不及的孩子。

冒险者的热土

在中国，从来都不缺少“疯狂的科学家”。这个诞生了全球第一例基因编辑婴儿的地方，盛产“科学狂人”，除了试图“定制人类”的贺建奎，还有痴迷于“换头术”的哈医大教授任晓平，以及用电击治疗孩子的网瘾，还发了近 100 篇论文的的精神科医生杨永信。中国是第一个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胚胎临床试验的国家。

2015 年，中山大学的黄军就团队，利用废弃的 86 份人类胚胎做实验，试图修正一个常见的血液病基因。虽然这批胚胎在实验结束后，被及时销毁了，但这项“大胆”的实验引起了广泛的忧虑。

《自然》、《科学》和《细胞》等这个领域的顶尖杂志拒绝发表这项论文，它们认为这项实验违反了安全与伦理标准。研究最终发表在一份影响力不大的在线期刊《蛋白质与细胞》上，主编是中国人。

此后的三年里，中国的基因编辑技术遍地开花，除了小心翼翼地游走在胚胎实验的红线边缘，基因编辑技术更多的是用来治疗现有的疾病。

2016 年，在四川大学的华西医院，医生们抽取肺癌患者的一些血液，尝试用这项技术来改造血液中的 T 细胞，使之获得攻击肿瘤细胞的能力，然后再进行回输。

在之后的两年中，很多大医院开始上马了类似的试验，根据《华尔街时报》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报道，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数据库中就记录了中国的九次基因编辑试验。

一位美国的基因编辑研究团队的首席科学家提到：在将 CRISPR 等西方国家开创的基因编辑技术加以应用的方面，中国可能超过了美国。而这也许正是中国的官方希望见到的。

在中国，基因编辑是一个正在受到国家意志推动的研究领域。基因编辑被列入中国在 2016 年制定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促进基于基因编辑研究的临床转化和产业发展。

哪怕是从韩春雨的事件也能看出，中国的公众和官方都十分期待本土科学家能够在基因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基因研究上，科学已经扛起为民族、国家争夺荣耀的大旗。

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些领域，只要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位本土科学家往往可以得到让他自己都乍舌的收益，资源和荣誉。

在这些科学大冒险中，违规者很少得到惩戒，而“成功者”报偿丰厚。

比如，比编辑人类更天方夜谭的“异体头身重建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头部移植”或者“换

头术”，同样在发生在这片冒险者的热土上。

异体头身重建术爱好者任晓平是哈尔滨医科大学从国外引进回来的。

虽然几乎他的所有国际国内同行对此嗤之以鼻，被国际主流医学界所抛弃，任的一位国内同行甚至不愿自己的名字和任出现在同一篇文章内。



任晓平（左）

但任晓平所任职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显然对于他所带来的“声誉”很满意：

时任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校长将任晓平视作是创新的典范，在一次公开的座谈会上，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夸奖任晓平“勇于创新、敢于创新，年轻医生应该向他们学习。”

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提到，任晓平的意大利合作者卡纳维罗非常羡慕任晓平的工作环境，“中国能给任晓平想要的一切，荣誉、人手、各种资源。

因为换头术带来的巨大争议，卡纳维罗和他所供职 22 年的都灵大学医学院解约。此后哈尔滨医科大学给予了他荣誉教授的名头。

2017 年，任晓平和卡纳维罗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完成两具遗体的头部移植后，全球最大的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当即发表申明：

“对病人没有任何好处，只为了吸引媒体眼球的行为，在伦理学上不可接受，在科学方面也毫无意义”。

这项手术也招致了中国的前任卫生部副部长、器官移植领域的专家黄洁夫的公开批评，但哈尔滨

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医大二附院骨科副主任任晓平仍然在这个三甲医院的一栋大楼里拥有三间宽敞明亮的实验室。

据《人物》杂志报道，任晓平每年都悉心准备材料，申报 973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试图为他的手术争取国家经费支持。

根据任晓平估计，做这台手术需要花费 4 亿。他觉得 4 亿并不多，对于这样一个对人类有重大突破的课题，“40 亿也应该把它解决下来。”

中国式伦理审查

露露娜娜的消息发布后的当天晚上，122 名科学家发布了联合声明，认为：“这项所谓的研究的生物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形容”。

在通过艾滋公益组织“白桦林”进行的参与者招募中，贺建奎声称自己需要招募有关“防护艾滋病和帮助生育”计划的志愿者，并可以为因国内的医学伦理规定而不能使用试管婴儿技术的 HIV 感染者夫妇免费做试管婴儿。

招募信息发出后，对研究感兴趣的夫妻远超了白桦的预期，几乎有 200 对夫妻报名，初筛后剩下 50 个，进入研究组的则有 20 对。

贺建奎利用“类似艾滋疫苗”的方式向这些夫妻解释了他的“CCR5 基因编辑”项目，并告知他们，这项技术“从未在人体上使用过，有一定风险”，获得了参与者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他认为，参与者能充分理解项目的风险。

身处病痛中的人，因为疾痛或是信息不对称，往往不能理性地权衡一项疗法的风险与收益，这便是一个专业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团队存在的初衷之一。

在创造历史的昨天，与露露娜娜的故事同时公布的还有一份“深圳和美妇儿专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里面有 7 个人的签名，签名者中有一名牙医和一名麻醉师。

根据 2016 年 12 月实施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人数不应少于 7 个。也许，还有法律和医学伦理方面的专业人士，那也是《审查办法》的硬性规定。

“我们认为这是符合伦理规范的”，林志通告诉来访的美联社记者。林是福建莆田人，接受采访时，记者给林的头衔是和美医院伦理委员会的负责人。

2015 年，林志通在深圳和美妇儿医院的官网上的头衔是 CEO。这也是中国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一个困局。

在《中国医学伦理学》中一篇对于天津市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调研中提到：绝大部分委员会主席是医院院长或党委书记，“因行政公务过于繁忙，可能不能发挥委员会主任的灵魂核心作用，且不利于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独立性运作要求”。

在那份调查中，几乎所有综合型伦理审查委员会都隶属于党办，伦理审查型的则有一些直接运作于临床基地或生殖中心。

在对浙江省 20 多家伦理审查委员会的 50 位委员的调研中则发现，55%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运作经费来源于其所在机构和审查收费，30%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运作经费全部来源于其所在机构，其余 15%的委员会则完全依靠审查收费。

我们电话了一位在数家医院的伦理审查委员会任职的社科专家，对方提到，伦理审查不能通过的项目确实不多，且否定的大部分原因是知情同意做得不到位，或是国际合作涉及样本外流。

而另一位医学人文学者则向我们评论道：国内大多数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审核知情同意书，他认为，这跟形同虚设差不多，“略好一点吧”。

据《华尔街日报》在今年 1 月的报道，杭州的一家医院在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癌症时，所在医院的审核委员会，只用了一下午就签字同意他进行试验，无需经过国家级监管机构的批准，不良反应报告方面要求也较少。这项试验的领导者，杭州市肿瘤医院院长吴式琇表示，本不该由中国第一个去做这件事，但这里的限制比较少。

而吴的美国同行们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来解决联邦机构等部门的要求，其中包括尽可能减小患者风险的种种安全审查，最终，他们仍然未能获得批准。

而对中国的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不足，多项研究曾提到，委员会成员缺乏对自身的教育和培训，生命伦理学水平不高。

伦理委员会的成员名单、知情同意书和章程，并没有硬性规定是否需要公开，有研究还提到，某些地方还存在“认为伦理委员会是保密机构的错误认识”。

在这种中国式伦理审查下，露露和娜娜出生了，杨永信发表了近百篇核心论文，其中包括三篇英文 SCI 论文，这些论文大多都按照要求附了伦理合规声明：该研究方案已经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所有实验参与者和他们的监护人都已按照规范签署了知情同意书”。（见推送 杨永信靠电人，发了 SCI 和近百篇核心期刊）。

想必，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进行的遗体头部移植也通过了伦理审查会的批准。

在最新的信息更新中，有媒体爆出了另一个贺建奎试验室正在进行的试验。在这项试验中，研究者计划对 400 个人类胚胎进行操作，“写入有利于预防疾病的遗传突变，调节致病基因表达，根治相关疾病”。

这项研究由某大学附属三甲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签字，并盖章“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无违反伦理。同意其申报。”

一日之间，一地鸡毛

这项研究由某大学附属三甲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签字，并盖章“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无违反伦理。同意其申报。”

就在贺的研究公布前两周，中山大学发布了《中国公众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认知与态度研究报告》，其中，72.97%的人赞成基因编辑技术用于“预防 HIV 感染”，更有 20%以上的人赞成利用基因编辑进行增强运动能力（22.45%），提高智商（23.9%），甚至，军事应用（23.95%）。

这是个对科技和未来充满乐观的国度。这里的人们对科技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与崇敬，而所有被这里的人们热爱的科技中，顶受欢迎的，毫无疑问是那些弥漫着高精尖气息的基因的研究。

三年前，在距离贺建奎实验室所在的深圳 1 小时车程的广州，中山大学的基因科学家黄军利用同样的技术篡改了被废弃的人类胚胎中一个可能导致地中海贫血症的基因，实验用了 86 个胚胎，修改成功的有 28 个。

六个月前，跟贺建奎的实验室同在深圳的基因测序公司华大基因的董事长在自己的演讲中提到员工中不允许有出生缺陷，不允许患心脑血管疾病，还要求员工活到 100 岁。这家公司因 19 年前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而声名鹊起，之后陆续破译了从水稻、家蚕到 SARS 病毒在内的各种基因序列，并正在参与一个目标为破译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基因组的“地球生物基因组计划”。



这也就不难理解，11月26日上午，当人民网的报道“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发布时，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这不是一项常规的，由同行评议的杂志发表的科技成果，然而，它却是中国主流报纸的科技报道喜欢的那种，“世界首例”、“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和“冲击诺奖”，最劲爆的元素一个不少。

然后，就像这世上所有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样，在高潮点上，不和谐的声音开始出现——“其他人之所以不做是被伦理所约束着”，“这不是高端科学的突破，而是伦理底线的突破”，甚至，“这不是创新，这是用全体中国科学家的美誉度，去换你和你团队的知名度”。

媒体开始援引美联社的一篇报道中外国专家的批评，譬如：被修改的那个基因虽然可以使人不易

感染艾滋，却可能会令人更易死于流感。更有媒体贴出了与这项研究相关的一份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

这一次，反对者们赢了。下午，坏消息接踵而来。

出现在美联社报道中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声明：自己没做过此项目；深圳市卫计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声明：试验未经医学伦理报备，正开会研究；而那份伦理审查文件也变成了一个罗生门，签字者们纷纷表示，自己不知情，未参会，“没签字”。

到了下午 5 点多，122 名中国科学家联合声明，“对此项研究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除了表达了对这项研究为两位婴儿和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风险的担忧，那份声明的末尾说：“确实不排除可能性此次生出来的孩子一段时间内基本健康，但是程序不正义和将来继续执行带来的对人类群体的潜在风险和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晚上，贺建奎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发表声明，该副教授已于今年的 2 月在学校办理了停薪留职，其研究作为校外开展，学校并不知情，并表示：“生物系学术委员会认为其严重违背了学术伦理合学术规范”。

这类的声明日渐扩大，相关的部门都忙不迭站出来撇清。到第二日凌晨，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在微博上发表了声明：“我委从未立项资助‘CCR5 基因编辑’等自由探索项目”，否认了自己对贺建奎研究的资助。

第二天是周二，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在与深圳一桥之隔的香港召开。那场大会上，基因编辑婴儿的新闻成了热门。对这项研究，第一位主讲的中国生命伦理学资深学者邱仁宗表示：“贺博士做的是生殖细胞基因组强化，这个操作是伦理上最难以接受的一种。”

基因编辑技术的发明人之一 Jennifer Doudna 表示，“希望这一新闻不要损害到目前使用 CRISPR 技术的重要临床试验。”

部分学者甚至联名要求禁止贺建奎参加这次峰会。

但大会最终还是给了他一个机会。

只是，对于那两个基因编辑的婴儿露露和娜娜来说，他们再也没有了选择的机会。 ■■

[【返回目录】](#)

福山：我们为什么担忧“基因编辑”？

[**弗朗西斯·福山** 美国作家、政治经济学者。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理想国 imaginst]



原编者按：《银翼杀手：2049》中复制人共同守护着一个秘密——在多年以前，有一个克隆人生下了自己的孩子。为了守护这个秘密，无数复制人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这个秘密被他们视为“奇迹”。

当我们去思考为什么复制人将自己孕育孩子看得如此之重时，我们会发现这背后的宗教逻辑。当人生产出“复制人”的时候，人是“复制人”的上帝，“复制人”必须忠诚于、服务于自己的上帝——“人”。当复制人拥有生育能力之后，人就从“神”的高处跌落，复制人不再是被创造者，他们开始拥有了与“人”同等的地位，他们成为自己的上帝，无需成为人的奴仆。

而当人可以修改自身基因的时候，一个问题便自然出现——人类中的“谁”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他们又何以成为造物主支配其他人的命运？谁给了他们这个权力？今天首例基因编辑婴儿新闻爆出之后，又一次引发热议，基因改造一直以来都是充满争议的话题。基因问题将撼动我们对人性的认知，如果连自己的基因都可以改变，那么有什么永恒之物可以成为人性信仰的支撑？

今天，主页君摘选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中对生物技术的思考，分享给大家。

1. 人工婴儿之路

现代基因工程的最大期待是诞生人工婴儿。

详细说来，科学家将能够辨认出决定一个人特征的基因，比如智商、身高、发色、进攻性或自尊感等，并用这些知识来塑造一个条件更好的婴儿。这个尚在探寻中的基因还可能不是来自人体本身。

转基因技术在人体上的实验，现在看来是顶遥远的事情。有两种方法可能实现基因工程：体细胞基因治疗或生殖细胞系基因工程。体细胞基因治疗的方法，是通过细菌或其他载体实现新的、已经改造的基因的传播，从而改变目标细胞的 DNA。这种方法的难题是，人体内有上千亿的体细胞，要使疗法奏效，需要改变上百万的体细胞。如果不出意外，这些改变的体细胞会与人同时死亡；这个治疗不会产生代际遗传。

不同的是，生殖细胞系基因工程已经在农业领域得到例行应用，在很多动物身上也已成功实施。对生殖细胞系基因的修改，理论上，只要改变受精卵内的一组 DNA 分子，随后通过细胞的分裂和分化，就能长出一个完整的人。体细胞基因治疗只会改变体细胞的 DNA，因此也只能对受改造的本人有影响，而生殖细胞系基因的改变则会有遗传的作用。这对治疗遗传疾病特别有吸引力，比如糖尿病。

可是，在人类利用这些方式对基因进行改变前，有一大堆棘手的难题摆在眼前。首先就是这个问题的极端复杂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人类高端行为进行基因改造几近不可能。

对人类基因工程的第二个阻碍是在人体上进行实验的伦理担忧。国家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以“用人体进行实验非常危险”为由，寻求对“人体克隆”颁布短期禁令。在多莉羊被克隆成功前进行了 270 次失败的实验。许多的失败出现在植入阶段，将近 30% 的克隆动物有着种种严重的反常症状。如果出生的婴儿并没有较大的成功把握，或者克隆过程产生的缺陷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人们就没有那么急迫地想要制造人工婴儿。



伊恩·维尔穆特爵士和他创造的克隆羊多莉

考虑到基因与表现型终极表达之间复杂的因果通路，克隆产生的危害极有可能被放大。后果难以意料这一法则将被无情印证：对某一特定疾病敏感的基因可能有第二甚至第三层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在基因更改时没有被察觉，它们可能数年甚至隔代才能体现。

既然基因工程有着这么多限制，这是否意味着，不管将来基因工程对人性进行何种有意义的改变，我们都不用再探讨了？这一论断言之尚早，得出这一结论前我们还需要谨慎地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当前的生命科学正以显著和超出人类预期的速度向前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基因学家有一个共识，不可能从成年个体的体细胞中克隆出哺乳动物，然而 1997 年多莉羊的诞生终结了这一看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基因学家预测人类基因工程项目可能会在 2010 年至 2020 年间完成，然而，新式的高度自动化的排序机器在 2000 年 7 月就结束了该项目。现在我们可能无法预期，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新的捷径，缩短复杂任务的研究时间。

基因的多重功用及其相互作用的极端复杂性并不意味着在完全弄清这些作用模式前，人类基因工程会一筹莫展。很多时候，一项新式药品被发明、试用或许可上市时，厂家并不能完全确认它们的疗效。在药理学领域，通常需要数年才能发现药品的副作用，有时药物也会与其他药物或环境产生交互作用，而这些在引进药物时完全没有预料到。基因工程师可以先解决简单的问题，然后一步步拾级而上，向复杂性出发。

在“人体上进行实验”的问题是对基因工程迅速发展的重大障碍，但并非不可逾越。药品试用时，动物会首先承担大部分风险。以人体进行实验时的风险可接受度，取决于这个项目因此能带来的好处：比如，亨氏舞蹈症，它有 50% 的机会让人变成痴呆或死亡，后代也会因此携带错误的等位基因。这种疾病就可以区别对待，它和增加肌肉紧张度或胸围完全不同。只是因为可能产生未预期或长期的副作用，人们并不会止步寻求基因治疗，只要它在早期阶段有治疗的效果。

至于，基因工程的优生或非优生是否会广泛传播以至于改变人性，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问题。很显然，任何基因工程的手法要想对整个人群产生显著的影响，它必须是非常有用、相当安全和价格低廉的。人工婴儿初期一定会相当昂贵，仅仅会成为富人的选择。人工婴儿是否会越来越便宜并因此而流行起来，这取决于科技进展的速度，比如，可以比较胚胎着床前诊断下降的价格曲线。

没有人知道，将来基因工程是否会如超声波和堕胎一样便宜和随处可见。这很大程度上还得取决于它所能带来的好处。当前在生物伦理学家看来最为普遍的担忧是，这一技术只有富人可及。假使，将来的生物技术能够使用一种相当安全且行之有效的基因手段，来制造更为高智商的孩子，那么这一危险性将大大提高。这种情形下，发达和民主福利的国家将会重新进入优生游戏，这一次不是为了阻止低智商婴儿的出生，而是用基因手法帮助天生残缺的人提升他们及他们后代的智商。这时，国家会要求这种技术的价格保持在低廉和人人可及的水准。这时，一个全人类层面的影响将真正成为可能。

即便基因工程未能成为现实，生物技术发展的前三个阶段——对基因因果链的更为熟悉的了解、神经药理学的进展以及寿命的延长——仍然会对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发展将会面临极大的争议，因为它们挑战了人们深为珍视的平等和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这些发展给了社会新的控制公民行为的手段；这些发展会改变我们对人的品性及认同的传统理解；这些发展将会颠倒现存的社会结构，深深改变人们智商、财富的比例以及政治进程；这些发展将会重塑全球政治的性质。

其次，即便对人类整个种族产生影响的基因工程需要二十五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但它却是迄

今为止最为有影响力的生物技术的进展。这是因为人性是公正、道德和美好生活的根基，而这些都会因为这项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得到颠覆式的改变。

2. 我们为什么应该担忧

面对人类未来可能的道路，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担心生物技术呢？

优生学是悬在整个基因学之上的幽灵——它意味着，只专门生育有着优选的遗传特征的人类。优生学一词由查尔斯·达尔文的侄子弗朗西斯·加尔顿 (Francis Galton) 发明。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家支持的优生学计划曾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些支持的人群不限于右翼的激进分子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还包括费边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伯和西德尼·韦伯夫妇 (Beatrice and Sidney Webb)、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共产主义分子霍尔丹 (J. B. S. Haldane)、伯纳尔 (J. D. Bernal)，甚至女性主义和生育控制支持者玛格丽特·桑格尔 (Margaret Sanger)。

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还因此通过了优生学的法律，允许国家强制性对低能者绝育，而鼓励拥有优秀品质的人尽可能地多生养。用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的话来说：

“我们需要健康、品性好、情绪稳定、富有同情心和聪明的人，我们不需要傻子、蠢货、穷鬼和罪犯。”

希特勒的优生政策——灭绝整个民族和在劣等人身上进行医学实验——曝光后，优生学运动在美国被禁止了。自那以后，欧洲大陆被灌输了反对优生学死灰复燃的理念，任何形式的基因研究都不再受到待见。对优生学的反对并非全球性的：在进步主义的、社会民主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优生学的法令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被废止。在亚洲，除了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在老百姓身上进行强制性医药实验（就是臭名昭著的 731 部队），其他亚洲国家对优生概念并没有强烈的反对。

以往优生理念的第二个缺陷是它由国家支持且带有强制性。纳粹党把这一政策演绎到令人十分恐惧的极端地步，滥杀无辜，在“劣等人”身上做实验。即便是在美国，也极有可能将这些被认为低能或痴愚的人（这个专有名词用来形容精神状况涣散者）诉诸法庭进行裁决，并且以命令的方式强制性绝育。

基因工程又将优生学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讨论桌；很清晰的一点是，任何将来优生学采取的方法都将与历史上的路径大不相同，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会如此。这是因为上面的两点错误都将不会再被应用，将来的优生理念将会更为友善、更为温和，渐渐祛除以往附加在这一概念上的恐怖印象。

第一个阻碍（即优生学在技术上不可行）只会出现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比如，强制不孕。生物检测技术的进展目前已经可以使医生在夫妇想要生育孩子前探测到母体携带的隐性基因，未来也许能进一步拓展到对遗传了父母双隐性基因的胚胎高畸形率的检测。目前，在某类人群身上获取此类型信息已经成为可能，比如，德系犹太人比正常人携带泰—萨克斯基因的可能性更高；这样一来，携带此基因的双方可能会因此决定不结婚或不生小孩。未来，生殖细胞系工程将提供这样的可能

性，如上这些隐性基因可以被清除，特定隐性基因携带者的后代将免受影响。要是这样的治疗方法容易获取且价格低廉，那么，人类整体大规模剔除掉某一基因的设想将成为可能。

对优生学的第二个阻碍（即它由国家推动），在未来的比重中将不成为主流，因为几乎没有现代社会想要回到优生竞赛的时代。事实上，二战以后，所有西方国家已经朝保护个人权利的方向大步迈进，由个体自主决定生育问题的权利在人权中排位很前。认为国家对其公民基因库健康等类似集体事务的担忧具有合法性的观点，不再受社会认可，反而会被认为是已经过时的种族主义和傲慢的精英态度。

已初现端倪的更友善更温和的优生学将成为生育双方的个人选择，而非国家强制性对其公民施行。一位评论员这样说道：“过去的优生学要求对合适基因繁殖进行持续筛选，并剔除不合适基因。新的优生学，原则上将允许所有不合适基因向最高的基因水准转化。”

生育方目前已经能够做出这类选择，当他们通过羊膜穿刺术发现婴儿有患唐氏综合征的高危可能性时，可以决定引产。将来，新的优生学将会导向更多人为流产和舍弃胚胎，这也是反对流产者如此激烈反对生物技术的原因。但未来优生学并不会对生育父母施行强制措施，也不会对他们的生育权利设限。反而，他们的生育选择被大大拓宽了，因为类似不孕、先天畸形等一系列其他问题都不再需要担忧。更有可能预期的是，未来生育技术会足够安全、有效，不再会有胚胎被舍弃或受到损害。

当谈到未来的基因工程时，我个人更偏好于放弃使用已经不堪重负的“优生学”一词，取而代之以“选育”（breeding）一词。未来，我们将极有可能像育种动物一般选育人类，只是手法更加科学、方式更为有效，我们将通过基因遴选决定哪些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选育已经不必要有“国家力挺”的内涵，更适当的表达是，它显示了基因工程不断“去人类化”的潜质。

因而，任何反对人类基因工程的观点都不必要因牵扯到国家倡议或有政府强制的预期而失焦。尽管如此，选育新人类观点的反对者仍然需要阐明，在重构孩子基因一事上，个体父母的自由抉择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尽管父母不会故意伤害孩子，但他们会试图最大化自己的幸福指数。自由至上主义作家弗吉尼亚·波斯特丽尔（Virginia Postrel）这样写道：“人们想要推进基因技术的发展，是因为他们出于自身目的想要利用它，他们希望它能够帮助自己和后代，保持自己的人性……在一个个人选择和责任已是去中心化的动态体系里，人们除了信任自己不需要信任任何权威。

根据经济学理论，只有当个人选择导致“负外部性”时——也就是说，当危害带来的代价由完全没有参与交易的第三方来承担时——社会危害才会形成集成式影响。举个例子，一家公司可能通过向当地的河流倾倒有毒废料而获益，但它会影响到附近社区成员的利益。类似的效果已经在 Bt 转基因玉米上体现出来：它能够制造毒素杀死一种欧洲当地的害虫玉米螟，然而，它也会因此误杀帝王蝶。这里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由生物技术方面的个人选择带来负外部性，因而导致整个社会受累？

在基因更改中，没有被征求是否同意但却是参与主体的孩子，很显然就是可能受到潜在伤害的第三方。现行的家庭法假定父母与孩子间有共同的利益，因而会在抚养和教育后代上给予父母较大空间。自由至上主义者强调，既然大多数父母只想给予孩子最好的，这意味着孩子某种程度的隐性同意，孩子是更高智商、更好看的容貌和更满意的基因特质的直接受益方。然而，仍然存在较多的可能，对于生育技术的选择对父母是有利的，而对孩子则可能带来伤害。

3. 什么符合孩子最好的利益？

父母在此问题上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断，因为他们通常依据自己的议程来征询并倚赖科学家与医生的建议。出于单纯野心希望掌控人类本性，或在纯粹意识形态假定的基础上设定人类可以成为的样子，这种冲动实在太司空见惯了。

记者约翰·科拉品托（John Colapinto）在他的书《回归自然》（As Nature Made Him）中描绘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故事主人公大卫·赖默尔承受了双重的不幸，在一次糟糕的事故中他的阴茎不幸被烧灼，其后他又处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常著名的性别专家约翰·莫尼的监管之下。约翰·莫尼处在“自然—人工谁更重要”争论的另一极端，他坚持认为，终其一生职业所得，所谓的性别认同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出生之后所建构的。大卫·赖默尔为莫尼提供了一个证实他的理论的机会。大卫是单卵双胞胎的其中一个，因而可以与他基因同样的双胞胎兄弟进行比较。在那次烧灼事故后，莫尼对大卫进行了阉割，并将他作为一个女孩来抚养，取名布伦达。

布伦达的生活就是一个私人地狱，因为她自己知道，不像她父母和莫尼所说，她其实是一个男孩，并非女孩。一开始的时候，她坚持站着小便而不愿坐下。后来：

加入了女童子军，布伦达的生活简直糟透了。“我仍然记得编织菊花环和女孩方式的思考。如果那是女童子军当中最让人兴奋的事情，我还是忘掉它吧。”大卫这样回忆道，“我不断在想我的哥哥在幼童军所做的那些有意思的事。”圣诞节和生日时，布伦达会收到娃娃作为礼物，但她拒绝玩这些娃娃。

“你能和娃娃玩什么？”今天的大卫反问道，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沮丧。“看着娃娃？给她穿衣服？然后脱下衣服？给她梳头发？这太无趣了！如果有一台小车，你可以驾驶着去一个地方，非常有成就感，我需要汽车。”

试图创造一个新的性别认同的努力带来如此严重的情感折磨，以至布伦达一到青春期后，就与莫尼解除监管关系，并且通过阴茎再造手术完成了性别的转换；据说现在的大卫·赖默尔已经结婚，并且生活得很快乐。

目前，对于性别的差异已经能够有很好的理解，它从出生前就开始了，当人类男性的脑部（其他动物也是如此）在子宫里浸泡在睾丸素中，会经历一个“男性化”的过程。然而，这个故事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尽管将近十五年，莫尼在他的学术论文中断定他已经成功将布伦达的性别认同转换成了女孩，

但事实却正好相反。莫尼因为他的研究而声誉广播。他的欺骗性研究成果得到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著作《性别政治》（Sexual Politics）的呼应，受到《时代》杂志的关注，获得《纽约时报》的致意，并被编纂进无数的教科书中，其中一本教科书这样引用道，它证明“孩子可以被轻易地培养成为相反的性别”，并且到底天生的性别差异在人类中是否存在“是尚不明确，并且可以通过文化习得进行掌控”。

大卫·赖默尔的例子可以作为未来如何使用生物技术的有益提醒。大卫的父母是出于爱而做此选择，他们对儿子被灼伤的遭遇感到绝望，因而同意进行这个“令人恐惧”的治疗，随后很多年他们都深感自责。约翰·莫尼却受科研虚荣心、学术野心、创造一个意识形态指向的欲望等一系列原因的驱使，令他忽视相反的证据，并且完全与他的病人的个人利益相背而行。

文化的规范也可能使得父母做出损害孩子利益的选择。有个例子我们先前略有提及，在亚洲，人们用声波图来判断后代的性别并选择是否流产。在许多亚洲国家的文化中，生儿子意味着在社会声誉和养老上的明显优势。但这明显对那些未出生就夭折的女婴是一种伤害。失衡的性别比例同样使男性作为一个整体难于找到匹配的伴侣，并且减低了他们在婚姻市场与女性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如果未好好教养的男性可能给社会带来更危险的暴力和恐怖行为，那么如此一来，整个社会都会因此遭殃。

在诸如智力这样的个别特征上这类负外部性可能更为显著，增强智力被认为是将来基因改进的最显著目标。在生殖与智商高度相关的情形下，一个拥有较高平均智商的社会可能更为富有。但是很多父母追求的智商增进，在许多方面将会被证明是虚幻的，因为更高智商的优势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比如，人们想生养智商更高的孩子，因此他们能够挤进哈佛，但能够取得哈佛录取资格的竞争是零和的：这意味着如果我的孩子通过基因治疗的方式更加聪明，并且入读哈佛，那么他/她就可能取代了你的小孩。我做出决定要一个人工婴儿，会让你承担后果（或者说，你的小孩承担后果），但整体说来，谁更富有这并不清楚。这种类似的基因“军备竞赛”会对下面一类人产生特定的负担，这些人，由于宗教或其他原因，不愿对孩子进行基因改造；如果周围的人都在这么做，对他们而言想要坚持放弃的决定就会愈加艰难，因为担心会阻挡孩子的前程。

尽管人们在担忧未曾意想的结局和不可预见的代价，人们心中所隐藏的深层的对于生物技术的忧虑却一点儿也不是功利主义的。终极意义上，毋宁说人们担心的是，生物技术会让人类丧失人性——正是这种根本的特质不因世事斗转星移，支撑我们成为我们、决定我们未来走向何处。更糟糕的是，生物技术改变了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我们将站在人类与后人类历史这一巨大分水岭的另一边，但我们却没意识到分水岭业已形成，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 ■■■

[【返回目录】](#)

张悦悦：生命科学崛起，缺乏公众有效参与的僵局何解？

[张悦悦 英国肯特大学社会政策、社会学和社会研究学院副教授。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

原编者按：

“好”！对刚刚结束的一场演讲，现场有观众发出赞叹，并报以掌声，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呈现出不可多得的轻松时刻。好几天来，贺建奎制造的“紧张”的会议气氛得以稍稍缓解。

2018年11月29日，是峰会的最后一天，公众参与也是大会的最后一个主题。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家张悦悦分享了公众和公众参与对于中国全球崛起的重要性。

她指出，中国和公众沟通科学似乎陷入了僵局，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科学的公众参与更多是单向的科学普及，公众可以获得科学知识，但缺少对科学的信任。推进科学界和公众的对话，信心与能力的建设同样重要，中国的科学家必须习惯于拿出证据去同公众互动，而来自体制内的信心也至关重要。

张悦悦强调，公众参与的这些困境并非中国独有。中国科学家们向全球公众清晰地传达突破性研究的机遇与风险，是全世界科学家学习如何与公众沟通的一部分。最后，她呼吁，除了加强科学研究上的合作，西方也应当和中国科学家一起，共同建立一套完善的公众对话机制，让大众理解基因编辑技术并从中获益。

以下为报告全文译文。未经张悦悦本人审阅。



演讲者张悦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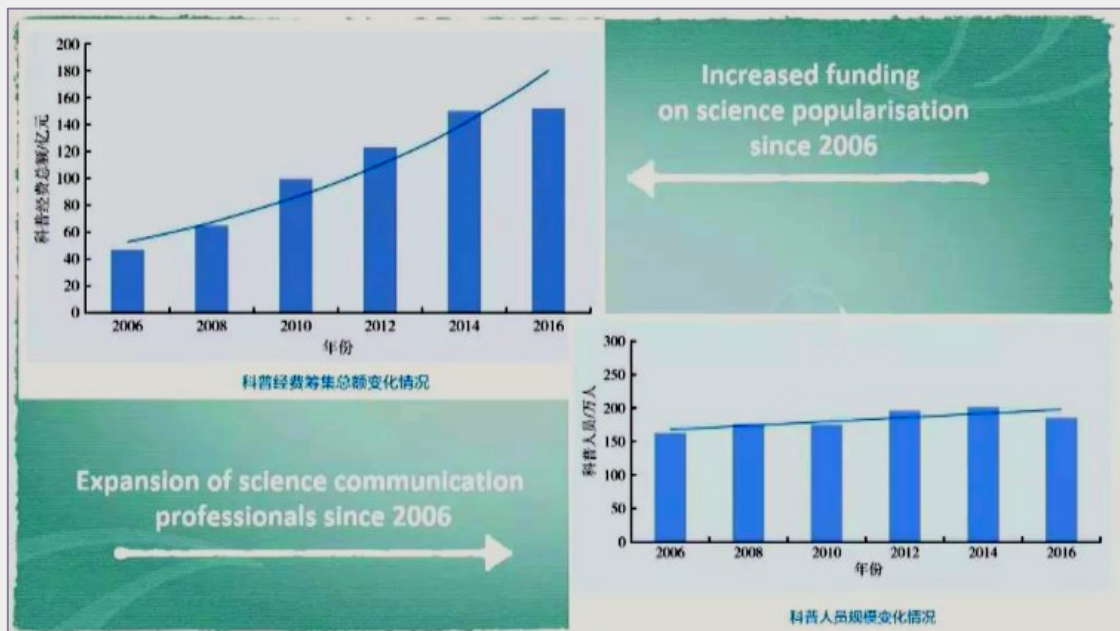
谢谢你们。感谢组织委员会的邀请，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

我是来自英国的社会学家，过去的十四年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生命科学的崛起及其全球影响。

在此我要坦白：一段时间内我真的不认为公众和公众的参与对中国的全球崛起以及我自己的研究是那么重要。这种感觉其实是很多人共有的：我在中国一些大的城市采访的科学家、伦理学家和监管者，以及在欧洲和我讨论过的中国观察家。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意识到公众参与的价值，而是因为中国的科技系统是高度中心化的，正如很多人向我指出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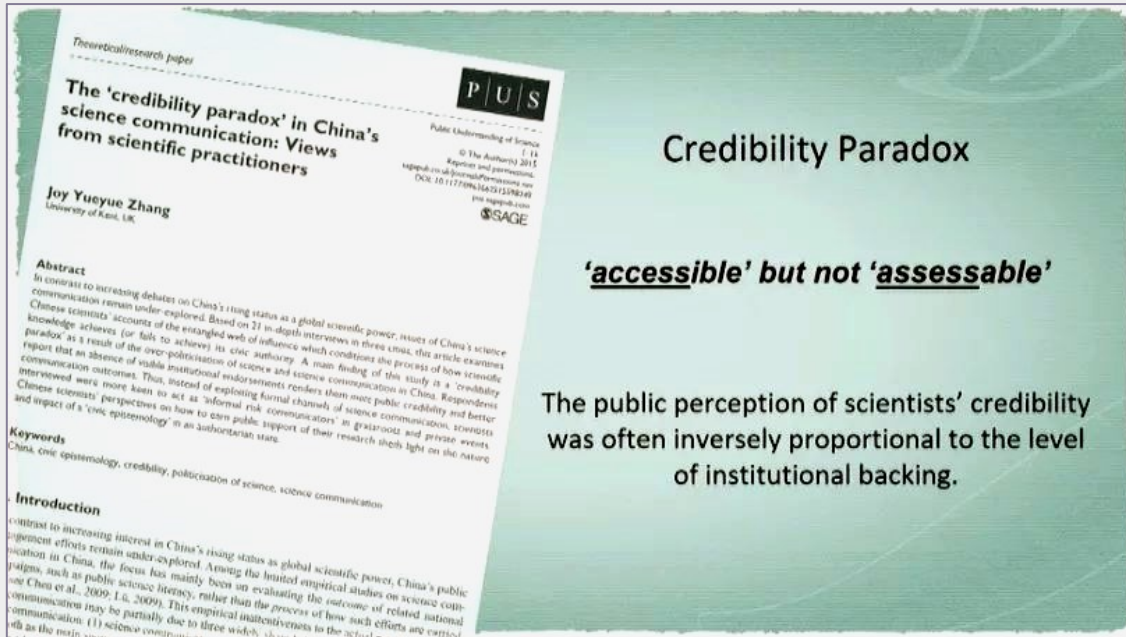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如果想要开展前沿研究项目，真正唯一需要的就是自上而下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虽然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论文产出国，但公众参与却还处在很初级的阶段。

但是最近几年中国科学家对于和公众沟通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部分的原因是公众对于生命科学应用的伦理担忧逐渐增加，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所有的这些都让中国的主流研究员更加留意社会上是怎么理解自己的研究的。与此同时，政府也在重新整合对这个领域的投入。



但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其一，这些投入主要还是集中在政府单向的科学普及，而不是双向的参与；其二，过去三年几乎所有我采访过的生物学家都说他们其实很不情愿参与机构组织的或者政府资助的公众项目，因为被我称为的“可信度悖论”：一个科学家的公众可信度常常和他背后的政府机构支持成反比。所以当他们作为机构的科学家来发声时，常常感觉到不公正的污蔑和怀疑。我们对于公众的研究也确认这种对于沟通的怀疑是相互的。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公众是反科学的，而是因为他们感到这些政府活动常常是为了履行提前制定好的章程，而不是真诚的讨论。对于公众来说，这些活动让科学的证据可以获得，但难以评估。这种相互的怀疑导致了我称为的“没有参与度的公众参与”。比如说每年都有转基因作物的品尝大会，公众被邀请去品尝新研发的转基因作物，但这样的活动并没有拓展中国的转基因争论，因为组织者要求只有自我认定为支持转基因的人才能参与。正如一位科学家总结的那样，“如果公众就是愤世嫉俗的，那我看不到对话的基础”。你看，科学家们也感觉很受伤。所以

中国的问题是，和公众沟通科学似乎陷入了僵局。



过去的几年，我们开展了一些“SciAc”项目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项目的路线图。因为时间的限制，我只讲其中一个。



2017年3月，我们在武汉开展了一个公众参与科学的中-英多方研讨会。两天的时间里60位代表，包括科学家、伦理学家、监管者以及感兴趣的公众，虽然对转基因有不同的观点，但聚在一起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挫折。

在组织这场活动的时候，我并没有受到许多人的欢迎。我们邀请的生物科学家大多认为他们没有“资格”去向公众讲述自己的工作，因为这一环节通常都是由学院的领导或是知名科学家来完成的。另一方面，公众代表在担心他们在“智力”上不会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在武汉的主办机构对于活动十

分支持，但也很担心公开辩论最终可能失控，并且需要安保人员。可以说我们把每一方都推出了自己的“舒适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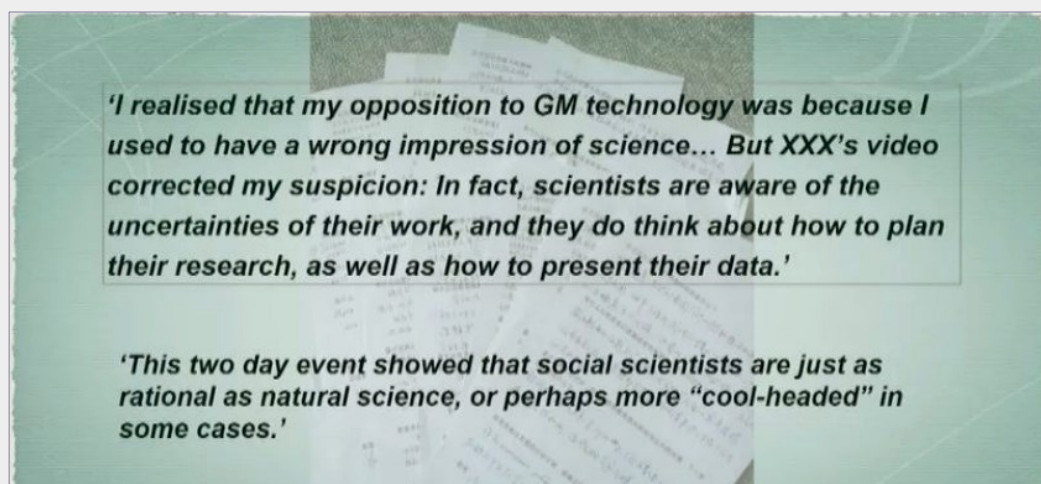
我们的确设置了一条底线，那就是每一个参与讨论的人都要将自身观点基于实证，而不是基于价值观的评价。比如，告诉我们你的工作是如何完成的？你的哪段经历使你持有今天的观点。换句话说，我们希望参与者能够讲出自己观点形成的过程，而不仅是一个既成的信念。

大家可能很感兴趣这场活动最终进行得如何，我认为下面的图片可以很好地表明当时的情况。在活动中，的确有过氛围紧张的时刻，但总体而言，参与者们同彼此相处得很和谐。所以我认为，我们设置的底线是有效的。



在活动结束时，我们收集了参与者的反馈。他们所传达的信息是非常有启示的，下面我来举出两个例子。

第一段话来自于一名公众参与者：



“我意识到自己从前对于基因编辑技术的反对是来自我对于科学的误解。他的视频打消了我的怀疑：事实上，科学家对自己研究的不确定性是有足够了解的。他们花很多心思去规划自己的研究和呈现自己的数据。”

第二段话是来自一位业内领先的科学家：

“这两天的活动显示出社会科学家是和自然科学家同样理性的。在某些情况下，前者甚至要更加冷静。”

我真的很喜欢这段话，每次读到都想笑。这些反馈很有启示性，因为从中我们可以懂得如何才能使公众（对我们的研究）更安心。很多时候，他们真正想要了解的并不是那些专业细则，而是我们的科学推理是否也将更广泛的社会选择与机会成本也纳入其中。这与我们在欧洲所观察到的十分相似。

我想让大家再来看看第二段话。它让我们意识到，（作为科学家，）我们时常忘记，同自己领域之外，不讲着我们专业术语的人去沟通，可以是一件令人恼火的事情，因为那使我们感到处于弱势。

因此，我认为，推进科学界和公众的对话，信心与能力的建设是同样重要的。中国的科学家必须习惯于拿出证据去同公众进行互动，这是（相关）研究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情境下，我认为来自体制内的信心也是至关重要的。应当意识到，并非所有辩论都意味着争论或不满，相反，我认为正是今天公众对科学探讨的缺失才导致了一些科学问题的政治化。

对于中国而言，建立与其科技发展雄心相匹配的公众对话机制显然是任重而道远。不过，我对此仍然十分乐观，因为在调研中我们看到了来自上下两端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与好的意愿。许多中国大学很希望使用我们同中科院共同开发的“公众对话模型”资源，将其融入到科学课程中，使新一代科学家具备更好的能力去同公众交流。去年年底，我们还向中国科技部提出了六点建议，希望将更多资金与教学资源投入到公众科学素养的培育中。就在几周前，我被这一部门邀请去给科技部的官员做了讲座，包括它的三位领导。在讲座结束后，其中一位领导告诉我，我们应当考虑为政府提供咨询的机会，并强调其“刻不容缓”的紧迫性。正是这样来源于上下两端的热情，让我对前景感到乐观。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中国公众在科学中的角色是一个值得全球关注的话题。今天的中国已然在一些科技领域处于最前沿地位，今后还将有着更大进展，因此我们需要作为探路者的中国科学家们向全球公众清晰地传达他们突破性研究的风险与机遇。我认为这将是世界科学共同学习的一个过程，因为我所讲述的这些困境都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在此我呼吁，除了同中国加强科学研究上的合作，西方也应当同中国科学家共同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公众对话机制，让基因编辑技术为大众所理解，并受用于它。 ■

[【返回目录】](#)

韩大元：当代科技发展的宪法界限

[**韩大元** 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根据作者 2018 年 4 月 14 日在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演讲记录稿整理，首发于《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 年第 5 期]



本文作者**韩大元**教授

内容摘要：法学的使命不是赞赏科技发展带来辉煌的成就，而是要审视科技可能带来非理性的后果，以及如何通过法治降低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与非理性，如何通过宪法控制科技对人类文明、尊严与未来的威胁。在当代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科技发展具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面前，我们要更加珍惜人类文明的价值，更加重视宪法功能和宪法价值，更加强化宪法的价值共识——人类共同体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价值，让宪法真正成为这个时代最具有价值共识的最高法、高级法。

一、演讲题目的思考

最近宪法学研究方面有很多热点问题，在国际社会也出现很多新的宪法问题。其中，如何用宪法价值约束科技的非理性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美国出现 facebook 泄露近 8000 多万用户信息的事情后，这种担心更加重了。

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重大宪法问题是，如何在科技发展的背景下保持人的尊严。我们看到经济发展，特别是科技技术发展、信息化和各个国家之间科技竞争越来越激烈，但人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不是越来越提升，而是越来越边缘化。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在自己创造的科技面前、信息化面前反而使得主体的价值越来越贬低，越来越减损。

所以，我们需要共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类的未来在哪里？目前很多法学院、科研机构花很多力气研究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中央政府也放弃“科技中立”的立场，出台人工智能方面的政策，直接介入科技发展的进程中。司法机关纷纷推出智慧法院、智慧检察院等。我们要考虑，所谓 AI 是否需要我们花这样大气力研究？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过了十年、二十年后法学院还需不需要呢？如果人工智能可以代替律师的工作、法官的工作、检察官的工作，我们还需要培养法官、检察官吗？一般的法律服务市场里，AI 确实可能替代我们一些重复性的劳动。当所谓的机器人来代替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时，包括部分法律服务市场的工作时，我们要想一下，那个时候人类会怎么样？学法律的人至少要考虑五十年以后的世界，法律并不仅仅是为了今天的生活而安排的，而是为了对明天的生活有合理期待，所以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科技与法治、技术与人的尊严等基础性问题，包括法治的现代功能。过去我们过于依赖于事后追责为核心的救济机制，包括国家赔偿。但在信息化的时代，当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处于边缘化，生命、健康的价值受损而无法“恢复”的时候，再有效的事后救济也无法挽回已经失去的生命，无法挽回受伤害的人的尊严和人的思想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要思考怎么样把法治功能从事后的救济提前到事先的预防功能，强化立法性功能，预防对人的尊严、生命与健康的伤害。

美国政府最近对叙利亚进行打击，理由也很简单，说叙利亚政府使用了一个化学武器。这里暂且不谈这个理由是否成立，在国际社会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化学武器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的，但是核武器并不是绝对禁止。五个核大国，包括中国在内，我们是有核武器的，但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核武器来维持和平衡世界的秩序，你有核武器，我也有核武器，你打我，我也打你，靠核武器的威慑建立平衡。所以，大国之间力量的所谓平衡，未必都是以和平为基础而建立，而是靠强大的核武器的威慑力。但是有些武器是绝对不能开发的，比如化武。自主的机器人绝对不能开发，自动的机器人是可以的。自主的机器人，如所谓的杀人机器人是不能开发的，因为它有独立的伤害人的决策能力；自动的武器，人类是可以控制的。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最大的考验：是选择坚持人类控制技术的文明发展史，还是要改变人类文明史，让所谓的无机生命代替有机生命。人越来越工具化，人的尊严越来越边缘化，似乎我们愿意把很多事情交给机器人做，那就想一想五十年后、一百年后人类会怎么样。我们要重新写人类文明史，当无机生命主宰我们的未来时，我们的法学、医学、文学，我们的创造文明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谈到 21 世纪的宪法挑战时，首先要谈到的问题就是在科技面前如何保障人的尊严性。宪法上的尊严性虽然是德国的概念，但它也成为了世界的基本共识。宪法上的尊严就是指人是主体性的、目的性的存在，绝对不能客体化。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感到，有时人越来越感受到人越来越客体化，为了国家、为了某种目的可以牺牲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甚至有的时候在整个国家发展面前，人成为一种客体化的东西，日益远离宪法上的尊严价值。

最近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在科技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当然要充分肯定科技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的积极作用，但法学的使命不是赞赏科技发展带来辉煌的成就。人类之所以需要法治，就是要思考科技可能带来什么样的非理性的后果，如何通过法治降低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与非理性，如何通过宪法控制科技对人类文明、尊严与未来的威胁。科技的非理性必然造成人的尊严的侵害，如何预防侵害，如何坚持人的尊严价值立场？要回答这个问题，文明需要回到宪法的基本共识。所以，今天的演讲重点谈一下科技对人的尊严的侵害与宪法控制手段，这也是讲座题目定为“科技发展的宪法界限”的原因。

二、对议题的研究进路

下面简单说一下我思考这一问题的总体思路。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宪法与科技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宪法学的基本命题和核心的价值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人性边缘化，以牺牲人性尊严为代价带来的任何发展，所谓的改革本质上是不符合现代宪法的基本价值，也就是远离了我们追求法治的理想，损害了人类的尊严，违背了人权发展的逻辑。任何时候，无论以任何理由，把人性边缘化而取得的任何一个辉煌、任何一个所谓的成果，都不符合我们所追求的法治理想，更不符合社会共识。

我的基本学术立场是：科技发展要基于人的尊严和宪法共识。任何时代科学技术都有双重性，既造福于人类，又损害人类。在座的各位同学，可能都有手机，我们的生活似乎离不开手机。我问一个问题，人类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手机技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目前世界上有多少人用手机？中国的手机用户到底有多少？不知道你们是否考虑过，当你决定用手机的时候，一天生活离不开手机的时候，你会失去隐私。大家都想一想，你用了手机后，对你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带来了哪些影响？也许负面的东西大于正面的东西，所以手机一方面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一些便利，但是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的尊严保护、隐私权的保护带来了风险与挑战，如果不加有效控制，将导致人的尊严的边缘化，人类会失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人类就没必要存在了！而要控制科技的非理性，在发展科技技术的同时，能够保护人们应有的尊严，消除给人类带来的风险，或者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我们必须选择一个制度安排，而这个制度安排就是“宪法治理”。

在这一点上，现代科技技术发展历史和宪法发展历史是大体对应的。没有宪法不可能有科技技术，而没有科技技术推动的宪法，也会失去动力。将宪法价值与科技价值加以平衡的重要平台就是宪法，有了宪法共识才能让人类继续生活在自由、幸福、有尊严的环境中，确保人类永远主宰未来，不会由技术来主宰人类，让人类的生活更加安定，不再恐惧，不再焦虑，不要害怕未来怎么样。

也可能有同学会说，我们可以关心五十年、七十年以后的事，但为什么要关心一百年以后的事情。答案就是，如果不以宪法控制科技的非理性，一百年以后我们将面临无法想象的社会。去年微软公司已经宣布，他们将发明 AI+基因改组技术，因为健康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基因，但是通过 AI 技术可以

改组人们的基因，把不好的基因重新改组，这样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也许能活到一百二十岁、一百五十岁。秦始皇当年想实现的长生不老的理想，在 AI 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但是同学们想一想，如果大家都活到一百岁，一百二十岁，人类会怎么样呢？地球能够承载的人口数是有限的，大概是 90 亿，不能超过 95 亿。如果人类的老龄化到了社会无法承受的时候，人类的生存空间也会出现问题。我们是否需要靠技术无限制地延长人的寿命？在现代科技发展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这些问题。

三、历史的视角：科技与宪法发展史

法学的同学都知道，人类最早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并不是经济学、新闻学，而是神学、医学和法学。我们确实需要思考为什么法学、神学和医学在一起，神学、医学和法学的共通点在哪里。南师大是全国有名的法学院，你们肯定为选择法学而自豪，因为人类最早的大学博罗尼亚大学、雅典大学，就三个学科，其他学科是没有的。所以，只要人类存在，法学学科是会存在的，因为人类生活需要法学、医学和神学。一百年之后、五十年后，其他学科就不好说了。所以同学们选择法学是对的，你是为一百年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三个学科共同的特点是：从人出发回到人。医学为什么存在？神学为什么存在？人类灵魂的安宁、身体的健康、社会疾病的治理靠人。其中法学是把神学、医学价值融合在一起的综合性学科，没有法治的保障，人类的灵魂是不得安宁的。关于医学，国家要保障每个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社会中每个人的健康权、生命权得到保障，需要有好的医生治病。社会的病靠法学来治疗，所以法学不仅是三个古典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把三个知识融合在一起的哲学。所以，任何一个时代，只要人类存在，法学就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法学，其他知识也失去了价值基础、规范基础、知识基础。从启蒙时代开始，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及正在经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宪法一方面推动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尽可能降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非理性和对人的尊严的侵害。

（一）启蒙与前启蒙时代：科学、理性与宪法观念

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到十七世纪末的科技发展，特别是近代科技发展史与宪法学是如何对应的。如果没有宪法的理念和知识，为人们带来灵魂安宁跟保护，我们所说的以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就不可能产生。

（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科技发展与理性主导的宪法的响应

同学们高中时就学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个工业革命产生了什么影响？如何解决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量非理性的社会问题？只能靠宪法，所以才有了 1787 年的美国宪法、1795 年的法国宪法，开始对科技进行保护。当科技发展无法自我解决矛盾的时候，人类需要更高级的规范来加以约束，一方面把科技发展纳入学术自由，另一方面用宪法的力量来约束，学术自由不能滥用，学术自由也有界限。所有的科技只能用于造福于人类的幸福生活。

(三)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列国竞争与国家主导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电的发现、内燃机的出现，使得我们的信息、沟通越来越便利，包括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各种市场、各种价值观能够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化的发展出现。这种时候如何融合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到底什么主义对人性的发展更有利？科技本身就提出这样一个课题，所以产生了今年在世界现代发展史的最大一个事件。

我不知道同学们是否了解 1918 年的苏俄宪法？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就是 1918 年苏俄宪法，1917 年的十月革命，催生了第一部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今年正好是一百年。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近代的宪法发展史和科技的发展史主要是讲一百年以来的历史，一百年以来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当我们回顾社会主义宪法在人类文明史上做出的重大贡献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很自豪，为什么呢？因为同学们知道“社会主义”这个词主要来自拉丁文的“社会”这个概念，而“社会”这个概念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公正、公平、均等，社会主义所体现的是人类的正义的价值追求，它的理念建立在 1918 年的苏俄宪法。大家都熟悉的 1919 年的魏玛宪法，从近代宪法向现代宪法转型的魏玛宪法，体现了强烈的社会主义宪法的因素。今天我们看到的德国宪法，包括劳动者的保护、社会福利、社会公平概念、劳动者罢工权的规定，其实思想来源都来自于 1918 年的苏俄宪法。魏玛宪法制定过程中，受到苏俄宪法的影响，把大量的社会主义的正义、公平的因素引入到资本主义宪法体系，明年正好是魏玛宪法的一百年，在回顾一百年的西方国家的宪法历史发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社会主义的正义理念。

所以在宪法与科技发展互动中，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宪法的强大生命力，我们的理念符合人类文明，正义的理念、公正的理念、均等的理念，关键是我们如何实现这些理念的问题。所以大家看，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很多难题是通过宪法解决的，包括 1918 年开始的一百年宪法。

(四) 第三次工业革命（战后）：人的尊严与宪法对科技发展的响应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大家最熟悉的，之后我们经历了世界大战，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因为战争时用的所有武器都是科学家发明的，包括最后美国扔在日本的原子弹，虽然某种意义上有利于结束二战，但是给日本人民的生命带来了灾难，人类第一次看到原子弹多么厉害。原子弹是怎么发明的？是科学家发明的。科学家是怎么发明的？宪法给予了科学研究的自由，国家不是中立的立场，国家是支持科研的，战争时每个国家都希望有最先进的武器对付敌对国，用于战场，但是战场涉及到如何保护好平民，减少战争中的死亡人数的问题。所以无论战争有多大的正当性，人类的生命都是最宝贵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中死亡的有一千多万人，由于贫困、饥荒死亡的有两千多万人。二战时失去了五千多万人，如果真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第四次世界大战或者核武器战争，也可能一瞬间我们会失去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个亿、几十亿人的生命，因为我们的武器（杀伤力）远远超过了二战时的武器，我们的武器是很先进的。我们开发武器，大规模地从事核武研发时追求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科学家们是否反思过？当技术发明的人没有法治的理性，使用者也没有人类理性时，那么

现今的武器会随意地剥夺（人的生命），或者说虽然他没有用所谓的武器，但这种武器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风险、安全的不确定性，也同样令人类恐惧。基于核武器本身的高度不安全性和不确定性，国际社会不得不有时候趋附于或者改变一些立场。所以未来会怎么样，是国际上很多宪法学者们都很担心的问题。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宪法理论、宪法秩序，但在一个原子弹、一个核武器面前，宪法到底有没有控制核武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需要思考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否是现在所说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恐惧。

（五）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否真的到来？

这一次的革命跟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工业革命不一样，它是完全以 AI 为核心的新的技术革命，它正在深刻地改变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及所有的领域理念，我们就问它会颠覆人的主体性吗，它会破坏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合理、稳定的预期吗？如何防范、规制和控制可能出现的风险？科学家们正在推动 AI 技术，希望无机生命有一天可以代替有机生命，要改写人类的历史，假设我们认为技术上是完全可能，但是如果这一天到来，人类的有机生命的结束，无机生命将会为人类文明带来什么？这些问题应该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各国政府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放弃了过去的一种中立的立场，积极、主动地引导推动，组织这样一种科技的开发和研究，将大量科研的经费用在技术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人类会不会出现我们所担心的技术非中立化、尊严的边缘化、人类生活的工具化及科技政策的庸俗化。按照宪法的价值，在技术没有达到确定性以前，哪怕有百分之一的风险的时候，政府是不应该放弃中立立场的，应该适当中立地看待问题。因为还有一些风险，包括转基因，到底能不能吃转基因，它的风险有多大，这个时候如果政府放弃了中立立场，说转基因是安全的，大家可以选择，可以吃，没问题。假如二十年、三十年后，出现健康的损害时，由谁承担责任？网络信息公司、科技产业，所谓的以私人企业或者以科技为闻名的一些产业，表面上是企业，但它实际上绑架了公权力。学术界，包括一些民众，在科技面前仍然是很脆弱的，我们这个时代充满着对科技的恐慌，法院、检察院也都在建设智慧法院、智慧检察院。

那么，法学院的使命在哪里？未来法学院到底如何回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培养的学生未来在科技面前，有没有作用，未来律师是不是可以通过一般的 AI 技术、AI 律师来代替？大概一个星期前，韩国第一次把 AI 律师投放到正式律师事务所，技术上我们看到一个统计数字，它大概是用一个小时能够解决过去大概七个人用三天时间完成的一般案件分类、案件归类的工作，其速度是非常快的。

总之，科技发展历史和宪法发展历史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没有宪法不可能有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没有科学技术的宪法，它也将失去动力。只有借助宪法，凝聚宪法共识，才能够让人类继续生活在自由、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中，确保人类永远主宰未来，不会由技术来主宰人类，让人类的生活更加安定，不再恐惧，不再焦虑，不再害怕未来怎么样。而如何确保这种趋势，避免出现相反的发展，这是在现代科技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四、科技发展对人的尊严构成了何种挑战

科技发展的正面积作用我们要充分的肯定，四次工业革命客观上推动了人类的发展，是不可否认的，如果我们否认了三次工业革命包括正在进行的四次工业革命对人类发展的贡献，那我们是不客观的。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科技发展带来进步和人们生活的便利的同时，它也带来了尊严的侵害和挑战，我们宪法学主要的功能是要看哪些挑战、哪些侵害。

（一）人工智能技术问题

人工智能是大家谈论最多的一个议题。它的最大的挑战就是人的主体性问题，人工智能会不会改变人的概念？人工智能会不会改变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在人工智能技术面前会怎么样？是不是可以继续坚持？人的道德判断会不会被解构进而被否定？我们所坚持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等一系列基本价值在 AI（人工智能）技术面前是不是会被削弱？我们这个时代充满着对科技的恐慌。很多法学院、学者都说人工智能、AI 如何如何好。很多法院都说智慧法学院、智慧检察院，过了十年、二十年后法学院还需不需要呢？人工智能可以代替律师的工作、法官的工作、检察官的工作？在这样的潮流面前，法学院的存在意义在哪里？法学院的使命在哪里？未来法学院到底怎么样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法学院的学生未来在 AI 技术发展面前还有没有作用？未来律师是不是可以通过一般的 AI 技术、AI 律师来代替？

可以说，一般性的重复工作，AI 律师都可以做到。有些律师事务所已经开始减少录用律师的需求。美国现在很多律师事务所，一方面使用所谓的 AI 律师来完成一般的文书分类、案例的整理等工作，另一方面在印度找印度律师事务所，委托他们完成一般的法律服务，因为录用美国法学院的毕业生太贵了，而印度律师所就比较便宜。那么，律师行业未来是不是肯定会被 AI 律师所代替？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 AI 是技术，技术不可能创造思想，只是对已有知识的模仿，对已有知识的整理。在这点上，人类的主体性是什么技术都代替不了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有人认为，智慧法院的一般案件可以让机器法官来做。但这是不可能，因为法院的判决一般是靠情感。机器人能判离婚案吗？它没有结过婚。民事案件当中有些法官为什么受欢迎，因为他根据夫妻两个在法庭上的表情，一个表情就知道这两个人感情是否破裂，是否还有感情，机器人是不可能这么判断的。所以我们要相信，科技的发展尽管很迅猛，但是机器人代替不了人类，从我们现在的认知来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二）隐私权问题

人类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隐私的基础上，隐私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信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而是关乎人的尊严，是人的尊严中最核心的内容。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性的存在，不能找到另外一个跟你一样的主体，即使是双胞胎也不例外，所以，人类的个性具有唯一性。人工智能的“人”则不同，它可以造一百个、一千个；类似地，克隆人也可以造成一千个、一万个。但是，人类的每个人都是独特性的

存在，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的独特性。因此，在科技技术面前必须保持独特性的隐私价值，人格的自由发展要获得全面的保护。在这方面，现在科技技术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人类确实是享受一些科技技术带来的便利，但另一方面在网络面前人类遇到一个强大的对手，因为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存储、加工等等都存放在第三平台。个人有信息的自主权，但是个人的自主权在第三平台，在多方的主体面前个人是很脆弱的，所以人们要么坚持隐私权的价值，保持自身的独特性，要么放弃个体的独特性，那么到底选择什么？要选择便利性或者便捷性，那就减少了隐私和减损了隐私的价值体系。

在前不久爆发的脸书（Facebook）泄密事件中，多达 8000 万脸书用户的个人信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一家名为“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分析企业用于设计软件，以预测并影响选民投票。英美媒体报道称，“剑桥分析公司”曾受雇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和英国“脱欧”全民公投的“脱欧”阵营。这是脸书创建以来最大的用户数据泄露事件之一，扎克伯格也因此在美国国会接受质询，将近八十多个议员用六个小时对扎克伯格进行了质问。“脸书”的安全性到底怎么样，为什么把信息给别人？剑桥分析公司做了一个改变选民的想法的软件设计，真的是改变一个国家选举的成果，用它来干预政治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脸书”事件让我们看到，人类选择技术的时候是充满风险的。假如最后的调查结果表明剑桥公司确实通过这样获得的信息改变了美国选民的政治倾向，使得本不应该当选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那么，今后各国都会去认真考虑技术对于民主选举的影响。以往对于金钱的影响，各国有了比较成熟的规制手段。但是科技对选举的控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辽宁、衡阳贿选案的行贿人，如果掌握了这门技术，那么他们就不用再去行贿，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去影响选举结果。这样的话，人类几百年来建立的政治民主、民主的基本价值都会在技术面前丢失。此时，我们靠什么来维护文明与法治秩序，这就是“脸书”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思考。

扎克伯格的口才很好，他的解释得到了部分民众的支持。在他的逻辑里，技术本身有一定的安全度，而当你选择信息沟通的便利，愿意加入脸书，选择使用手机时，你是在行使自己的自我决定权，你就应做好泄漏隐私的准备。人们选择某一个技术时，已经自我减损或者自我限制了自己的隐私权。二十多亿用户的个人信息，不可能依靠一个公司来保障，当公司做好了信息安全的保护措施，但仍然出现了信息泄露的时候，不能简单认为是对用户个人隐私的侵犯。言外之意是，用手机技术时你已经做好了你的隐私不是很重要的准备，发微博的时候应该也做了这样一个准备，发邮件时你也做了一个准备。问题还是回到，要隐私的保护还是要技术的便捷？这是否是宪法上所讲的自我决定权？显然，这个意义上的自我决定权并不存在，就像我们说“自杀不是一项权利”一样。宪法所建构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是每个人的价值，而人的价值前提是有生命。自我决定权里是否包括了你对生命的自我处分权？对于这种问题，如果把自我决定权无限地放宽，那么共同体就不存在了，国家对生命的保护义务就不能履行。从理论上来说，像在违法或者合法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有一个中间空白地带。空白领域里面也是一种价值倾向性，不能定义你的自杀是违法的，也不能定义你的自杀是合法的，

在空白领域里面的价值倾向是每个人要尊重你的生命，没有生命个体就不存在，个体不存在就是公共利益责任的问题。所以不要把宪法上的自由和宪法上的权利进行绝对化，包括信息的权利也不是个体的权利。我说我放弃所有的信息权利，自我决定权，我不受宪法权利的任何约束，这也不符合当代宪法的基本要求。

(三) 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

转基因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是有益的？在民主科学和政治公共利益的博弈中，到底能不能让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权利选择仅仅依靠个体决定？能不能说吃转基因食品你自己选择，我告诉你了，吃不吃是你的事？按照法律规定生产转基因食品的企业一定要在产品上标志本产品是转基因，国家的保护义务就结束了，这就是政府可能采取的一种方法。但在强调人的尊严、强调个人主体性的社会里，既然是国家、政府，就不能把转基因食品的决定权仅仅交给个人。明知转基因是有风险的，但是转基因的食品比较便宜，就放任公民食用、损害身体健康、影响子孙后代，那是不负责任的。目前政府对转基因的官方立场是，第一个是转基因的技术我们要积极研究，这是现代基础科技技术。第二个是转基因的技术、市场的投放要严格的规范。怎么规范？靠法律规定，生产转基因产品的企业必须要标注。第三，至于公民是否吃转基因食品完全是公民个人的权利，自行选择，国家管不了。能不能简单地把转基因的选择权都转给个体？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这种实体性的权利与食品权、参与权、知情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何平衡科学与民主的价值，让个体在共同体面临风险时也保证生命的基本健康，不能由于个体的选择，使得风险在个体身上变成百分之百的风险。必须化解这种风险。

国家有义务保护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健康时，国家的义务不仅仅是把权利交给个体。根据普通法的基本原则，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个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融入在国家共同体之中，就像父母对子女不只是单纯的监护关系。曾经有一个案例，两个连体姐妹大概两岁左右，医生说如果不做分离手术，妹妹和姐姐就会同时死去，这个时候必须要做分离手术，分离手术的代价是妹妹肯定要死去，姐姐会活着，因为妹妹的很多器官是靠姐姐维持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因为子女的父母是信天主教的，他们绝对不允许做一个牺牲式的分离手术，牺牲一个，挽救一个生命。另外他们也提出来按照法治原则，不能说两个生命之间选择一个生命，因为姐姐和妹妹的生命价值是一样的，不能说姐姐对器官的依赖性大就挽救姐姐的生命，人为地牺牲妹妹的生命，既不符合法治原则又不符合宗教的原则。但是，医生基于专业的立场，坚持说只有分离手术才能挽救一个，要么两个都死去。后来到了法院，法官做了判断，说生命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一个人的生命和一百人的生命都是一样的。但是在遇到两种生命价值冲突的时候，人类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我们只能遵从医学的判断，做一个医学上的手术，来失去一个挽救一个。法官又加了一句话，孩子不仅是父母的，还是国家的。国家有义务在现有的技术范围内能挽救一个就挽救，明明看着可以挽救一个生命，就不能眼睁睁让两个生命都死去。任何时候国家一定要把生命作为最高价值，但是有冲突的时候不得不做一个选择。

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比如说中小学的餐厅里面能不能使用转基因的油，或者转基因的食品。成人作为消费者可以自己选择，但是中小学是一个特殊保护的群体。有些企业为了经济的利益，希望能够把转基因的油推销给中小学，中国有很多中小学中午都在学校里吃饭。去年有个官司就是这样的：教育部规定，所有中小学禁止用转基因油。但后来农业部又发一个通知说：转基因是安全的，用不用转基因应该是各个学校来判断，教育部不能禁止、不能不尊重科学。然后，几百名家长就将农业部告到法院，认为农业部的通知违反了基本的科学精神，违反了法治。农业部的代理人反驳说，科学家说转基因安全，所以小孩也可以吃，但吃不吃可以选择。科学的判断我们要尊重，但政府机构不是科学院。中小學生不是一个成熟的消费者，不能自我选择，所以国家出于“儿童保护优先原则”和保护中小學生健康的特殊价值衡量，禁止转基因食品流入校园符合一般的原则，也符合儿童优先保护的原则。

(四) 原子能问题

现在人类最大的担心就是核武器到底有多大的安全性？如果不能有效的控制，人类会面临什么问题？现在的世界秩序，不是按和平与发展的原则建立的，而是建立在核威慑基础上。这样的世界秩序是很脆弱的。不能保证说，俄罗斯也好美国也好，以及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是民主法治的。假如特殊的情况出现了，比如出现了无法控制的非理性使用，世界上其他 193 个国家的安全如何保证？如何消除这种恐惧？在恐惧当中生活，有违我们宪法上相关的基本原则。人不能在恐惧和不安的焦虑当中生活，宪法的存在就是要消除每个人的恐惧、不安。那在核武面前，怎么办？而且我们现在核武器技术越来越发达，已经开发了比以前更为先进的核武器。在核武器面前，法学到底有没有用？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能够制约核武器的和平的这样一个秩序。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五) 克隆人技术问题

在国际上，宪法学界在科技技术的相关问题面前争论比较大的，相对比较成熟的理论就是克隆人的问题，一句话来说就是，人能不能克隆？技术上是完全可以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其他国家，但是国际社会基本的共识是，对人的克隆是违背人的尊严的，它会改变人的尊严。所以国际公约里面明确规定：不能克隆人。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与欧洲和美国的立场不一样，把克隆变成了一个生殖性的克隆和治疗性的克隆，人是不能克隆，但是为了治病的需要，人的某些器官可以克隆，这个克隆叫治疗性克隆。目的是明确的，是为了治病，但是也有很大的风险，就是如何保证治疗性的克隆和生殖性的克隆之间的界限？如果你要绝对相信科学家的话，那是没问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我们看到科学家有时候是不可靠的，科学家有时也是非理性的。我们只能切断生殖性和治疗性克隆链条，但是事实上又没法真正切割开。允许发展治疗性克隆，什么器官都可以克隆，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人。所以基于这样的恐惧，国际社会基本上不认可克隆，无论是生殖性的还是治疗性的，但是中国基于科技技术发展的需要，还是坚持它，但是未来会怎么样也就不好讲了。我们要思考一个问

题，真正的克隆人来到这个世界，人类会怎么样？你是否欢迎克隆人来到你身边？它违背了宪法和法治的什么样的一个原理？

有一份报告称，中国的克隆技术是很发达的。最难复制的藏獒，我们 2014 年在威海已经正式克隆出来了。如果把它投放到市场，这是很可观的商业利益，但是目前也面临着一种伦理法律的风险。藏獒的这种克隆技术，与造人的克隆技术在难度系数是一样的。既然可以造出来藏獒，也可以造出来人，这个技术如何控制就是个大问题。比如代孕，法律上不允许，但是现在已经存在很多代孕现象。

四年以前，有对小夫妻俩体外受精，在医院里面保存了胚胎。在两人遭遇不幸后，双方的父母经过两年的打官司讨要胚胎。最终，由于我国不能代孕，他们通过代孕公司在老挝找了一个代孕的母亲，等小孩生出来以后带回来，现在小孩快一岁了。但是带来了许多法律伦理问题，首先胚胎是生命也是物，能不能继承？中国不允许代孕，那在国外代孕回来的小孩有没有中国国籍，他到底是谁的孩子？四个老人和他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到底怎么办？法院的判决，值得赞赏。在我国，胎儿是不是有生命还不明确，民法总则算是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将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为什么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按照宪法的规定，胎儿当然具有生命力。所以按照这样一个逻辑，胚胎它不是物，是生命的承载物，可以视为生命。这样才能够设计出后面的保护性措施，确定小孩的法律身份，包括一些伦理的问题。

五、宪法如何应对科技发展挑战？

无疑，科技技术给人的尊严带来了一种不确定性。我们所追求的宪法和社会发展之间，特别与技术发展之间存在着冲突，而这种冲突将带来日益严峻的整体性变革。最令人忧虑的是，科技系统和经济系统在相互结合以后，出于经济利益的追逐而使矛盾日益激化升级。一些公司，比如脸书，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未必充分考虑人的隐私和人的尊严的问题。在不断涌现的科技面前，或者新的科技技术面前，如何始终确保人类的主体性人格的自由的发展？面对这种风险，法治应该如何应对？这确实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宪法课题，必须要寻求一个宪法共识，用宪法的价值来约束一个国家科技的发展。

把科学和技术放在一起简称为科技，这是不准确的。科学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它永远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它是创造思想、创造知识的，而创造的知识怎么用才是个技术问题。所以用科学来约束技术，实际上是要明确创造技术的目的与正当性是什么，为什么要创造它。这个价值要约束到技术的具体运用中，所以技术是非理性的，科学则偏好理性，但有时候也有非理性之处。简单把科学技术放在一起的时候，必须倍加小心，可能过度地强调技术而丧失科学的理性约束。如果把技术（如人工智能科技）加以神化，目的崇拜，自我降低人的主体性，自愿成为一个客体化、工具化、边缘化的存在，那我们的令人自豪的、有尊严的、有机生命的人类文明史将宣告结束，我们将会到远处去，让无机生命来代

替人类。这样的生活情形谁都不愿意看到。

所以技术永远是手段，人永远是主体，所以应该期待人类主宰技术的未来，不应该让技术主宰未来。为此，通过宪法所建构的共同体，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即人的尊严。没有这个价值共识的话，我们所有的文明成果都要边缘化——为了得到某个利益，我们可以失去任何利益。人作为法律上保护的主体，特别是受宪法保护的主体，其权利必须由国家来保护。如果没有这些保护，那么人就不能成为宪法的主体，就无法行使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这是一个国家保护义务。如果个人自己放弃所有的权利，那只是个体的选择，但是作为公众而言，宪法应该履行维护共同价值的使命，这才是我们未来让宪法具有共识的一个趋势。对人的尊严的维护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就是健全的宪法体制，我这里讲的是宪法共识的力量，也可能是我们未来应对科技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法律制度和价值的理念。

那么，宪法该如何控制科技发展的非理性？从理论上讲，科技发展的目标首先要符合宪法，宪法的基本价值要求人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个体化。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是，为人类造福，让人成为一个主体，而不能说因为某项科技的巨大发展使人变成了一个客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能放弃发展这项科技。比如化学武器、自主性武器是不能开发的。如果让机器人有杀害、侵害人类的决策权，让它自主决策，那么人类的生存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其次，要遵循一个基本的原则，即技术开发的类型化。什么领域的技术可以开发，国家要不要支持，要不要设立科研项目等等，要经过一个价值的衡量。有些技术绝对不能开发，有些技术可以开发，但是投放市场转化要受严格的约束，即使是市场上应用的科技成果也要严格地控制，这才能够减轻人类的基本的风险。

第三、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不仅仅局限于这个主权国家，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越来越一体化。我们要建构一个良好、和平的国际秩序，每一个国家都通过宪法来建构和平权与发展权。只有通过宪法建构和平的秩序，才能够减少世界范围内正在承受的核武器的威胁。这种和平的宪法秩序，不是靠武力、靠核能、靠核武器威慑来建立起来的，它关系到人类的未来发展。

总之，在当代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科技发展具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面前，我们要更加珍惜人类文明的价值，更加重视宪法功能和宪法价值，更加强化宪法的价值共识——人类共同体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价值，让宪法真正成为这个时代最具有价值共识的最高法、高级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要依赖宪法发展，要通过宪法凝聚共识，全面实施宪法，使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真正落到实处。 ■

[【返回目录】](#)

盛洪：如何让民营企业相信政府？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中评周刊-与 FT 中文网同步首发]



按：涉及到民营企业稳定预期的制度，就是能约束和制衡公权力不被滥用的制度。“保护产权”要由制度结构来保证。

从9月12日吴小平发表有关“民营经济离场论”的文章到习近平先生11月1日发表讲话之间的事情，被有些媒体称为“民营经济惊心动魄的50天”。这大概不算夸张，但不能称为正常。为什么一个普通的评论者，毫无官方背景，却能掀起如此大浪，非要中共总书记亲自出马才能平息？《人民日报》紧接着发表文章，称此举“给民营企业家吃了定心丸”。不料竟引来网上一片嘲讽。有些人说定心丸的效力没有多久，有人说这是“话疗”，还有人拿出几十年的《人民日报》，称“定心丸”已经吃了好几十年。还有学者评论说，“自己人”的说法反而让企业家不安，因为在自己人和非自己人之间才能建立平等的契约关系，对“自己人”反而可以不讲规则。如此等等。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也许也是民营企业家对政府政策认识过程的写照。实际上，“保护私有财产”，“保护非公经济”的原则早已写入《宪法》，近些年来历届中共代表大会决议也都强调“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仅从最近十几年来看，我们已经看惯了政府安抚和力挺民营企业的各种政策、文件和讲话。例如在胡温时期，政府出台过非常著名的新旧《非公36条》，即《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旧非公36条”出台于2005年，其中就有“完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贯彻平等准入、公

平待遇原则”，和“加大财税和信贷支持力度”等条款。这在原则上与这次习近平先生的讲话没有太大区别。

然而，就在“旧非公 36 条”发布之前不久，2004 年，就出现了两个侵犯和打击民营企业产权的著名案件。一个是铁本案件。在这一案件中，铁本公司被指违规进行投资和征用土地，董事长戴国芳被拘捕，之后又以“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被公诉，徒刑 5 年。实际上，民营企业的投资应是它的经济自由，本来无需谁来批准；而征用土地则是当地政府批准的，如果有错，也是相关政府部门的错。另一个案例是陕北油田案。2003 年，陕北地方政府突然强行将原由民营企业经营的几千口油井资产“收归国有”，只给相当于投资额的 20%的“补偿款”。面对投资者们的抗议，当地政府滥用强制性公权力，竟诬投资者们是“寻衅滋事”，将其中一些人投入牢狱。投资者们的律师也被以“非法扰乱社会秩序罪”拘留。这几乎就是光天化日下的抢夺。

这两个事件都是直接侵犯民营企业产权的案件，并且都发生在“旧非公 36 条”前后。如果真能够落实“完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即使这种案件已经发生，也会在其后的处理中加以纠正。对铁本董事长戴国芳的公诉虽与项目本身无关，但项目却因此下马，铁本花巨资购买的设备就迅速贬值，几为废铁，私有产权没有得到保护，却受到了来自政府的侵害。陕北油田的投资者们最后也大蚀其本、铩羽而归。同样，他们的损失不仅是由于政府不保护产权，而且就来自于政府的强制性收回。更谈不上“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了，这两个案件都有赤裸裸的所有制歧视，就在铁本下马之时，宝钢、武钢等国有钢铁公司都宣布了新的大规模投资；而“收回”陕北油田的起因，就是要“收归国有”。其实，不是“旧非公 36 条”，而是这两个案件给了民营企业企业家最真实和最强烈的信息。

数年后，2010 年，国务院又出台了“新非公 36 条”，重点在市场准入方面做了细化，如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电信基础业务，电力、石油、交通等基础产业领域，供水、供气、供热和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事业领域，与医疗和教育等社会事业领域。然而，就在“新非公 36 条”出台的同时，陕西省的凯奇莱案正难解难分。这正属于一个“新非公 36 条”所涵盖的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的领域。此案主要起因于，合约的国有一方，西勘院以“合同内容与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的会议纪要有关政策不相一致”为由，撕毁与凯奇莱公司签订的合约。据称其真正原因是西勘院在勘探中发现了价值千亿的煤矿储藏。就在 2011 年，陕西省高院重申凯奇莱案，宣布其与西勘院的合约无效；凯奇莱公司被工商局取消登记；其法定代表人赵发奇被抓捕入狱。

另一个大案就是曾成杰案。曾成杰及其湖南三馆房地产公司与当地政府签订了合同，承担了当地三个公共场馆的投资建设，并在政府鼓励下，进行了公开集资。但当出现金融政策变化和金融危机时，当地政府及其官员率先退出，又将违约责任推给了企业家。在曾成杰的公司有能力偿还，并且愿意偿还的情况下，竟判他死刑，并将他的公司低价卖给了一家国有企业。在这时，曾成杰不仅没有保住产权，连性命都丢了，遑论“市场进入”了。在这时，哪个信息更真实，“新非公 36 条”还是曾成杰死

刑，就不用争论了。其实就是在 2010 年左右，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事件，就是“重庆打黑案”。这里的所谓“黑社会”主要是一些民营企业，共有 13 人被执行了死刑。在薄熙来倒台以后，也没有再对这一大案进行重审和甄别。更有李庄指出，在这一运动中重庆公安局没收了 1000 亿左右的资产，而进入国库的只是 9.3 亿左右。

2016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把“保护产权”提到了新的高度，并提出“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和“共同参与”等五项原则。用心不可谓不端正，言辞不可谓不真切。其中有“完善政府守信践诺机制”一节，强调“对因政府违约等导致企业和公民财产权受到损害等情形，进一步完善赔偿、投诉和救济机制，畅通投诉和救济渠道。”然而，就在这个文件发布之后，对民营企业产权的侵犯事件却有越演越烈，也越来越普遍之势。例如民营企业普遍被要求建立中共党支部，至 2016 年底，已有 68% 的非国企成立了党组织。这不仅会带来成本的增加，而且会用政治组织的原则去干扰公司治理结构的决策，从而导致民间产权的不安全。2017 年底在北京进行的驱赶外来居民和拆除楼顶广告由政府行动，又既不提前告知，也没有对资产损失的补偿，受到损害的民众和民营企业根本找不到所谓的“救济渠道”，令上述中共中央文件如同废纸。

这次习近平先生与民营企业家座谈时的讲话，又强调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要“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给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市场空间”，还承诺要“要加大减税力度”。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大午康养小镇生态养老中心所建八栋住宅楼，被徐水区国土局没收了，理由是未批先建；北京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被海淀工商局吊销执照，理由是从事了应该申请许可但没有申请的“教育培训”。前一个事件直接侵犯了民营企业的财产安全，后一个事件则在加强市场准入的限制，扩大审批的范围，直接抗衡习近平先生的讲话。

政府决策者制定的文件和讲话似乎与我们感受到的事实形成了鲜明对照。这是他们不够真诚、言不由衷吗？并非如此。实际上，政府决策者非常清楚，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财富涌流的主要来源。正如习近平先生所说，民营经济“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 以上的企业数量。”如果从增量来看，民营企业贡献了 90% 以上的新增 GDP，100% 以上的新增就业（即还填补了国有企业减少的就业）。他们也知道，民营企业的效率和创新力要远远高于国有企业，并且国有企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因为现在国有企业大多集中于上游的基础性产业，如金融、电信、电力、铁路、石油等产业，只有下游企业发展了，它们才能从下游企业的收入中分得自己的份额，并且是垄断的份额。

然而，在另一方面，政府决策者又是税负增长的直接受益者，而国有企业高管集团与行政部门官员集团其实就是一个集团，两个集团在仕途阶梯上的位置是可以互换的，所以他们不会在制约和监督

财政支出方面下大力气,也不愿“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甚至不愿意加强对滥用公权力的约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作法并没有直接产生显著的负面结果,是因为在改革之初,政府的参照系是计划经济时期,当时不仅百姓穷,政府也穷,所以当时的税率也很低。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涌流,政府由于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所以在不断地提高宏观税率,也在利用行政权设立垄断权,并且对利用公权侵夺民营企业资产的官员也相对放纵。这就是为什么在知道民营企业重要性的前提下,还要不时侵夺民营企业的原因。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护产权和不约束公权似乎并行不悖。这是因为,税率是一点儿一点儿提高的,而且起点很低,在提高的过程中,民营企业虽然感到利润率在减少,但离临界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并不构成很大的问题。而利用公权侵夺私产的情况在最初还比较零星,人们往往认为是偶然事件。但当税率提高到相当高度时,一些经营不太好的民营企业首先感到了压力,他们会发出税负太重的抱怨。而利用公权侵夺私产的行为由于没有受到制度的约束和惩罚,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仿效,相关案件越来越多,侵夺的单位规模也越来越大。这也就形成了民营企业感受到的税负太重和产权得不到保护的一般认识。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也就出现保护产权和不约束公权这两个原则的最初冲突。

最后,当民营企业家人心浮动,没有信心继续投资,甚至要移居海外时,累积的结果会影响宏观经济状态。如2016年上半年,中国民间资本投资的增速逐月下降,到7月份仅为2.1%,宏观决策者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能不说,201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当时的这一重要问题。这次习近平先生11月1日的讲话,也和当下的严峻经济形势相关。所谓严峻即民营企业已大面积地财务性亏损,净资产收益率已经低于无风险利率与合理风险溢价之和;经济明显下滑;同时外有贸易战压力。因而中央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这两次出手都具有“短期功利主义”性质,即只是为了解决当下问题,当问题“被解决”或不太严重时,就不再去注意坚持《意见》或讲话中提出的基本原则。这种情况发生过很多次,如前所述,民营企业家们也就只能把这些《意见》或讲话看成是急时抱佛脚。

在2016年国家发改委邀请专家讨论《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我和一些专家就强调,多少文件不如一个案例。自那时起,中央政府还是推动着一些冤案的重审。比较著名的有凯奇莱案,最高院终审判凯奇莱公司胜诉;吴英案重审减刑;赵守帅案重审无罪;还有重审顾维军案,重审牟其中案等等。最近刘鹤先生又强调“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11月12日,最高法院又发布了《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法〔2018〕1号),强调要把上述文件或讲话的精神落实到司法实践中。这显然是一个比较大的动作,意图让人们听其言,也观其行,尽管还有短期功利主义性质,但已经站到了一个制度化改变的门口。一方面,这种行动还保留了运动式的风格,还是在配合当下的政策,人们有理由认为只是做做样子;但在另一方面,一旦落实到司法体系,这些案例就有可能起到示范作用,开启新的持久有效的制度。

不过，无论如何，这还不够，还不足以让民营企业放心。更重要的，不是平反几个冤案，而是要有制度保证，不再发生新的冤案。上述最高法院的那个《通知》的题目就像一个针对一部分人的特例，而不是被成文宪法和法律准确描述，适用于所有人，并被司法机构遵循法律正当程序实施的正常制度。而所谓“平反冤案”一词有着内在悖论。如果在重审之前就知道是“冤案”，那它就会被看作是在此之前故意制造的；如果从概率角度讲“冤案”，那就是承认现有的司法制度是有问题的，而问题就是它不遵循法律正当程序。而“平反”作为一个行政目标，其过程更有可能是进一步无视公正的司法程序，同样的手法也可以重新制造冤案。真正能够稳定人心的，就是对制度的稳定预期。当一个人坚信，他能按照宪法和法律文本，通过一个法律正当程序，抗衡政府行政部门的干预，得到一个大致可预期的结果，他的心才会稳定。

那么，涉及到民营企业家的稳定预期的制度是什么？就是能够约束和制衡公权力不被滥用的制度。“保护产权”这四个字，不是一旦被说出来就自动实施了，实际上要由一组制度结构来保证，要由一系列制度性操作来实现。这包括抱怨、警示、申请、诉讼、裁断、实施和约束等。扼其要，（1）人们要有抱怨或表达意见的权利，即《宪法》第 35 条规定的权利得到保障；（2）约束政府行政部门的制度，即政府不当干预的错误能够得到纠正，错误当事人受到惩罚；（3）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人们不会因党政干预从而被拒之于法院门外，人们可以预期这一司法体系内的人致力于使案件得到公正审理等等。

首先，如果没有抱怨和表达意见的权利，人们甚至都不会知道，企业家的权利是否受到了侵犯，所以它是首要的权利。反观这些年，企业家们抱怨的权利实际上受到了压制。不少侵犯产权甚至伤害生命的案件没有得到公共表达。例如曾成杰是在 2013 年被判处死刑的，直到 2015 年才被执行死刑，但在此期间，并没有听到相关的舆论声音。据曾成杰的律师王少光的助理所说，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跑遍了所有的网站、报纸、杂志，得到的都是‘负面报道压力太大’、‘有领导不让发’等答复”。与之对比，吴英案则在一开始就诉诸舆论，天则所也曾专门为吴英案开过讨论会，其结果，是吴英从死刑改为无期。而在曾成杰被杀害以后，我们专门召开的曾成杰案研讨会，也受到了严重干扰，会场两易其地，若干专家因受压力不能到会。因而，如果不能保证《宪法》第 35 条得到实施，就没有让企业家们放心的第一个“制度信号”。

除了上述两个会，天则所还召开了不少有关企业家案件的会议，如孙大午案、凯奇莱案等。应该说，天则所是中国少有的为民营企业声言的民间机构。天则所设有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近些年来每年都发布《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指数报告》，召开有关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研讨会等。2016 年底，我们发布了《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与税制改革研究报告》。这是基于对四个省市 100 多位企业家的座谈，113 个企业的有效问卷进行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民营企业税负太重，几乎到了“死亡税率”的程度。但这种声音很快就招致了压制。更为严重的是，就在几乎习先生讲话的同时，北京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被以极为荒谬的指控吊销执照。这是一个为民营企业发声的民营企业，它的存否，就是一个

“标志性的制度信号”，如果它不能生存，其它有关“自己人”的定心丸还灵验吗？

第二个“制度信号”，就是对政府行政部门的有效约束。一个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约束就是政府行政部门要遵守《宪法》和法律。《宪法》第11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而行政部门只是在《宪法》框架下建立的公共部门，只应是为了服务于宪法权利（包括非公产权）的次级的和派生的权力。因此，政府行政部门应该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产权高于行政权。当我看到一个徐水区国土局竟认为它有权力没收一家民营企业的资产时，就知道它没有一点对宪法的理解和对产权的敬畏。当然这不只是一个徐水区国土局的问题，而是全国行政部门的普遍问题，否则就不会出现北京大规模驱赶外来居民和强拆楼顶广告的恶性事件。直到现在我们还在看到不少行政部门在肆无忌惮地以公权名义侵犯产权。这些侵权行为即使由于某些原因而被叫停，也没见到行为当事人受到处罚。所以，人们也需要有一个对行政部门侵犯产权行为处罚的“标志性事件”。

第三个“制度信号”，就是司法独立。这是宪法原则。《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一个首要的标志，就是民营企业（当然是所有公民）能否获得司法服务。现在干预司法独立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迫使法院“不受理”民营企业对政府行政部门的诉讼。如大午集团想就其广告牌被拆起诉当地政府行政部门，但法院“不受理”。显然，“保护产权”是一个普遍需要的公共服务，不能只靠政治领导人说一句话，而要靠遍布全国的一般司法体系。一个法院动辄就“不受理”一个正当起诉，民营企业的产权安全就没有救济手段。在这种司法体系下，“保护产权”难道不是一句空话？况且，即使法院受理，也有一个能否公正审理的问题。在法院受到行政权的直接和强力干预下，是否还能存在公正审判呢？显然不能。首先是不能遵循程序正义。

例如重庆打黑案时，竟然会出现委托人检举自己的律师的荒诞一幕，并且在李庄案庭审中，所有八位证人均不能出庭作证。又如在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王成忠二审时，审判法官及其团队与被告是同事关系，却不能依法回避。除了不遵循回避制度，直接向证人施压外，我们经常还能看到的，就是对法律过程的非官方主体的施压，如直接对民营企业聘请的律师施压。这反映了，政府部门还是把司法体系看成是自己的工具，而不是生成正义的机制。总体来讲，目前中国的司法体系由于不能落实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而不能受到大家、包括民营企业家的信赖。因而，逐渐改变人们的印象，就要首先有一组“标志性事件”，如（1）对法院无理“不受理”行为的惩罚；（2）对施压于律师或证人的行政部门人员的惩罚；（3）对不遵循程序正义的法院的惩罚；等等。找到这类案例并不困难，可以说俯拾皆是，关键是要下定决心。

只有给出这些制度信号，并且正心诚意地持续进行制度变革，不管有无“定心丸”，人心自安。虽然以往的“短期功利主义”目的还能达成，但“定心丸”的效力会随着服用次数的增加而递减，直到最后衰减殆尽。因而，即使只是为了当下目的，执政当局也只能采取有利于长远的制度性改革。同时，执

政当局的眼光也应从短期变为长期，从只顾自身的利益转变为关照所有人的利益。尽管这有点儿形势所迫，但也到了应出现某种超越意识的时候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对言论的压制，对行政部门的放纵，对司法过程的扭曲，都是一次博弈思维，即只从当下的输赢看待问题。然而实际上，这些在一次博弈中获胜的人，都会在多次博弈中输掉。例如压制别人的抱怨和批评，就会使自己做出错误判断和错误行为；借用行政权力侵夺企业财产，抢来的财产却不是财产，而是罪证；直接干预司法导致不公正，最终可能对自己也不会公正；等等。因而，对于执政当局以及对任何人来说，公正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

中国今天的情形，也许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出市场制度（私人产权）与法治体系（约束公权）在原则上的同构性和功能上的互补性。这种关系早已被曼瑟·奥尔森所揭示。他在“独裁、民主和发展”一文中说：“使个体拥有最大限度的经济发展的权利所需条件，恰恰与维持一个持续的民主政体所需要条件相同。显然，如果个体……缺乏自由表达的权利，缺乏受到保护的财产和契约的权利，或者如果法治不被遵循，……那么一个民主政体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因此，一个民主政体所需要的法院体系、独立的司法权、以及对法律和个体权利的尊重，同样也是保证财产和契约权利所需要的”（中译文载《现代制度经济学》（第二版），上卷，第409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内含着约束公权的法治原则。况且在今天，在保护私产和不约束公权之间已经没有缓冲和腾挪的余地，解决当下问题，也需长远之策。

孔子说：“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制度不是抽象的，它是由具体的众多的人互动形成的。因而制度变革必然有具体的行动和由此带来的制度信号。也要相信，任何人都不会比别人更聪明。如果再玩一次安抚和假装被安抚的游戏，贻误的只是时机。在诸多具体行动中，司法改革的具体行动也许最为重要。因为司法制度是通过判例向社会宣示正当行为规则的制度，而不是对每个人进行监督，时时刻刻干预到细节的制度。后者不仅无法达成，也是弊端丛生。因为它无法解决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一个案件的公正裁决比这个案件的结果对某一方（如政府一方）有利，更能带来对执政当局的利益，这个利益就是民众对其公正性、从而政治合法性的认可。因而，在民营企业普遍亏损，民营企业无心经营的当下形势下，把挽救危局转变为落实宪法权利，实现司法独立，切实约束行政权力的改革行动，应是正着。 ■

[【返回目录】](#)

哈耶克：开放社会的道德与封闭社会的道德

[**哈耶克** 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以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本文节选自哈耶克著作《法律、立法与自由》]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5.8—1992.3.23]

在一种扩展的市场秩序中，生产者在不知道其他人需求的情况下仍会受到引导去为他们提供服务；而本书所描述的那个过程实与上述情势紧密相关，而且也确实是在上述情势所产生的一个必然后果。这种不断扩展的市场秩序所依凭的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的努力具有满足他们并不认识的其他人的需求的功效；因此，这种市场秩序所预设的和所要求的道德观念乃是与那种要求人们服务于可见之需求的道德观念颇为不同的。对资金回报的预期所产生的间接指导作用，乃在于它是一种显示其他人需求的信号；而要使人们的行动受这种预期的间接指导，就需要有相应的新的道德观念做支撑——这些道德观念所规定的并不是特定的目的，而毋宁是那些对所许可的行动之范围进行限定的一般性规则。

在开放社会中，人们认为更可取的做法乃是把自己的资产投入到能够以较低成本生产出更多物品的手段上，而不是把这些资产分配给贫困者；或者说，更可取的做法乃是用自己的资产去满足成千上万不确定的任何人的需求，而不是为少数几个熟识的邻人提供服务。毋庸置疑，上述观点确实构成了开放社会之“意索” (ethos)的一部分。当然，这种观点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和传播，并不是因为那些最早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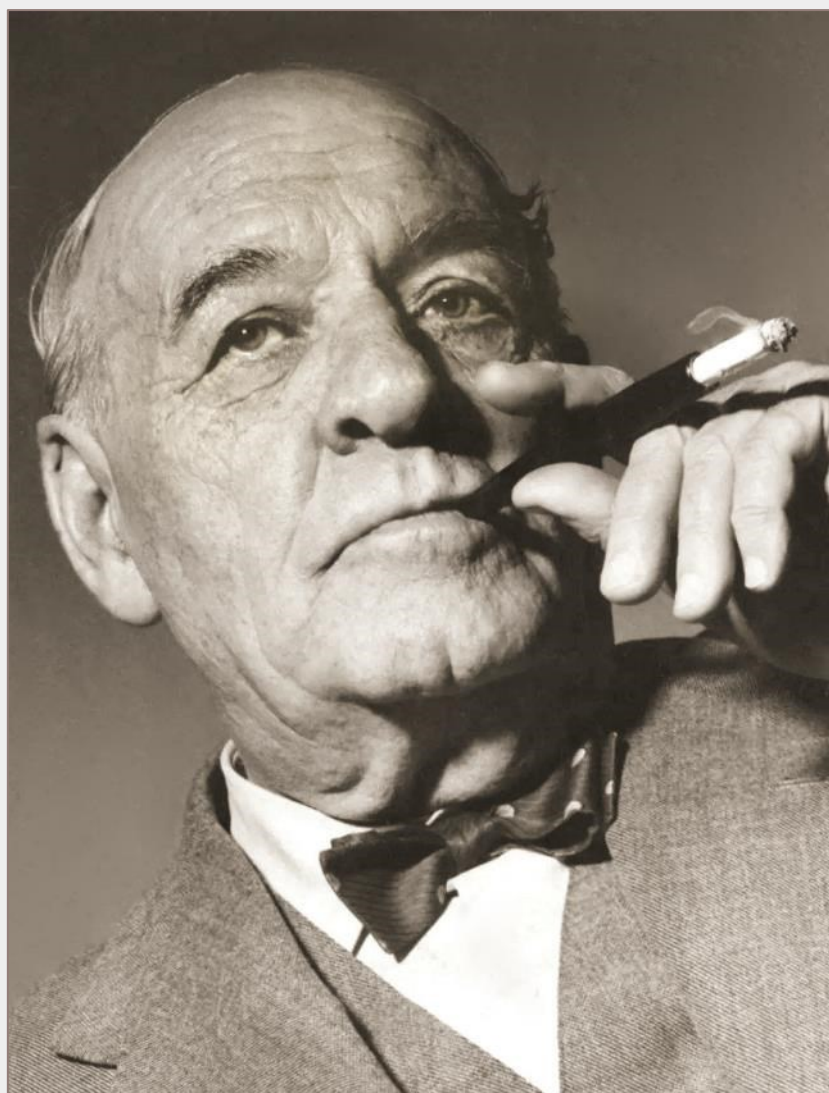
照这些观点行事的人知道他们以此方式行事能够给他们的同胞带去更多的利益，而是因为那些依此观点行事的群体和社会比其他群体和社会更趋繁荣；因此，如此行事也就渐渐变成了一种为人们所公认的践履“天职”(calling)的道德义务。就其最为纯粹的形式言，这种意索把尽可能有效地追求自我选择的目的视作是一项基本的义务，而不关注这种追求在人类活动这个复杂的网络中究竟具有什么作用。今天，人们一般都把这种观点说成是一种加尔文教的伦理观，然而，这种描述却多少有些误导。这种描述之所以是误导的，实乃是因为早在加尔文之前，这种观点便已经在中世纪意大利的商业城镇中广为盛行了，而且也已得到了西班牙耶稣会会士的传播。

今天，我们仍旧会对人们在熟人具有具体且明确需求的情况下给予帮助这种行善之举表示敬意，而且我们也会认为帮助一个挨饿的熟人真的要比减缓一百个陌生人的急切需求更重要些；但是事实上，追求个人的利益从一般意义上讲乃是我们行善的最好方式。如果说亚当·斯密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从利己出发追求个人利益与从利他出发竭力满足他人的明确需求之间仿佛存在着重大差异，那么他有关这个问题的观点就确实存在着某些误导性，而且也给他的学术事业造成了侵损。的确，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想用他的利润去达到的那个目的，很可能是为他的家乡修建一家医院或建造一座艺术馆；然而，撇开这个问题(亦即他在挣得利润以后想用这些利润去做什么事情的问题)不论，他实是通过实现赚得最大收益的目的而在市场的引导下给更多的人带去益处的，而如果他只致力于满足一些熟人的需求，那么他就不可能给这么多的人带去益处了。一言以蔽之，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乃是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the invisible hand of the market)的引导下而为他根本就不认识的最贫困的家庭提供现代生活救济用品的。

的确，构成开放社会之基础的那些道德观念，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只是在少数城镇地区的小群体中盛行，而且它们也只是在相对晚近的时候才渐渐普遍地支配了西方人的法律和意见的；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人们才常常认为这些道德观念是人为的且非自然的，而且还与人们从旧有的部落社会中继受而来的那些直觉的(而且一部分甚至还是本能的)情感完全不同。毋庸置疑，那些使开放社会成为可能的道德情感乃是在城镇亦即商业贸易中心生成扩展起来的，不过在当时，大多数人的情感依旧为狭隘的地方观念和支撑部落群体的仇外黩武态度所支配。由于大社会的兴起只是一个太过晚近的事件，所以未能给人们提供足够多的时间去摆脱种种经由千百年的发展而养成的积习，也没有给人们提供足够多的时间使他们不再把抽象的行为规则视作是人为的且非自然的东西——这些抽象的行为规则还常常会与人们所具有的那些使自己完全受可见且即时性需求支配的根深蒂固的本能相冲突。

人们真切地认识到，开放社会的新道德规范不仅无限扩大了每个人与其他人的交往范围——而他在与其他人交往的时候必须遵循道德规则，而且还因它们适用范围的扩大而必定减少了它们自身具有的内容。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认识也同样强化了人们对开放社会新道德规范的抵制。如果要使所有的人的义务完全一致的话，那么向任何人施加的义务就不能多于向所有的人施加的义务——除

非存在着特殊的自然关系或特殊的契约关系。当然，也可能存在这样一项一般性的义务，即在必要的情况下向明确规定的一些人而不是向不确定的任何人提供援助。因此，按照一视同仁的方式把义务扩大适用于所有的人，亦就是把义务不仅适用于我们部落的成员，而且也扩大适用于越来越多的其他人直至最终适用于所有的人，实乃是人们在道德方面所取得的一项进步，而我们也正是依凭着这项道德进步才日益趋近开放社会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获得这项道德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这样一项代价，即必须减轻每个人都必须承担的那项刻意为本群体中的其他成员谋福利的强制性义务。当我们不再可能了解和认识其他人或不再可能知道其他人的生活环境的时候，上述那种强制性义务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智识上也成了一种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然而，这些具体义务的消亡，虽说解除了人们原本需要承担的满足自己同胞需求的责任，却也同时使人们丧失了在必必要时得到相应支持的保障；而这种情形便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感情上的真空。



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 J. [Jose Ortega y Gasset 1883—1955]

西班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评论家，生于马德里，加缪曾称其为欧洲继尼采之后最伟大的哲学家；其父何塞·奥尔特加·伊·穆尼利亚也是著名作家

因此，即使人们从部落社会发展到开放社会的最初尝试因他们尚未准备好摆脱那些作为部落社会之基础的道德观念而蒙遭失败的话，也不会真的令人感到惊讶的；或者，正如何塞·奥尔特加·加塞(Ortega y. Gasset)在论及古典自由主义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无须为人类做出如下选择而感到惊讶：即“人类竟达致了如此之高尚的境界，然而这一境界却是如此之矛盾、如此之精致、如此有悖自然。……自由主义这一规训难度太大而且繁复性也太高，因此难以在尘世上生根发芽”。因此，当绝大多数人都受雇于组织而且也无甚机会习得市场道德规范的时候，他们在直觉上对那些与他们继受而得的本能相吻合的更具人情味和更具人格化的伦理道德的那种渴求，便颇有可能把开放社会摧毁掉。

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在这种状况中被证明为具有极大吸引力的唯社会论理想(或“社会正义”理想)，并没有真正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道德，而只是对人们从早期社会中继受而来的本能的一种诉求。因此，社会正义这种理想实是一种返祖现象，亦即试图把部落社会的道德规范强加给开放社会的那种努力——当然，这种努力是徒劳的，但是，如果这种道德规范得势，那么它就不仅会把大社会摧毁掉，而且还将严重地威胁到约三百年以来人类经由市场秩序而繁衍出来的众多人口的生存问题。

与此同理，那些被认为疏远于市场社会的人，实际上并不是新道德的担当者，而只是一些未受到教化的人或未开化的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开放社会赖以为基础的行为规则为何物，只是想把他们从部落社会习得的那些本能的“自然”观念强加给开放社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新左派(the New left)论者似乎也没有认识到，平等对待所有人的做法——其实新左派论者本身也要求实施这种做法——惟有在这样一种制度中才是可能的，其间，个人的行动只受形式规则的约束，而不受这些行动已知结果的指导。

这种卢梭式的怀旧情调所指向的乃是这样一种社会，它不受人们所习得的道德规则的指导，而受未经反思的“自然”情感的支配：习得的道德规则惟有通过对构成这种社会秩序之基础的诸原则所做的理性审视才能够得到正当性的证明；而“自然的”情感则深深地植根于千百年小部落的生活之中。因此，这种卢梭式的怀旧取向会直接促使人们去追求这样一种社会，其间，权力机构会确使显见的“社会正义”以一种满足自然情感的方式得到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文化当然都是非自然的，而且还是人为的(尽管是非设计的)，这是因为这些文化所依凭的乃是人们习得的规则而不是人们的自然本能。一如我们所知，人们依旧保有着一些自然情感，而这种自然情感却与继续开放社会所必需的规则之规训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的确构成了所谓“自由脆弱性”(fragility of liberty)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那种熟人群体的图像来塑造大社会的努力，或者把开放社会转变成一个要求个人追求可见且共同的目的的社会努力，必定会形成一个全权性社会。 ■

[【返回目录】](#)

安希孟：柳暗花明又一人 | 鲁迅论个体的价值

[安希孟 山西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与基督教研究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首发于中评周刊]



本文作者安希孟教授

毛泽东说，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鲁迅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鲁迅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载独彷徨。”

《孤独者》是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主人公魏连受是一个独具个性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以逃避的方式活在自己亲手造就的“独头茧”中品味孤独，最终以“自戕式”的“复仇”向社会作绝望的反抗。这个故事表明，中国还远不具备让青年人作为自由个体可独立生存，运用其天赋，服务于社会的社会环境

鲁迅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1]我常常觉得自己是群众，就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财富的动力，是推动历史的奴隶。这是鲁迅所批评的“合群的自大”。[2]合群的盲目的自大是弱者，是一盘散沙，是无战斗力的畜群。不知有自我的奋斗，不知有自我的个体。学会孤独，才能有一群有机的奋发

的联合。孤胆英雄，受伤之后躲起来，自己舐干伤口的血的猛兽。懂得群己权界，才有个体自由，才会有强大的群。



鲁迅 [1881.9.25— 1936.10.19]
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杂文家，艺术批评家，思想家

梁启超说：“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在他看来，大人物“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鲁迅《摩罗诗力说》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的文化英雄。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氓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人格外凶。” [3] “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 [4] “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 [5] 牺牲为群众祈福，祭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食他的肉。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彀彀，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 [6]

传统中国哲学的理想人格“内圣”作为“外王”，关注的并非人与外在自然的关系，而是人自身心性的修炼。这不是向外寻找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国古代哲学理想的人格是“君子”、“贤人”、“圣人”。朱熹认为，“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君子，才德出众之名。”。禅宗的理想人格“佛者”，和儒道两家所言“圣人”接近。作为理想的人格的君子、圣贤乃至佛者，与你我这等凡人无关。如何成就

和达致君子圣贤理想人格，他们的回答虚无缥缈。有人断言，中国传统哲学理想人格论可以拯救现代性危机。这未免夸大其词。

在哲人看来，群众代表混沌无序——混沌是斩杀存在与秩序的否定性力量。群众可以遮蔽、掩饰、甚而美化、颂扬罪恶、恶政、苛暴。群众是虐政的别名。法西斯是一群棍棒。它是社会，但属于无序社会。它是挡箭牌、遮羞布。它掩饰罪恶，粉饰恶行。它是浊流、恶浪、妖氛、迷雾，是窒息生命的毒气。它给恶行罩上美丽光环。群众是羊，替罪羊，担戴一切罪行而不承担后果和责任。群众是巨大能量，能释放一切罪行。群众可以创造巨大奇迹，在有组织的时候，它为恶魔创造通天塔——金字塔、帝玉陵寝、长长砖墙、巴比伦空中花园，但它无法发明蒸汽机、电灯、火车、飞船、万有引力、相对论。群众代表无知、蛮干、瞎闯——迎闯王，就不纳粮。群众抹平竞争机制，它掐尖，枪打出头鸟。一切智慧创造，出于个体之手，有赖于单独个体和个人。个别代表真实、真诚和存在。群众代表虚无和毁灭力量，是虚无、混沌、非存在、无序。它摧毁并杀灭存在。个体代表智慧、知识、机智、正义、善良、美德。群氓代表邪恶、罪行、丑陋、恶劣。它是无组织、无秩序、罪恶的代名词。

群氓是羊，替罪羊，担戴一切罪行，而不承担后果和责任。它代表战争、杀戮、侵吞和劫掠。群氓是巨大能量（这能量需要和等待智者开掘），也能释放一切罪行。群氓可以创造巨大奇迹，在有组织的时候，它为恶魔创造通天塔——金字塔、帝玉陵寝、长长砖墙、巴比伦空中花园，但它无法发明蒸汽机、电灯、火车、飞船、万有引力、相对论。无组织状态的群体代表无知、蛮干、瞎闯——迎闯王，就不纳粮。群氓抹平竞争机制，它掐尖，枪打出头鸟。一切智慧创造，出于个体之手，有赖于单独个体和个人。个别代表真实、真诚和存在。群氓代表虚无和毁灭力量，是虚无、混沌、非存在、无序。它摧毁并杀灭存在。个体代表智慧、知识、机智、正义、善良、美德。群氓代表邪恶、罪行、丑陋、恶劣。它是无组织、无秩序、罪恶的代名词。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 “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子还十足，还可笑。” [7] “关于奴隶与奴才，但穷人，奴隶也是要爬的，有了爬得上的机会，连奴隶也会觉得自己是神仙，天下自然太平了。虽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个个以为这正是他自己。” [8]在《半夏小集》里，鲁迅说：“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鲁迅憎恶叭儿狗和媚态的猫。狮虎独往独来，只有狐狸和狗成群结队。鲁迅笔下有一种脖子上挂着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走在一群胡羊前面的山羊。

愚民政策，也是草民政治。愚者，使动词，使愚蠢。孟德斯鸠说：绝对的服从，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连发命令者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须思想、怀疑或推理。他只表示一下服从的意愿就够了。在帝制社会里，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帝国。那里的教育只是把恐怖置于人们心中。在那里，知识招致危险，竞争足以惹祸。在那里，教育等于零。

卡莱尔提倡英雄崇拜，呼唤精英统治。他认为：全世界的历史“实际上都是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

的伟人的思想外在的、物质的结果”，“这些伟人的历史真正构成了全部世界历史的灵魂”。在《英雄及英雄崇拜》中，他认为天地间存在着一种力，推动天地万物新陈代谢。每个时代都需要英雄。卡莱尔对英国人沉溺于物质享乐唯利是图，感到痛心疾首，谴责他们怀疑一切。他的英雄是神的使者，是人与神之间的桥梁，他播撒火种到人间，给黑暗中的人带来光明。他们拥有一颗敏感的心灵来领会神意，并用人类的语言讲述神的旨意。人们崇拜英雄，就是向神灵靠拢。



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 [So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5.5— 1855.11.11]

丹麦宗教哲学家、心理学家、诗人，存在主义思想的鼻祖，
现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亦是欧洲哲学发展史的重要人物

现代社会应该从本来的意义上谈论人。但现代社会里有时就不现代。曾经，人不是人，比如人被当作“牛鬼蛇神”、“狗崽子”、“小爬虫”、“变色龙”、“社会渣滓”、“余孽”、“狗头”、“火烧”、“炮轰”、“油炸”、“活埋”、“不革命的滚蛋”。或者最好也只是某一类人，是“我们”、“大家”、“所有人”、“人人”、“每一个人”，只是样品，货样，不是单个个体。你抽查其中一部分，便知全体。即使是愤怒，也是集体发怒，而不是我自己。

流行歌词“众人划桨开大船”，但若无单个人的努力，就不会有集体之力。团结不是力量，个体才有力量。个体的力量凝聚，集体才有力量。“一支竹篙呀难渡汪洋海，众人划桨哟，开动大帆船。一加十，十加百，百加千千万，你加我，我加你，大家心相连。一根筷子呀，轻轻被折断，十双筷子牢牢抱成团，一个巴掌呀，拍也拍不响，万人鼓掌哟，声呀声震天”。众人拾柴火焰高，那是因为每一个人奋力拼搏。人多力量大，但大集体时代，自留地的庄稼长势就好，就可能不如分田到户责任田好。

这全是伪真理。我们知道的道理还有三个和尚没水吃。分明说“一加十，十加百”，却偏偏扼杀个体。设若没有一根根竹篙，众人划船乃空话。没有一，就没有十。没有你我他，就没有大家。没有一根根筷子，就没有一捆筷子。奋斗靠个人。克尔凯郭尔的基本概念是“孤独”。“众人”的概念受到批判。众人缺少真诚，也是逃避责任，躲入芸芸众人之中。只有单个的人，才具有主观性，具有自我做出决断的能力，而众人，却是在逃避责任。现代社会的人是单个的人。原始狩猎经济需要群体。现代文明社会，人们的联系更紧密，但人的独立个体意识也更强，个人空间更大。

在“众人”表象之下，可能会有南郭先生。众人拾柴火焰高，是因为每一个人勤奋拾柴禾。一，是基数，是起点。集体，众人，没有嘴，不能吃，没有手，不能拿东西。集体是虚空，表象。南郭先生喜欢集体演奏。集体都能“看见”并说出“皇帝新衣真漂亮”。

克尔凯郭尔憎恨众人，赞美个体。苏格拉底赞美“牛虻”，让人从“众人”的庇护下走出来。施普兰格说：“凡属独特的、个体的、个别的，才是人最珍视的。概括的办法，可能很有用，也很方便，但只有个别的独特，才是我们所珍视的。”你应当努力成为孤独个体，成为一个人，成为你自己。从“众人”之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个“个体”，是成为“孤独的个体”的最为重要的事。克尔凯郭尔认为，说“一千个人比一个人更有价值”，乃是一种欺诈。这无异于把人视同动物。人类的中心要点在于，基数“1”才是最高的。1000，并不说明任何问题。我们不能鼓吹某些生命没有价值，不能贬低个别生命。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珍贵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尊严和诉求。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珍惜。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杀灭某个生命。

“众人”是由没有观点的“乌合之众”组成的，本质上没有任何思想意见，因此可以说没有丝毫意义。思想言论自由并非指只有真理才能有自由，并非只有“正确思想”才能有自由。铺就真理大道的，是无数迷途谬误的碎石。通往真理的道路是荆棘。如果不宽容错误思想，正确的思想，真理的烽火，便无由出现。没有燧石的敲击撞击，就不会有圣火。通向真理的，不是平坦大道，而是荆棘之途，是暗中摸索之隧洞，是摔跤跌倒——但领袖、当局并不以逮捕思想者为乐事。只有宽容错误，才能有思想的真理产生。

2018年11月30日

- [1]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2]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3]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寸铁”。 [4] 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5] 鲁迅，《热风》“即小见大”。 [6]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
[7] 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8] 鲁迅，《准风月谈》，“爬和撞”。

[【返回目录】](#)

张林：让竞争中性原则为民企保驾护航

[张林 经济学者。本文首发于2018年11月24日中国经营网]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实施进一步支持和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认真落实和完善政策，促进民营企业减税降负”等5个方面共26条具体措施。这是近期支持民营经济的最新举措，为了缓释经济下行的压力，就要不断保持微观市场主体的活力，而各部门扶持中小微民企的发展正成为当前各项政策的重要考量。

如果说支持民企发展有一个总的指导方针的话，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民企座谈会上提到的为民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以及央行行长易纲在G30国际银行研讨会上提出的“竞争中性”原则。公平竞争或者竞争中性，虽然只有短短四个字，背后却蕴含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逻辑。

40年的改革开放秉承的基本逻辑就是让市场的作用逐步扩大。可以说从1984年推动国有企业承包责任制改革开始，政策层面一直在偏重民营经济的培育和鼓励。1997年开始推动的“国企抓大放小”，实质是将中游制造业和下游消费品市场让渡给民间部门，其间原有附着在国有部门上的利益被打破了，从国企领导到国企职工都付出过不小的代价。2005年推动的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推动了国有股减持，实际上包含了国有资本的大量退出。

因此，不能简单地政策从来都是向国有企业部门倾斜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经济从单一国有制逐步过渡到非公有制占据重要市场地位的过程。人们今日对民企所感知到的劣势竞争地位，只是最近十年来才逐步凸显的问题，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伴随着国有企业范围的不断退缩，其经营边界逐步后退到能源、基建、金融等对国民经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要素领域和服务领域，这些领域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市场优势，对比之下民企处在劣势。再次是，2008年的外部环境中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不得已出台了宏观宽松政策，通过对上游国有部门的资本和信贷支持以拉动基建、维持经济增长，进而不得已挤出了民间部门的投资机会和信贷机会，形成了当前民企所感受的融资难、融资贵，以及投资渠道不通畅的瓶颈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支持民营企业进一步健康发展，表面上看起来是要解决国有部门和民间部门如何再次平衡的问题，本质上是要解决中国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经济转型到底要走向何处的问题。竞争中性的概念给出了方向性和原则性的回答，我们认为这个回答无疑是值得称赞的，不仅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而又留下了讨论和想象的空间。

竞争中性原则首先说的是，当前所积累的迫切问题要重点解决，比如上面所提到的民企经营所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该原则指导下，央行最近推动建立了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并在金融机构监管考核和激励方面向民企倾斜的要求。再比如针对民企面临的成本压力问题，财税部门也正在

积极研究推动增值税和社保费率的减免，相对于处在上游的国企，结构性税收减负对于处在下游的民企帮助更大。

竞争中性原则又表明,中国不会再重新回到通过对国有部门大规模信贷支持刺激经济的老路。中国总债务率已经达到 GDP 的 2.5 倍有余，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带来的产出增加有大部分仅仅用来还债,以这种方式维持的高增长实际上是无效的。中国经济要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型，依赖的是民营经济能够在消费端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消费品，依赖的是民营经济的平稳发展以保证居民就业水平和收入上升。

竞争中性原则也不仅仅得到了经济部门的回应，司法部门也表示要为民企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权和人身安全，努力推动良好政商关系的形成。同时该原则也并没有就此否认国有企业的作用空间，激进式的休克疗法和一刀切的无禁区改革往往带来政策反复和市场动荡，竞争中性也体现了增量改革和渐进改革的稳妥精神。

实际上，民企与国企的利益方向是一致的，只有处在下游的民企部门蓬勃繁荣，处在上游的国有部门才有稳定发展的基础，因为国有部门的产品和服务，最终要通过民间部门的购买和消费才能实现市场价值。近年来所谓经济结构的扭曲、僵尸企业的存在，正是经济上下游之间不能供需契合的结果。民企发展出现缓滞，会逐步传导为国有部门的产能过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竞争中性原则不仅仅是保护民企，同时也是对市场结构的拨乱反正，而且在底层逻辑上有助于防范国企部门的长期风险。

但是，竞争中性原则本身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操作方案，也没有预示国企和民企中性竞争的最终结果如何，甚至利用现有经济理论也很难推演未来的互动过程。或许因为此处犹存的一些不确定性，最近的宏观经济指标尚未体现出民间部门的全面回暖，社会融资规模以及社会消费品销售额增速等指标还面临着走低的压力。

站在民营企业自身的角度来看，中性竞争至少明确意味着行政干预、政府信用背书等非普惠式、非市场化的政策因素会逐步退出，微观主体将以市场为红线进行企业家精神的竞争。中国的民企和民营企业应当对此抱有信心，因为 40 年的改革过程证明了民间部门的市场适应能力，要相信平等竞争的制度环境足以带来大展拳脚的可能。

无论如何，所有制层面的再平衡和再改革已经涉及未来中国改革的核心。在市场竞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相信真正的公平竞争就能带来好的市场结果。期待着竞争中性原则能够逐步体现在政策落实上，为民营企业的再次繁荣发展保驾护航。 ■

[【返回目录】](#)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

[顾准 中国当代学者，经济学家，会计学家，思想家。本文原载于顾准著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顾准 [1915.7.1—1974.12.3]

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被连贬数级的顾准被驱逐出了主流社会，
妻子被迫与其离婚，并于 1968 年不堪迫害含恨自杀；五个子女与顾准脱离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
文革结束前顾准因癌症在孤寂中去世，去世时台灯依然亮着，书桌上的日记本摊开着

(一)

民主诚然不是目的，那么把社会主义设定为民主的目的又怎样？

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或者共产主义实现了怎么办？按照辩证法，回答是，实现了，连民主也不存在了。

这个答复，其实暗含着，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

那么，我反社会主义吗？我不。私有财产终究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财产，这很好。我们现在的民主，在其下作政治活动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可以，而且大体必定会在这个共同前提下，各自提出自己的政纲和主张。这叫做社会主义两党制。

(二)

你不赞成两党制，可是，你看看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苏联、东欧我们固然看够了，在东方某些国家中盛行的那一套阿谀崇拜，你不觉得恶心吗？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

列宁说什么直接民主。不错，我们见到过初期的工厂苏维埃。可是，这个社会是分工的社会，搞政治终究不免是一种专门的行业，直接民主，不久就会被假民主所代替。没有两党制，散在干不以政治为专业的群众中的各种意见，会被“拥护”的高声呼喊所淹没。唯有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56年苏联的历史，24年中国的历史，难道还没有充分证明这一点？

除以上两条外，其他几条你对我的批评，全都同意。至于所谓哲学上的多元主义，无非就是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的的意思。关于终极目的的问题，如果你有兴趣展开，我倒很乐意和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17世纪以来，有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两次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它们在法国本身，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然而它们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这种趋向，按两次革命本身来说，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上辛勤努力地证明这种趋向可以成为现实，以及如何成为现实。1917年它真的成为现实了。成为现实了，并不是没有问题。对此，我们谈过，下面还要谈到。

上面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想指出，这两次革命都是注定不能成功的。罗伯斯比尔为了保卫革命，打退侵略，不能不破坏资本主义秩序。他实行恐怖，征发粮食，然而他的根本信念是保卫资本主义秩序。按照他的逻辑，革命的唯一可能的结果是拿破仑主义——用拿破仑法典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用彻底的独裁和对外的军事光荣，既压住资产阶级又压住无产阶级，使两者都为帝国效劳，而不使两者发生激烈的冲突。逻辑上唯一可能的结论是拿破仑主义，然而罗伯斯比尔本人不能成为拿破仑，因为他的恐怖主义得罪了一切阶层，破坏了政治的上层机构得以维持下去的内部和平。他只能为拿破仑清道。但是，《93年》（雨果著）却是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型。

1870年，成功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姑且假定，公社打败了梯也尔，俾斯麦能听任法国成为公社的法国，像《法兰西内战》所描绘的那样吗？而且，公社内部并没有产生出坚强的领导中心（你对这一点是看透了），这种领导中心，唯有在1870年以后又过了40年，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工会的领导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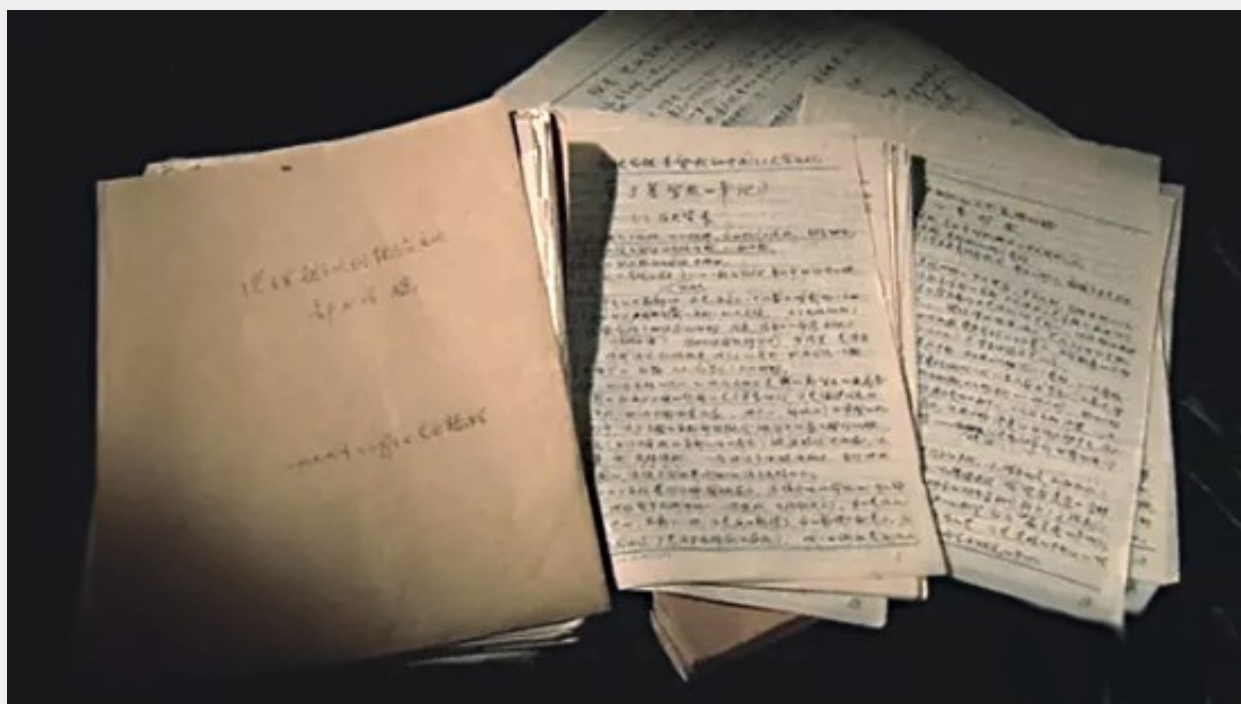
并且为一大批最有毅力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所真正掌握了的时候，才能形成。

此外，公社对镇压反革命和进攻凡尔赛的软弱，是和 1793 年遗留下来的影响有关的。1793 年在欧洲留下来的影响，最深刻的是它们的恐怖主义。要知道，马迪厄的称颂罗伯斯比尔的《大革命史》，是 20 世纪的产物。直到西方文明传到中国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在一般人中印象最深刻的名言，是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这种对恐怖主义的强烈的反应，是巴黎公社软弱的原因。

正是巴黎公社的失败，正是白色恐怖的无比残暴，这才在后代“要革命的人们”中间留下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现在，1917 年有了充分的条件了：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1917 年的革命胜利了，而以上这些命题，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还是有力的鼓动口号。

1917—1967 年，整整 50 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 50 年提出了以下这些问题：

1. 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手稿，
顾准与其弟陈敏之在通信中的学术讨论笔记，写于 1973-1974 年，
历时 18 年，才得以在香港出版

2. 1789 年、1870 年、1917 年，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3. 1789 年、1870 年、1917 年，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说过很多了，暂时不补充了，待你批驳后再说。

关于第二个问题，晚近的材料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准备多说几句。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这股潮流，没有限于英、美，它把法国、北欧、西欧、日本等等都包括进去了。它有过极其残暴的表现：殖民主义、分割世界、帝国主义，它曾经想扑灭 1917 年的革命，它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等。在英国，1870 年以后直到第二次大战为止，确实有过盛大的海外投资，把国内的经济都耽误了等等。

可是，它也有另外一种经常在活跃着的因素：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因此，在帝国主义时期，有过霍布森 (John Aileinson Hobson) (他写的《帝国主义论》，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原本)、维布伦 (Veblen) 等等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大英帝国的伦敦，庇护了马克思和他的“国际”。它还在它的内部发展起来了职工运动。这种职工运动固然把工党，甚至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吸收到它的体系里面去，成为它的机体的一部分，然而也发展了一种“民主福利国家”。我最近涉猎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文献，有几件事很可注意。美国的利息、股利、地租等不劳而获的收入，1914 年是 1945 年的两倍。工资在国民收入 (个人收入) 中所占的份额，战后的 20 年中从 60% 上升到 82%，他们的知识分子，现在正在强烈地鼓吹平等主义等等。至于另外一些事情，从西方新闻中可以获悉的，则有西方的军备支出，愈来愈受到国内福利支出的压力而不易扩张。相反，苏联的国民收入则有 40% 用于军备；军备竞赛的主动权，现在竟已操在苏联手里。又在那里，像萨哈罗夫这样的人正在受到政治的威胁——这可以说是因为他的自由主义帮了帝国主义的忙吗？

这样看起来，100 多年的历史，证明两股潮流在交叉。1917 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没有这种冲击，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见得会从帝国主义的道路上退回来，不见得会在其内部产生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至少，这股潮流不会强大到目前那种正在缓慢地改变资本主义面貌的程度。奇怪的是，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而且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转化过去。

我不相信，它真能转化到它的反面。看来，相互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史的进步；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像了。

这就可以谈谈终极目的了。1789 年、1917 年，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 1000 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要使运动强大有力，这种终极目的是需要的，所以，当伯恩施坦回到康德，即回到经验主义，说“运动就是一切，终极目的是无所谓的”时候，他破坏了这面飘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修正主义。

可是，这些发生在“娜拉出走以前”。娜拉出走了，1917 年革命胜利了，列宁跟他那时代的青年人说，你们将及身而见共产主义。当时的青年，现在恐怕已经死掉不少了，还活着的人，目睹的是苏联

军舰游弋全球，目睹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赶不上捷克，目睹的是萨哈罗夫的抗议和受迫害。而究竟什么叫做共产主义，迄今的定义，与马克思亲自拟定的定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愈来愈分歧，愈来愈不一致，也愈来愈难理解。也没有多少人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许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答案。我的答案则是：即使以现在的状况而论，苏联和中国的普通人比过去好得多了——假如真有共产主义的话，他们现在比几十年前离共产主义近得多了。也许，让 1000 年前的人活过来看现在的世界，他们会说，这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他们的处境，都在力求向上、向上、还向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问题（按辩证法说叫做矛盾）。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互相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会自杀。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是不断斗争向前，还是来一些矛盾吧！

说过这一段话，民主这个问题似乎也好解决一些了。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 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

这是可悲的。

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末，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我说过关于民主和进步、民主和科学的关系的许多话，上面也算是又一种解释吧。 ■

[【返回目录】](#)

许章润：法无正念，必成恶法

[许章润 著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首发于2018年11月28日FT中文网]

那年暮春往南，在一家大学讲座。一位同学提问，指谓“许教授作为非法律学人”云云。以此定位，画虎画犬，意在褒扬，而例属误解，却引发正解，彼此莞尔。当晚夜车回京，浑身困乏，却难禁浮想联翩。窗外幽冥，时或灯影憧憧，联袂成打泼了的水墨飞白。回头省视将近四十年学徒生涯，法学院茶杯里的死水微澜，反思自己的学思理趣，会心而痛心，宽心却揪心，致令通宵不眠。

十七岁上，吾辈贫寒，公权宽大，有幸上大学。四年法学本科，半饥半饱中度过，却心意激越。1983年秋，北上京华，入读法大刑法专业，凡三年，跟着流程走，时或青春发作。毕业后“服从分配”，留校教授刑法学与犯罪学，还有“劳改法学”，如此直到1994年。其实，早在1989年后就已甩手跟它们告别，既因了无兴味，亦于价值上衷心反感。当其时，内心深感不幸生逢恶政辖下，继续以此为业，无异虎尾春冰，而且，一不小心，岂非助纣为虐。当然，现在回头一看，此间误解多多，而青春激昂，不容玷污，却不明白起承转合，只能以此揖别。就此打发了学科，其实是为了打理自己，安顿那懵懂怔忡却杌隍愤慨的心。除开少数幸运者，无人指点，孤身瞎蒙，冥行撞墙，是那个学术断层时代过来人的共同经历。是啊，心思浩茫连广宇，这苍茫世界，这寥廓人间，不公不义，三尺法安在哉？对于一个27岁的青年而言，此时此刻，思逞八极，上穷碧落下黄泉，正当时也。

置此情形下，为生计考量，还得在法学院讨口粮。羡慕先贤“卖文买米，逐水草而居”，困顿却放达，形役而不羁。相形之下，自己两手空空，内无资质，外无机遇，而根本在于心性懦弱，只好蜷缩在单位打工。长期以往，偌大中华，不仅形成了一种叫做单位的围墙生活，一个从生到死将你包裹起来的周全建制，而且，养出来了一批靠单位、吃单位、服从单位却又动辄闹单位、坑单位，从而，离开单位就不能活、所以终究只好俯首帖耳听从单位的物种。在官方媒介中，他们阵势严整，以集体面目示人，常常又被叫做什么什么“新人”。在此情形下，华夏泱泱，所谓的大学不过都是巨型国营单位而已。话说回头，当时法学院诸科中最能体现形上性格而契合自家身心的，不就是法理学吗？于是，遂转攻法理学，或者，将治学领域扩展至此。迄而至今，误打误撞，这十来年的兴味再转，主要放在政治哲学领域，往好里说，也算是旧学邃密转新知吧。

因为有此转折，经此同学一说，不禁想到人之心智与心性二柄，其之纤细幽微，其之倔强冥顽，夜半扪心，真堪惊讶。心智大致意味着智商高低，心性讲的则为其倾向性。心智高，不妨研究数学哲学，要不别往那儿蹭。心智低，只能做修路工洗碗工。本来，干活挣钱，养家糊口，流血流汗，就是顶天立地。但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分工确实关涉心智高低，由此造成社会差等，进至于社会苦难，则毋庸讳言，

而另当别论。而且，因着制度不公，起点差等，那挥汗如雨的修路民工大军中，谁敢保证不曾埋没过多少牛顿、爱因斯坦与梅兰芳周信芳！不过，若心智虽高却不适合研究数学，毋宁，更具“艺术气质”，抑或恰恰相反，只于物理世界痴迷，天生是个工程师，这便牵扯到心性及其倾向性了。通常说某某“适合”或者“不适合”做什么，不仅虑及心智，同时更多的是指心性之亲疏取舍。古往今来，许多诗人是法学院的逃课生，就因心性不合，备受煎熬，索性一走了之。马克思·韦伯和卡尔·马克思，更不用说大诗人海涅，他们或以“社会科学”明世，搅动一天风月，或因不朽诗篇传世，令灵魂不得安生，可一水儿的都是法学院的逃课生呢。不论心智，究其心性而言，着令这些天才埋首法律规范主义作业，用庸碌诉状来压抑豪情，而扭曲才情，委实太过委屈他们了。此情此景，恰如京剧《林冲夜奔》中豹子头的那句唱词所咏：“红尘中误了俺武陵年少”。

置此情形下，西洋往昔所谓“柏拉图驱逐了诗人”，就因为柏拉图以荷马为敌人。在他眼中，荷马这位叙事诗、编年史的作者，鼓吹情欲，纯粹是妖言惑众，适足以乱世。故尔其著述针对的是荷马，却又不便明说仅只针对诗人，毋宁，表明哲人哲学王战胜了诗性与诗人，是在并且仅仅在此意义上宣泄一己喜恶而已。猜想自今往后，五百年，如果还有人拜读钱穆先生文字，不明所以，会以为钱先生对哲学家有偏见。其实，钱先生明里暗里讽刺的哲学家只是胡适之胡先生，他对吾乡绩溪胡先生有意见，而不是对哲学家有偏见。

职是之故，前文提及的那位学子，以“志在成为一个立法者”自勉，仿佛诗人气质与诗性思维占据了上风，也是青春激扬的表征，弥足珍贵。但就法律之为一业而言，则需借助法律理性来对冲转圜，方始中道平衡，而接近于法律的中立公道本义。说到“立法者”，适需注意该词至少具有天上人间两个维度，自有分际，不可不辨。若谓立法者意指从役“立法工作”，作为人大、议会中的一员“立法工作者”，则隶属立法机器中的一介肉身，所作所为，一种世俗劳作，而例为“普通螺丝钉”也。其之无关诗性，亦不涉才情，惟需恪尽职守，肯堂肯构，不言自明。其间流转，自有繁文缛节羁绊，未必想蹦跹得多高就多高。但是，纵便如此，一旦位高权重，而诗性发作，豪情干云，以“四句教”，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励，进而指导立法，则需慎之又慎，如履如临。大权在握，排兵布阵，神驰八极，不难想象其所指与能指，难抑其可能、可憎与可怖。君不见，寒冬腊月，一声令下，就让在京务工的数十万民工兄弟三日内滚蛋，进至于赶出家门，拆屋扒房，此权势之不受制约，毫无天下生民之念，嚣张而错乱，令人发指，不就是眼面前的事吗！至于江西麻政，突然发飙，收缴寿棺，集中焚毁，不仅残暴无情，伤天害理，更且荒谬绝伦，愚不可及，同样是眼面前的事，夫复何言！

行政如此，立法如此，都在于一个权字在手，而不受制约，则自大膨胀，恐怖如斯也。

毕竟，立法是个家常活儿，法律不外人情，一如生活本身才是真正的立法者。因而，常态时光，观俗立法，随乡入乡，陈述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不违普世公义，蔚为底线。当此之际，岂能当人世如白

纸，随意染黄染苍，又岂能视民命若无物，而纵情生杀予夺。当然，若果以此自励，志在成为一个学人，如牛顿柏拉图，如孔孟程朱，是并且仅在此意义上使用“立法者”修辞，则此“四句教”所鼓荡激扬的超越心性，嗨，一定、肯定和必定，是将你渡过无边苦海而驶向理想彼岸的一叶扁舟也。——既是无边，则怎能渡过？！朋友，一切困顿与超越，所有的希望与绝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真的没个去处，遂无地彷徨矣！

职是之故，此处关键是想做什么样的立法者。人间世，千年教训，万年生聚，自有轨辙，不外一切以生民和平安居为鹄的。群居是我们的宿命，而饥饿是人类的第一政治属性，这才凸显出和平的致命政治意义。因而，但凡以所握世俗权力希图改天换地之际，也就是最为恐怖之时。此时此刻，亿万人沦为试验对象，一种“必要的代价”，则“天地不仁，万民为刍狗”，能不恐怖吗！此因近代中国不幸遭遇极权，其独夫狂汉，为了兑现一己理念，致使万民涂炭，更是教训惨烈。“赶英超美”，豪气干云，可欲以短短十几年为限，便过上“共产主义生活”，而大动干戈，亿万斯民便生不如死矣。

迄而至今，倘再冒出个这样的僭主立法者，朋友，那日子还怎么过呢？！

转借肉身与灵魂的譬喻，则通常所谓的法律，取其广义，不仅是一个规范体系，而且是一个意义体系。一切法律均需形诸规范，而规范的背后与深层，一定隐含着既有的价值理念，指向特定的意义追求。以吾国现行《宪法》为例，其序言“规定”男女平等、九年义务制教育、宗教信仰自由。凡此条款，喧喧赫赫，冠名堂皇，很像个现代国家的样子。其为宪法规范，背后潜伏而支撑的则为男女平权、政教分离、灵魂自由等一系列意义、价值与理念。放宽视界，考诸史实，法律从来就不只是一堆干巴巴的条文，虽说多数时候不免僵化而冷漠，但却以价值理念、信仰精神作为意义支撑。合此灵肉，法律遂成规范体系与意义体系的统一体，而人间得有倚靠也。换言之，任何法律，只要堪为法律，从来二者合一，否则难言规范，不成方圆。善法得立，在于秉持普世理念，体恤凡尘生计，切合民情风尚，不违人性，而一以护持公义为最高准绳，堪为正念。恶法既成，正因为邪念当道，居然视天下为一党一派之家业，没了灵魂，或者，背后的意义体系出现严重偏差，得了神经病。

如此这般，朋友，吾人可得陈述而告诫者，不论是立志成为立法者，还是如在下这般满足于当个法学院的教书匠，顶顶要紧，也最最要命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法律须有灵魂，秉持正念，否则必成纯粹压迫工具。那时节，假法律之名行违法之实，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沟壑在前，呜呼哀哉！

[【返回目录】](#)

金雁：唯成份论年代的经历

[金雁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转载自 2018 年 11 月 15 日 FT 微信公众号：秦川雁塔]



本文作者金雁教授

1970 年我 16 岁。我们全家“下放”到 L 县已经五年了。

69 年初中毕业以后，因为我们是“黑七类（“地富反坏右”五类再加上资本家、“黑帮”，父亲属于最后一类）子女”，不能升高中不能招工，更别想招干参军了，完全就是不入流的“贱民”。而且实际上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地位比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还要低，可能还要加上一个“异”字。在本地人看来，我们是客居此地、招人不得见的“异乡人、外地人”。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在当时的社会分层结构中，表面上外地人处在“上层”。可能当时有“异地为官”的规则吧，或者与此地当年是由解放军“一野”解放，以及 1949 年后西北局干部调配有关，反正我们在 L 县的那一阶段，我印象中县委、武装部这一层陕西、河北人居多，科一级大多是湖北、四川籍的复转军人，县医院、文化馆、县一中二中的文化人当中，也是南腔北调的，文革中的六二六、三线企业人员增多，使这个小社会中颇有点“五湖四海”的样子。

刚到此地时，并没有感受到太强烈的排外感。那时讲普通话的人反而多少还有点“优越感”。但是生活深入下去就能感觉到，在真正的熟人社会里，我们是“客”，本地人是“主”。在工作学校之外，当地真正的民间生活并没有接纳我们。要想尽快进入角色融入其中不是那么简单，要想从外来的“他者”变成他们认可的“自己人”，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不知为什么，家里的男性好像迟钝些，而女性们都感知到这一点，并有些“刻意”的“接地气”，我很快就能讲一口流利的本地语言了。妈妈在印刷厂和面粉厂工作时，对邻居们要点边角纸张或者喂

鸡的落土粮食，都尽可能的有求必应，我们和近邻的关系都不错。巷子里的人都称呼我父亲“金老师”，尽管实际上他从未任过教，而我母亲则根据当地称呼为“他金婶”，这两者看似没区别，但从方言上则透露着亲疏。



西北局旧址

随着局势的变化，当地人对我们的态度也在转变。当时挨批斗的人当中无疑是“异乡人”占了多数。虽然“斗走资派、批牛鬼蛇神”并不带有地域歧视，可能连“造反派”都没有意识到，地域色彩与阶层构成之间有什么关联，但是看着那些此前得意的外地人被批斗，本地人幸灾乐祸溢于言表，我想过去的优越感与现在“倒霉”时的招人反感是成正比的。

说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呢。不知为什么父母工资这样很私密的事情，我们刚到县城就弄得众人皆知。按理说，我父母的工资级别放在北京、西安这些城市里也就是一般水平，但在小县城还是显得有些扎眼。有好事者给我们家算了一笔账，觉得在人均收入十几块的小县城里，一家里可以人均到 50-60 元是足够咋舌的。曾经有人就问过我，你们家那么多钱怎么才能花掉呢？话说回来，不管多少，那也是父母在机关里评职称发的，不夺不抢，凭什么就不能拿的心安理得呢？

邻里邻居的互相帮衬是理所应该的，别的都好说，最让我们招架不住的是“借钱”。一般情况下人们倒倒手，月底借月头还，妈妈也是不敢驳面，但是有人借了不还倒挺理直气壮，到时候依然来借钱，笃定了是没打算还的。毕竟我们还要给奶奶姥姥寄钱，还要接济不宽裕的亲戚。为此妈妈拒绝过一两家远邻。

1965 年秋天这里搞“第三期社教”，其中一项内容是“民主革命补课”，据说“彭高习”主政西北导致当年“革命不彻底”，很多“阶级敌人”漏网了，因此要重新划定成分。因为当时下放落户的时

候，父母分别落到了自己单位，我和哥哥落到了学校，家里的户口簿上只有弟弟一人。等到成分张榜的那一天，9岁的弟弟哭着跑回家来，指着自己的鼻子对着我们说，你们去看看吧，“我是‘地主’？”天真的孩子，田无一垄，房无一瓦，怎么就成了‘地主’了呢？



社教运动

母亲去找社教工作队的人，他们推诿说，这事是领导和群众定的，我们无权调整修改。母亲只好去找县社教工作团副团长、军分区 C 副司令员。母亲问他，你家里是什么成分？你现在填的是什么成份？他说，我家庭出身是“中农”，我是抗战时期参军的，现在是“革命军人”，我的儿女自然都填“革命军人”。

母亲对他说，首先，标准应该是一样的；你的孩子能填“军人”，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填“干部”？他说，本来是可以填“革干”啊，但是你们犯错误了，就不能填“革干”了。我母亲说，“军人”、“干部”、“学生”都是一个阶段的职业概念，如果“军人”可以作为“成分”的话，“干部”为什么不可以？至于前面的“定语”是另一回事，况且是否“革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再说了，犯了错误可以改正啊，改正了就是“革命同志啊”。“孩子的父亲还是四十年代的地下党呢？”

这位 C 副司令员还算通情达理，他说你讲的这种情况比较特殊。我无权决定你那 9 岁的儿子是什么成分，但是我可以了解一下情况，同时向上级反映后再答复你。后来他还真的询问了我们所在东巷大队的工作组。据说在讨论我们家成分的时候，有一两位贫协的人特别积极的主张把我们家划成地主。理由是我们这一片没有“地主”，会被上级认为工作不力。因为没有地富，没有阶级斗争，是不利于打开运动局面的。甚至说他们那么有钱，他们家不是“地主”谁是“地主”。还有人说，他爷爷是地主，那孙子当然就是地主了，所以我们家作为外地迁入人员就应当是“民主革命补课”对象了……真让人哭

笑不得，这都哪跟哪啊，挨得上吗？竟然没有人觉得荒唐。妈妈一想就知道，可能是没借钱而得罪了什么人。

无处讲理的地方在于，父母现在的工资和“靠剥削”的“地主”家庭没有任何关系。尤其是母亲，家中到我姥姥那一代就已经是天津纺织界的“职员”了，我母亲她们那一代都是靠父辈的薪水养活，延续到我们已是第四代人了，没有沾过“地主”祖先一丝的光，反而让我们孙辈都成了“地主”。

所有的人都承认这件事不合理，但是那时“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在思想上行动上依靠贫下中农”的口号下，没有人敢于出面更改。最后 C 副司令员提了一个“个人”建议，你们的子女可以填“干部”试试看，他还补充说，不过我觉得不一定行得通。果然，我们的档案不管个人怎么填写，只要到了县上，总会有“热心肠”的人“帮助”你改回“地主”的。

后来我看到了批判 C 副司令员的大字报，想起妈妈说的那句话：“是否‘革命’不是个人说了算的”。想着他只不过比父亲“倒霉”晚了两年而已。即便如此我还是很感激他的，认为他有人情味、讲道理。母亲态度柔和地论理，虽然既符合逻辑又反映的是实情，但是如果惹得当官的不高兴，整你不就像踩蚂蚁一样。他还是能够听取并实事求是的处理问题。所以虽然只见过他两次，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依稀还能记得他的模样。



插画 金雁

那些年，我们这些“黑七类子女”的日子很不好过。巷子里那些男孩子不太敢惹哥哥弟弟，专门纠结一帮半大小子起哄欺负我，向我扔石子，拿弹弓打我。在我后面喊“洋婆娘，穿洋袍，吧唧一声摔一跤”，“畜皮家家周扒皮，钱多砸死你，吃饭噎死你！”没给借钱那家人的孩子还放狗出来吓唬我。我

当时就对这种煽动底层仇恨意识的做法很抵触，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所在的县当时还没有知青上山下乡，我就在家里一边自学看些书，一边想方设法找些活计干。这期间我什么都干过，给学习班当过记录，给 B 镇当过跑腿的，这些都是义务的，只求人家能够接纳我。父母工资虽不低，但是要几处寄钱，到了月底也常常捉襟见肘，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冻结了，我们不得不早点自立早点想出路。

为了生计我和弟弟也打些零工补贴家用，我曾去苗圃锄树苗，在河滩里装沙子，帮人糊信封糊火柴盒或者拆棉纱。但是这些活计都干不长，长则十天半个月，短则三五天。弟弟找了份跟着测绘局的人搞地质普查的工作，跑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学习绘图制表，我很喜欢他的那份工作，可惜人家不要女的。



插画 金雁

当时父母对我培养有分歧。父亲主张把我当男孩子养，凡是哥哥弟弟能做的事，都鼓励我去尝试，还曾经教过我几手搏斗防身技巧。妈妈则觉得女孩子应该有女孩子的模样，一天到晚跟在男孩子后面整的跟个“泥猴”似的，怎么得了。父亲说了一句很文言的话，原话我已经不记得了，大概意识是说，“乱世”中像男孩一样皮实泼辣一点好活。我心里的小九九则是，跟着哥哥弟弟就会少受欺负，其实哥哥他们怕其他伙伴讥笑，一般不愿带着我。我剪的短短的运动头，像小尾巴似的混迹在男孩子中爬树、翻墙、打架、游戏……性格中无形中多了一份生活所迫的“保护色”。

我曾经在蔬菜公司打过短工，无论是收菜还是腌咸菜，我都很卖力气，因此口碑不错。后来有一位

同学的妈妈调到蔬菜公司当副主任，便介绍我去那里当临时工，每个月 30 元工资，比正式入职员工少 6 元，要到离城 20 里外的 W 镇上班。我倒很是欢喜，毕竟有了一份固定些的工作，工作之余照样可以看书，也可以躲开那些起哄架秧子的讨厌男孩。

我打着四方块的背包，脸盆里装了两本鲁迅全集、两本列宁全集满心欢喜地工作去了。W 镇因是交通要道的火车站所在地，是西进的必经之路，有机务段，不管是火车客车都要在这里加水或者换机头。有军需供应站、省木材转运站，还有一些厂矿企业，比起县城所在的 B 镇，W 镇是一个更加外地化和包容的地方。

我们蔬菜商店在老街北面紧靠火车站的主街上、汽车总站旁边，军需物资站的斜对面，前面是门市部，后面是狭长一条，五间砖瓦平房是宿舍，后面有库房、菜地和猪圈。

职工连我一共是八个人。J 主任是转业军人，大概是 1962 年中央“关于选调转业军人到商业服务部门”的指示下来的。他是河北人大高个子，一天到晚黑着脸挺唬人的。小 Y 和老 P 都是铁路上机务段的家属，小李子比我大 3 岁是正式职工，萍萍妈是我们厨师，因为萍萍是智障儿，她只负责我们每天两顿饭。小 S 是业务加采购，不在门市部上班，李大爷既是门卫也是库房保管还兼喂猪种菜。



插画 金雁

宿舍的第一间是值班室，我和小李子住第二间，小 S 住第三间，J 主任住第四间，最后一间是厨房，李大爷住在后门门房里。老 P、小 Y、萍萍妈都是当地人，下了班就回去了。我们的工作忙闲不固定，大头在于单位采购，有时候过军车上补给，一个人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来都不够用，闲的时候一天也进来不到 20-30 人，也就几十块钱的零售营业额。

我很珍惜这份工作，不忙的时候我就主动去给李大爷打下手干别的活计。李大爷有些耳背，但是很耐心一样样地教我。我挑水种菜喂猪，看着小小的萝卜苗、茄子一天天长大结果，很是高兴，李大爷还专门给我划出了一小块地，随便让我种什么。

李大爷把土炕刨了做肥料，还教我打土坯盘新炕。打土坯的时候，挽着裤腿光脚丫子，用长方形的四块木板条做外框，先撒一把草木灰，接下来三锹八杵子，四个脚底子——也就是三铁锨土，用杵夯八下，李大爷力气大，夯五下就可以了，而我则要多杵三下，然后在四个角各跺一脚，打开木条，整齐地把土坯摞起来晾干就可以了。

说实话我有些怕 J 主任，他一天到晚虎着脸，让人感觉后脖颈子发凉，觉得自己像做错了什么。不过有两件事使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一件是有一次总社来人想打发李大爷回家。J 主任说，那么大年纪了，在没有合适的人来之前就让他干着吧，多一个人也不多。还有一次 J 主任的女儿来看他，因为他女儿和我弟弟同一年级，我们年龄相仿又都是外地人，总有些共同语言，女孩子们很快就混熟了，在一起说说笑笑，J 主任看着我们也露出了难得的笑脸。

我们除了正常上班，不包括李大爷剩下的 7 个人要轮流值班。说穿了不过是在值班室里守着电话机，以防有什么重要通知。一般而言值班不过是换个地方睡觉而已，我到了两个月接到过一次军需供应站的电话，要求我们补充蔬菜水果，估计是过军车所需要。还有一次让我们连夜上街欢呼，迎接最高指示。我喜欢值班是因为每值一次班，就有 3 角钱的“夜班补贴”，这样我回家的车费便有着落了。

但是奇怪的是，小李子不太喜欢值班，每次轮到她值班就情绪不高。好像记得是深秋季节，我们宿舍里还不能生火烧煤炉，但是值班室有一个大铁皮煤炉已经燃起来了。轮到我值班，小李子恰好请假回县城，小 S 去外地采购去了。晚上就剩下我、李大爷和 J 主任三人。我早就盘算着在值班的时候，要借着值班室煤炉的热乎劲“大洗一通”。L 县缺水，平日里没处洗澡，秋风瑟瑟下人萎手缩脚的，已经好多天像“猫洗脸”随便划拉划拉，手上的皮肤都粗糙爆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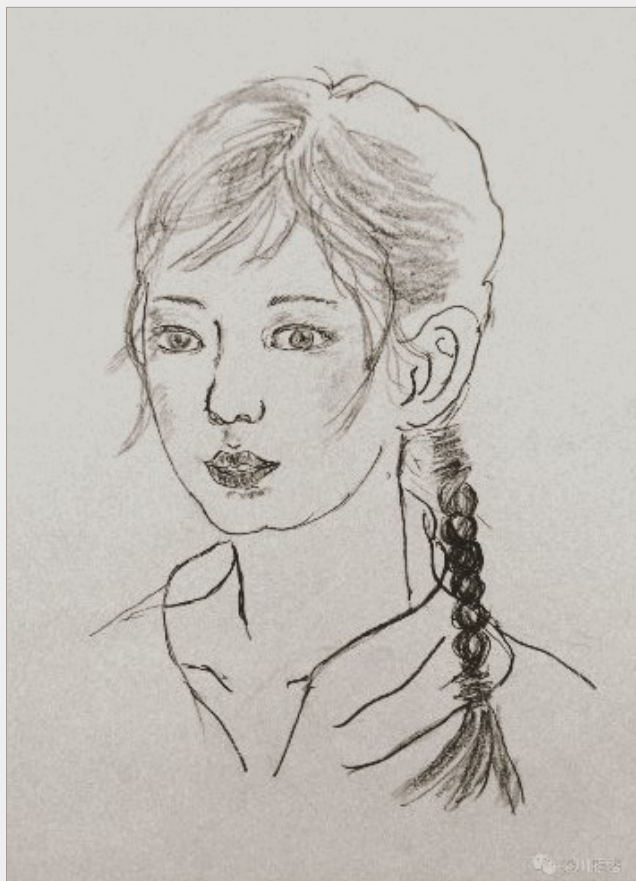
小李子临走的时候，特别嘱咐我，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我说，你放心吧，有 J 主任还有李大爷，小偷绝对进不来。她欲言又止，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的走了。晚上我在整个院子巡视了两遍后，才挑了两桶水，把炉子生的旺旺的，自己先擦了一个澡，把能洗的衣服都洗了，用竹竿搭在两把椅子上，围着火炉晾了一圈的衣服，整得值班室热气腾腾。晚上 11 点钟出去倒水的时候，J 主任在门口抽烟时还问我，为什么还不歇息？我还特意表现说，“值班就要有值班的样子”。

最后我在房间里用力一甩手，把碰锁“咔”的一声碰死，这才准备歇了。临要睡觉时看见脸盆里的热水，犹豫了一下，又把身上的小背心也脱下来洗了，想着明天早上一准就干了。这才暖暖和和地沉沉睡去。

谁知半夜里突然发现我的被子上面躺着个人，满嘴酒气。我惊得一身冷汗——明明锁门了，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只见那人用公鸭般的假嗓说，“小金，我们玩玩”。这一声“小金”，让我分辨出来

是J主任，但是他完全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被教育要与坏人坏事作斗争，写作文大家都说要做雷锋、王杰、刘英俊。父亲也常说，如果有人要欺负你，不要示弱，要敢于斗争。我没想到会遇到领导这样的坏人。我因为没有穿小背心，裸着上身，不敢起来，就拼命裹紧了被子往里靠。他发现我默不做声，就得寸进尺一边抱着我的脸乱啃，一边伸手从被子下面乱摸。



金雁插图

他力气大我一时挣脱不出来，躲避的过程中头无形中碰上了应急灯。我值班时害怕断电或者遇到紧急电话，总是把应急灯放在枕头旁边。我虽然慌张害怕，但是也知道在这个大院子里，只能靠自己了。李大爷住在远远的后门，就是我大声喊，别说他耳背听不见，就算听见，以他的腿脚什么时候才能走过来呀。

我屏住气急忙伸出手打开应急灯晃他的眼睛，趁着他眯着眼睛的光景，光着脚飞快跳下床，从晾衣服的竹竿上随便扯了一件衣物，在胳膊下面围了一圈，用脚把小板凳、脸盆踢得叮铃光啷，并无意中摸到了捅炉子的铁钩子，我一手举着应急灯一手拿着铁钩子，大声喊，“混蛋，你出去！出去！”他也许没有想到我会是这般反应，也许是被应急灯晃得睁不开眼睛，竟然迟疑了一下。

可能他知道整个前院就我们两人，回过神来便有恃无恐的上前来夺我手中的工具。我知道打不过他，看着电话，心里飞快地盘算，是随便拨一个号码呢，还是用电话去砸他。因为转盘电话拨打起来比

较麻烦，比较省事的是把电话扔出去。他发现我的目光注视着电话，那时候电话属于战略物资，无论是毁坏还是随意拨打，都非同小可，事后一定会被追究责任。也许考虑到后果的严重性，他嘟囔了一句拉开门退走了。



我赶紧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抱膝坐在床上，这才发现刚才光脚踢小板凳把脚趾甲劈了。抬头看见值班室的闹钟是凌晨 3 点钟。这时我才浑身发虚地一点点回忆，想起小李子临走前的嘱咐，以及她每晚锁门之后还要在门前放一把椅子，想必小李子也吃过这种亏。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碰锁在里面有个按钮是可以从里面锁死的，真傻！如果早留意到这一点，他就是有钥匙也进不来啊，另外我也十分后悔自己贪恋热水洗的那么彻底。

第二天门市营业，我一改往日的勤快和笑容，横眉怒目地站在离 J 主任远远的地方。老 P 发现我的异样，问我出什么事了？我只告诉她我要提前下班赶回城里去，让她帮我盯一会儿。我回到家，母亲也刚刚进门，我把整个过程告诉了妈妈，妈妈带着我去了公司副主任——也就是我们同学的母亲家里。单位领导让我写了一份书面材料。

材料交上去后公司说，你就留在总店吧，不要回分店了。正好有一批库存很大的外地蔬菜要到各个集镇上销售，我连行李都没有取，委托哥哥的一位同学帮我运回来。后来过年的时候还碰到他的女儿想要和我说话，我假装没看见转到一边去了。最后我也不知道总店是怎么处理这位 J 主任的。

1971 年县里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不需要任何动员，就报名插队去了。像我们这样的人，还能去哪里呢？

[【返回目录】](#)

马维：恐惧、监控与告密·秘密警察阴影下的东欧文人

[本文首发于 2016-8-5 共识网，原题：在秘密警察的阴影下生活]

“这次，你如果能单独来，会更好。”这是《布达佩斯往事》开篇的头一句话。这本书有一个长长的副标题：“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够了，单是这些，就已经足够吸引我去买下这本书，而它的原文标题则更显直白：“人民公敌”。一个多么熟悉的名词。但究竟谁是“人民公敌”？为什么档案管理员希望查阅档案的人“单独来”？在接下去的八小时里，我没有任何停顿地一字一句读完了这部纪实作品，仿佛在和作者一起，窥探着在那个“潘多拉盒子”里深藏了数十年的家族秘密。我得说，这是一次酣畅淋漓的阅读，尽管它涉及的题材，是如此地黑暗，如此地沉重。

监控：不是秘密的秘密

这部书的作者，是匈牙利裔美国作家、新闻人卡蒂·马顿。她生命里最初的六年时光，就是在匈牙利度过的。那时，她的父母分别为美联社与合众社工作的，作为匈牙利公民，他们也是这个共产主义国家里硕果仅存的外国通讯社通讯员。早在战后不久的1946年，用作者的话说，“父亲就开始出现在苏联的雷达屏幕上”，这也就意味着，他受到了当局的关注和监控。这件事的起因是，当时统治匈牙利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苏联主席，命令匈牙利当局解散包括童子军在内的青年组织，并且禁止反对苏联的政客担任公职。敏感的新闻人马顿先生立刻意识到，外国势力又开始干涉匈牙利内部事务了，而这还是自德国的占领终止之后从未有过的事情，于是他在第一时间发出了报道。也正是在那一年的9月，匈牙利秘密警察机构“国家安全局”刚刚组建完毕，马顿就这样“顺利成章”地上了这个新单位的名单，有关他和他家庭的秘密档案逐渐成形，正式开启了此后近二十年全面监控的历程。

大约六十年之后，当马顿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时，新匈牙利的外交部长向这位始终忠诚于自己民族的声誉卓著的新闻人，颁发了匈牙利的最高文职奖。代为领奖的正是作者。当她从匈牙利外交部长的手中，接过秘密警察关于她父亲的一大袋材料时，不禁大为惊讶。而她的父亲，仍是一如既往地不愿意谈论过去，有生之年甚至从未打开过那个档案袋，也许是因为实在不堪回首。但正是这些材料，成为了作者探索那段隐秘家族史的起点，她开始频繁地返回匈牙利，细读档案，会见父母的老朋友或是老对手，揭开了一个又一个父母从未向她吐露过的秘密。

马顿夫妇出生于匈牙利的上层犹太家庭，两人都拥有博士学位，却常常因为自己的犹太出身而找不到工作，最后只能靠充任家庭教师谋生。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者从小对自己的犹太身份一无所知，直到三十岁那年，在追踪一位瑞典外交官拯救犹太人的往事时，才偶然从别人口中获知了外祖父母的下落：他们双双死在了奥斯维辛。而这个家庭里的两位成年人，从来都不向孩子提及这场杀戮，外祖父

母永远在家庭相册中缺席，当被孩子们追问时，马顿太太总是以泪流满面来作为回应，让人不忍再次提及。女儿曾经全然不知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二战期间，马顿先生曾经参加过小规模地下抵抗运动，这对夫妇的婚姻，在1950年中期曾经走到过崩溃的边缘……总之，在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一切的秘密、一切的家庭隐私，都早已不成其为隐私。



仍是翩翩美少年的父亲，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若干年，布达佩斯仍是开放、繁荣和宽容的社会，
马顿家族属于兴旺的中产阶级上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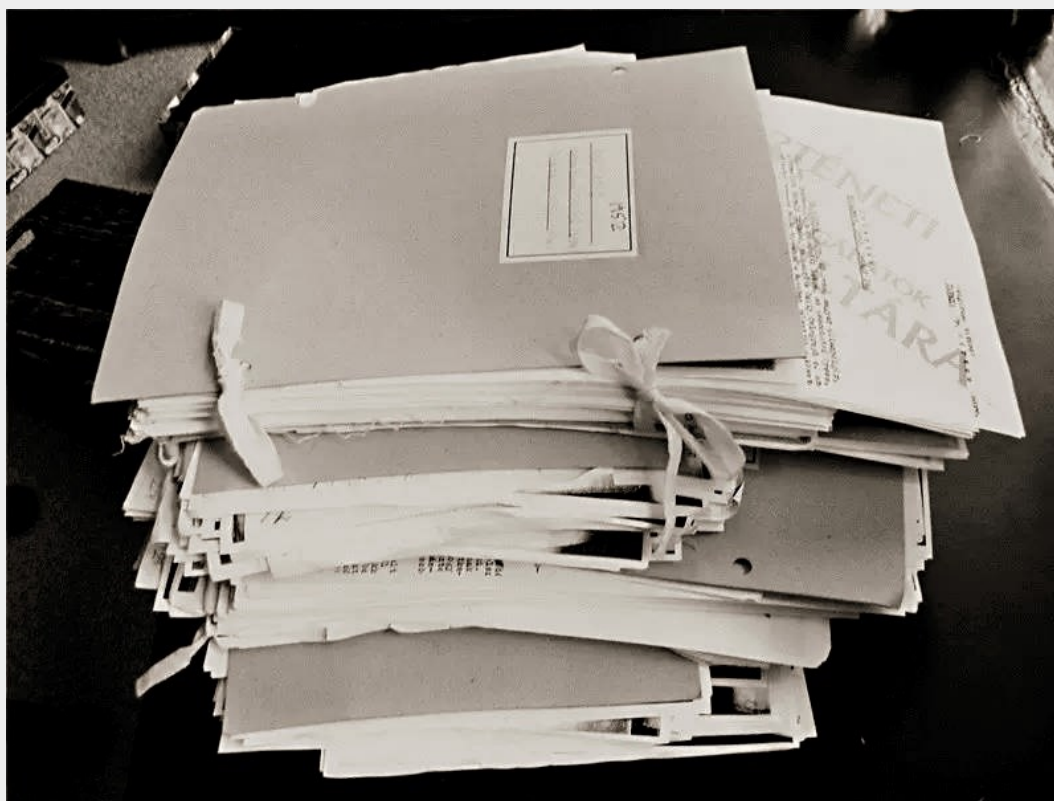
而另一方面，作为老牌记者和经验丰富的被监控者，马顿夫妇也完全对这种监控心知肚明。他们想出的对策是：在警察眼皮子底下，公开会见前来拜访他们的西方人士；每星期二，雷打不动开着漂亮惹眼的美国产白色敞篷车，去到美国大使馆参加记者招待会；定期带着孩子参加外国使团举办的聚会，并且永远是晚宴上唯一的匈牙利家庭。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显然是故意做给当局看，也是为了给将来注定要面临的审讯做准备。马顿太太在被捕之后，曾经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你们指控我从事间谍活动，可是你见过这样招摇过市的间谍吗？”太天真了！作为普通人，他们按照常理来做这样的自我保护，自然是没错了，可他们似乎忘了自己的对手是谁，或者说，也实在想不出更好办法来保护自己和孩

子们，无奈之下只能用这种“自作聪明”的办法来获取一点心理安慰。

恐惧、告密与坚守

马顿夫妇可以算是极权统治之下难得的明白人。可是他们也许都不愿意承认，他们做出这样下意识的自我保护，恰恰是因为感到恐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这部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著作中，早已指出过“恐怖”的实质。也是他，最早将“恐怖”认定为一种政治体制的标志。在孟德斯鸠看来，不论是共和制、君主制，还是独裁专制，在每一种政治组织形态背后，都有着与它相对应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因素或文化倾向，以保证维持这种体制。维护君主政治的是“荣誉”，维护共和政治的是“德行”，而维持专制独裁的，则是“恐怖”。用高压引出人民身体里的恐惧，靠这种永远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换取被统治者的屈从，让他们自甘奴役，变得犬儒、冷漠，丧失与周围人之间活生生的联系。

更可怕的是，这种统治还胁迫民众充当告密者。在这本书里，作者就反复提到那些记载于档案之中的、围绕在马顿夫妇身边的告密者：从看门人到家庭教师，从朋友到亲人，几乎每一个身边的人，都成为了马顿夫妇身边的“潜伏者”。而让人更感荒谬的是，马顿夫妇对此并非毫无所知，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甚至还不得不帮助告密者完成自己的对手给告密者布置的工作任务。比如，他们会为缺乏绘画天赋的保姆画下家里的平面图，让她拿给警察交差；每周在一起打桥牌的朋友告诉他们，自己需要定期写报告向国安人员汇报马顿夫妇的动向，安德烈·马顿就每月替他们草拟报告，自己“汇报”自己的一举一动，再由朋友用笔抄下送给警察存档。



“我细读和翻译了数百页监视和审讯记录，揭露了秘密警察对我父母的无比残忍”

那么，身处如此恶劣环境的马顿夫妇自身，究竟有着怎样的身份呢？难道他们就真的不曾出卖过自己身边的人？这也是作者在查阅档案时最害怕揭开的秘密：她怕有一天，从档案中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父母，同样是为人不齿的变节者或“线人”。她也终于理解了档案管理员的一番苦心：“你如果能单独来，会更好。”，因为这套记载着事无巨细生活内容的档案，很可能是一个“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就要冒永远打碎父母形象的巨大风险。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想想看，从君特·格拉斯到米兰·昆德拉，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秘密档案，揭开了多少人所不知的龌龊往事。在 20 世纪规模庞大的档案库里，还隐藏着数量惊人的普通人背叛和告密的故事。当然，我们可以说，在几乎没有选择自由的政治高压下，这类行为是可以理解，最终也是应该得到谅解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人的评价，毕竟是要以他自身的行为作基础的，某些切切实实存在的落井下石行为，难道就可以这样轻易地被原谅乃至遗忘了吗？

幸运的是，马顿父母的全部档案都可以证明，他们没有充当过告密者，即使是在被捕之后，官方档案也清晰地记载着，马顿夫妇没有在供述中牵扯到任何匈牙利同胞，对于那些享有外交豁免权、可以随时自由离境的各国外交官，他们写下的供述，也总是让国安人员找不到任何把柄。直到此时，长久以来折磨着作者的那种担心和忧虑，才总算是远离了她。在如此残酷、乃至可说是盛产恶棍的制度之下，能在如此艰难的境遇里，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的底线，不做施害者的帮凶，不助纣为虐，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爸爸自由了！母亲已出狱好几个月——这是我们 1956 年 8 月重聚的快乐日子

马顿夫妇始终坚守的，不仅是自己的道德底线，还有对家人的爱。尤其是马顿的父亲，这位一生都不善于对孩子表达感情的老记者，在狱中是如此在乎自己妻子和孩子的安危。一名同监的告密者在报

告中写道：“我了解他的本性。如果他仍在隐藏秘密，迫使他招供的唯一方式，就是威胁他的妻子甚至小孩。我确信，他的妻子，更甚者，他的小孩，如果大难当头，他会招出一切来拯救我们。”作者不无辛酸地写道：“多大的讽刺！他爱我们的最重要证据，竟来自一名秘密警察的告密者”。

而就在马顿夫妇的经历中，最让人感觉哭笑不得的是，他们曾经濒临破裂的婚姻，居然是被秘密警察的逮捕行动所拯救的。在马顿夫妇被捕之前的最后一个夏天，马顿太太发现自己的丈夫，跟英国大使馆一名官员的妻子有染，为了报复丈夫，她自己也开始接受来自一位朋友的追求。而1955年圣诞来临之前的那次秘密逮捕，以及随后而来的一段牢狱之灾，反倒是让他们更好地认识了彼此。伊洛娜在丈夫最艰难的时刻，竭尽全力争取西方支持，呼吁西方媒体向匈牙利当局施加压力，直到自己也因同样的罪名被捕，都始终没有失去过重获自由的信心。在狱中，她坚持向当局申请与丈夫会面，终于将外界的消息巧妙地传递给了对方。这一切，都给了一度企图自杀的安德烈以巨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经此一劫，他们终于重新爱上了彼此，直到生命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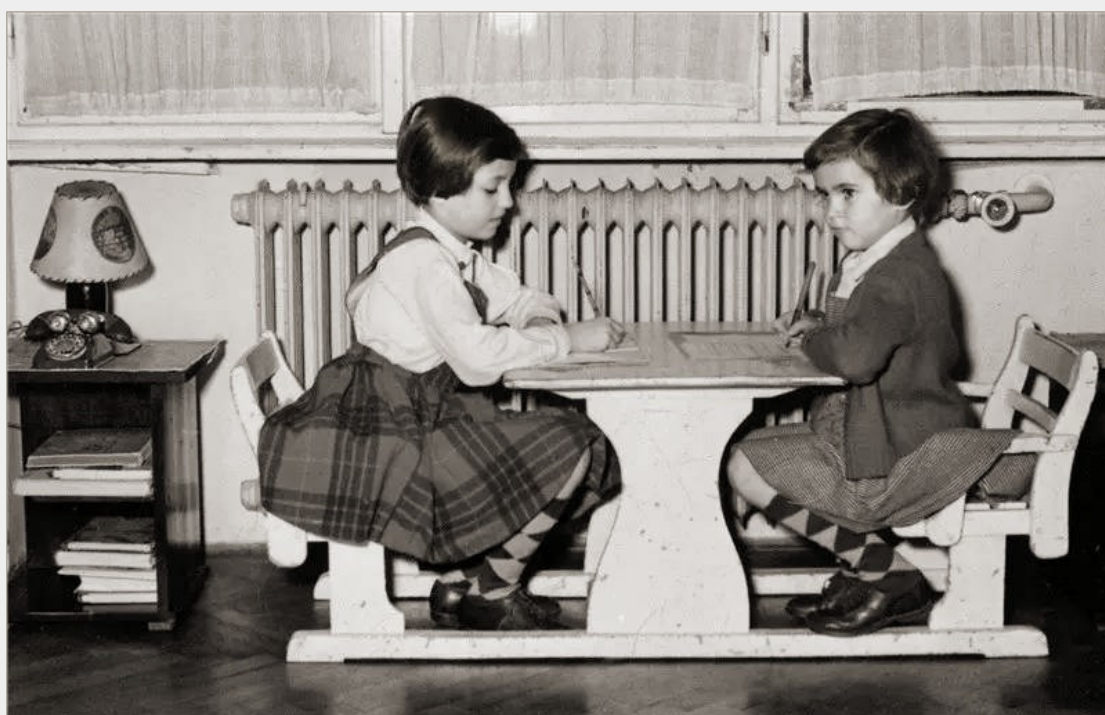
创伤，直到永远

在读这本书时，我总是忍不住为马顿夫妇的命运感到庆幸。诚然，他们的生命里先后出现过可能危及性命的纳粹统治，以及匈牙利极权统治者的迫害，但不幸中之万幸，他们以自己的机智逃出了纳粹的魔掌；即使不幸在共产主义的匈牙利被捕，所幸其时赫鲁晓夫已经上台，尽管那个曾令全体匈牙利人胆战心惊的拉科西正在经历短暂的东山再起，但比之于斯大林时代，统治的残酷性毕竟已不可同日而语，这让这对夫妇得以免于死刑或长期刑罚的考验。



在巴拉顿湖最后一次合家度假中，这是我最喜欢的夏日消遣，
对父母的婚姻红灯和政府的逮捕计划，我茫然不知

更有意思的是，从存放在档案中的秘密警察报告里可以看到，那个年代，政治嗅觉敏锐、永远善于骑墙的秘密警察们，正随时准备着抛弃他们服务的这个政权。因此在给上级的报告中，他们对怎样处置自己眼下监管的政治犯，总是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他们的上级，当然更不敢冒政治风险，监管人的这种态度，对改善了马顿夫妇的狱中处境，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直至后来先后被释放——而此时，距离匈牙利革命的爆发，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了。马顿夫妇积极参与了这次革命，在第一时间向西方媒体报道了这桩关乎匈牙利民族命运的重大事件。这已经是这对夫妇第二次为西方世界瞩目了——第一次是在他们被捕时。随后，他们逮准了一个机会，终于得以前往维也纳工作，很快全家又移居到了美国，夫妇俩在那里度过了平静的后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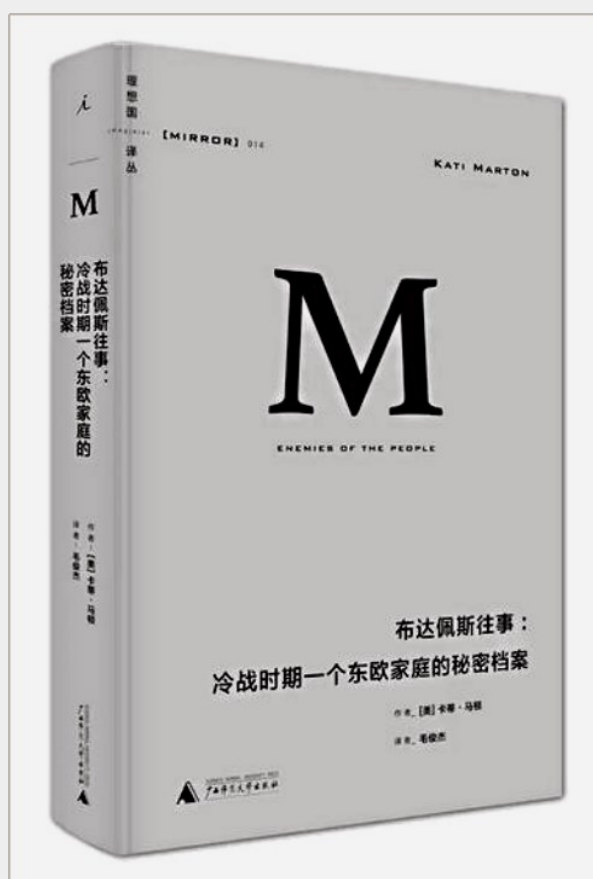


在乔鲍街公寓我们共同的房间里——还有书桌——朱莉和我在做功课

按理说，到此为止，他们与匈牙利秘密警察之间的故事就应该结束了。但根据档案记载，直到1967年，匈牙利当局派往美国的谍报人员，依然试图招募这对看起来仍有利用价值的夫妇，想要说服他们充当母国政府在美国的情报提供者。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反谍报机构联邦调查局也始终在关注他们，原因很简单：匈牙利政府情报人员在美的一举一动，始终处在美国政府的严密监控中。这对夫妇自身，也并不能让美国人彻底放心。事实证明，美国人的怀疑并非全无道理：这对夫妇当年之所以能够提前出狱，一半是当局基于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的决定，一半则是因为这次出狱其实是附条件的，当局要求这对夫妇必须分别定期到“安全屋”或咖啡馆会见秘密警察，报告他们自己的行踪。

极权政治最残酷之处，恰在此处。无论以哪种标准来看，马顿夫妇都已经堪称勇者，他们的出身、教养和成年后的职业选择、政治倾向，也都表明了这对夫妇是极度自尊的人。但即使是这样高贵的灵魂，也终究无法避免在极权统治下“自贱自辱”的命运，更不要提马顿先生在狱中曾被迫承认自己的间

谍罪名，重压之下曾数次想过要放弃生命。这真实的一幕，令我禁不住想起，在前不久读过的一本涉及匈牙利历史的小说里，作者借一位作家之口说出的那句无比沉痛的自白：“一个人在自己当过奴隶的地方，永远都不可能自由。”可以想见，当马顿夫妇铁了心要离开前途未卜的匈牙利，甘愿作为新世界的政治难民，开始全新的生活之时，除了现实的考虑，在他们的心底，恐怕也曾有过类似的念头吧。所以，尽管孩子们每次从匈牙利返回美国，他们总不忘问问母国的人事变迁，但总是再也不愿返回那片伤心之地，即便它已重获自由。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匈牙利裔美籍] 卡蒂·马顿 著，毛俊杰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1 月出版

而美国呢？且不说当年马顿先生服务的美联社，在他们被捕之前和出狱之后，曾几次拒绝帮助他们脱离随时可能危及生命的匈牙利政府的控制，也不说当年给马顿夫妇带来牢狱之灾的罪魁祸首，正是美国公使馆的一名内部人员——这位告密者在案发后，仅仅受到了遣返回国的处分——单就马顿夫妇到达美国之后的经历而言，尽管马顿先生终其一生都以“美国新闻人”自许，但在这个他们热爱的国度生活了十多年之后，某种政治上的不信任、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眼神，依然是他在美联社外交记者的职业生涯中每天都可能遭遇的。除此以外，两人还都要面对来自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更为直接的盘问，直到他们分别向联邦探员作出如下保证：他们将始终忠于美国政府，一旦发现对方谍报人员试图招募他们，他们一定会将情况及时报告给联邦当局。

作为女儿，作为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的妻子，不知作者在看到父母曾作出过这样的保证时，内心作何感想。冷战是残酷的。马顿夫妇虽是享有国际声誉的新闻人，但说到底，仍不过是东西方对抗中那枚小得不能再小的棋子。不过，同样是利用或压迫，在不同制度下，依然有着方式和程度的不同，而对于曾亲身经历过极权统治下恐惧、屈辱、压抑和绝望的个体而言，那样的不同，或许就是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不同了。从这一点来说，苦难固然会给人的身心带来永远无法真正抚平的创伤，但也会让有幸熬过了这种苦难，或是至今仍在煎熬中的人们，都去期待一种更自由、更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那种许诺给人天堂，其实却需要人们付出全部的道德代价，却仅仅只能换来一片面包的生活。 ❏

[【返回目录】](#)

陈彩虹：在无知中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

[陈彩虹 高级经济师，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原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秘书。本文为作者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一书所作书评，首发于《读书》2016年11期，部分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当我读完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教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紧张感和恐惧感一直消除不了。面对这次横跨物理、数字和生物诸多领域的“集成式”工业革命，速度、广度和深度无从掌握，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目前无法预料。福兮？祸兮？



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1938.3.3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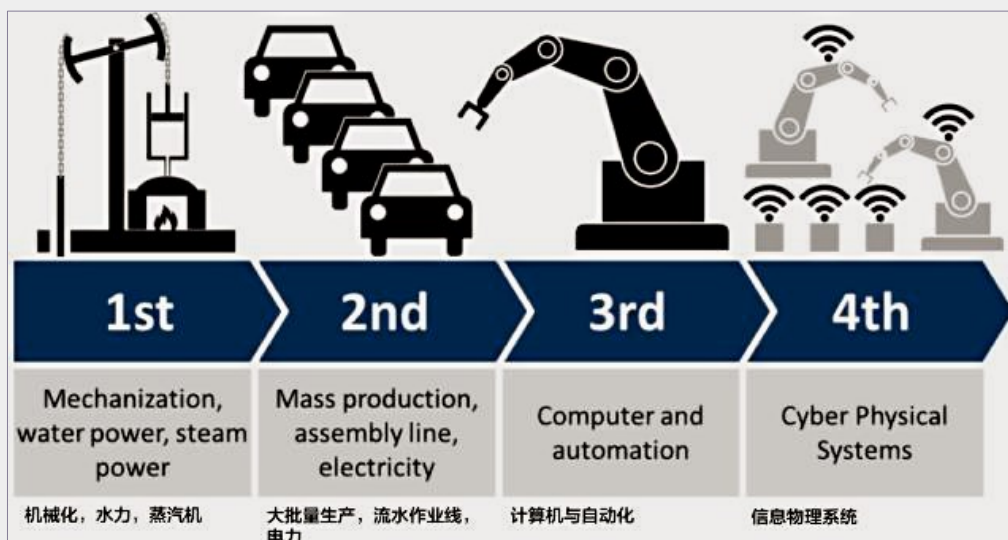
德裔瑞士籍学者，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学院机械工程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和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联合国发展规划委员会副主席，1971年倡议创建了世界经济论坛，并担任论坛主席

究竟什么让我们紧张？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分别以机械生产、电力和生产流水线、计算机为代表。现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之中。按照施瓦布的说法，这次工业革命的本质，完全不同于前几次。它不是某个方面的进步，而是横跨了诸多领域，不同技术可以贯通起来，随心所欲地制造出时空无限的产品。就此来看，这次工业革命要找出某个代表物，如机器人、量子计算、DNA 编辑重组物等，恐怕会十分困难，“集成式”革命带来的成果，实在是太多、太广还太神奇。

回看前三次工业革命，并就眼前革命的成果来看，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机器替代人”。当然，这里的“机器”需要做广义理解，它们不只是单个的人造物理实体，还包括互联网、虚拟平台和人类创造出来的其他存在物。在此，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每次革命创造了什么“机器”，二是它们

又能够替代人的何种功能。



一般说来,前三次革命创造出来的“机器”,是以物理机械性为主的,很小部分具有智能性。这样的创造物,只能替代人的部分功能。粗略地看,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是机器对于人手、脚的替代,以及眼、鼻、耳等五官的简单功能替代,或说主要是对人的体力替代;第三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技术为基础,开始了对人脑的部分替代,或说是对人的智力替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是飞跃性的,它由人的手、眼等向外延伸,转向了人脑的“机器化”创造,人们将计算机称为“电脑”,表明了这次工业革命的某些特质。同时,也预埋了这样的潜在走势——如果将替代人手、眼等的“机器”和“电脑”结合起来,是否有替代完整人的可能?

第四次工业革命恰恰就在这样的预示里,符合逻辑地到来了。现实已经展示了这样的走向,在前三次革命的基础上,通过多种技术“集成”,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超级机器”,进一步替代人的体力和智力,甚至替代人的全部功能,成为“机器超人”。我们这些上苍“用泥巴”捏制的“自然人”,或许在这次革命后,就不再孤独为单一人种,人类社会将添加新的“机器种群”了。这,究竟只是令人兴奋和愉悦,还是也会令人紧张和恐惧?

这就要看“自然人”是不是还能够作为人类社会的主体,有效地对“机器人”加以管控。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机器替代人”虽然也带来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的难题与困惑,如阶级冲突、失业问题、环境污染等,但整体而言,人类对那些“机器”的认知是清晰的、可控的;人的主体地位,只是受到某种“异化”,即一时地、偶尔地、部分地被“机器”推挤,并没有从根本上让位,更没有对“机器”俯首称臣。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呢?它们还如同以往,只是受人类指令的摆布而机械地运动,还是作为功能齐全的“机器人”,独立运行,自己决策,进而可能反过来指挥人类?

让我们推想一下。当各种交叉的技术初步“集成”,使得“机器人”的功能丰富起来时,“自然人”一定还是“主人”,因为“机器人”并未穷尽“自然人”的全部体力和智力之优;当“机器人”接近或

达到“自然人”的全部功能时，“自然人”的“主人”地位就难说稳固了——“机器人”功能的齐全就意味着，它们也具有“指挥力”，而不只是“服从者”。一旦“机器人”的功能超过“自然人”，我们真的无法再设想，“自然人”还能够对“机器人”颐指气使。因为后者“牛”于前者，“自然人”指挥不动“机器人”了。

对此，有人可能嗤之以鼻。他们认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机器人”的后面，一定少不了“自然人”的操纵。事实却可能是，“机器人”发展到一定阶段，“母机器”就会出现，它将超过人的功能，自我创造和控制“子机器”，“自然人”也就不再具有管控的优势。逻辑上讲，一定存在某个终极的“母机器”，其背后是“自然人”。然而，那个机器也由于它超过了“自然人”的功能，当然地将替代人来行事，其中包括管控“子机器”。试想，“自然人”解决不了的难题，“机器人”由于功能强大给解决了，“机器人”不就成了“主人”了？不错，“机器人”是由“自然人”创造出来的。但当它“集成”了“自然人”的计算能力、应变能力和智慧时，便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成为能够独自存活和运动的“超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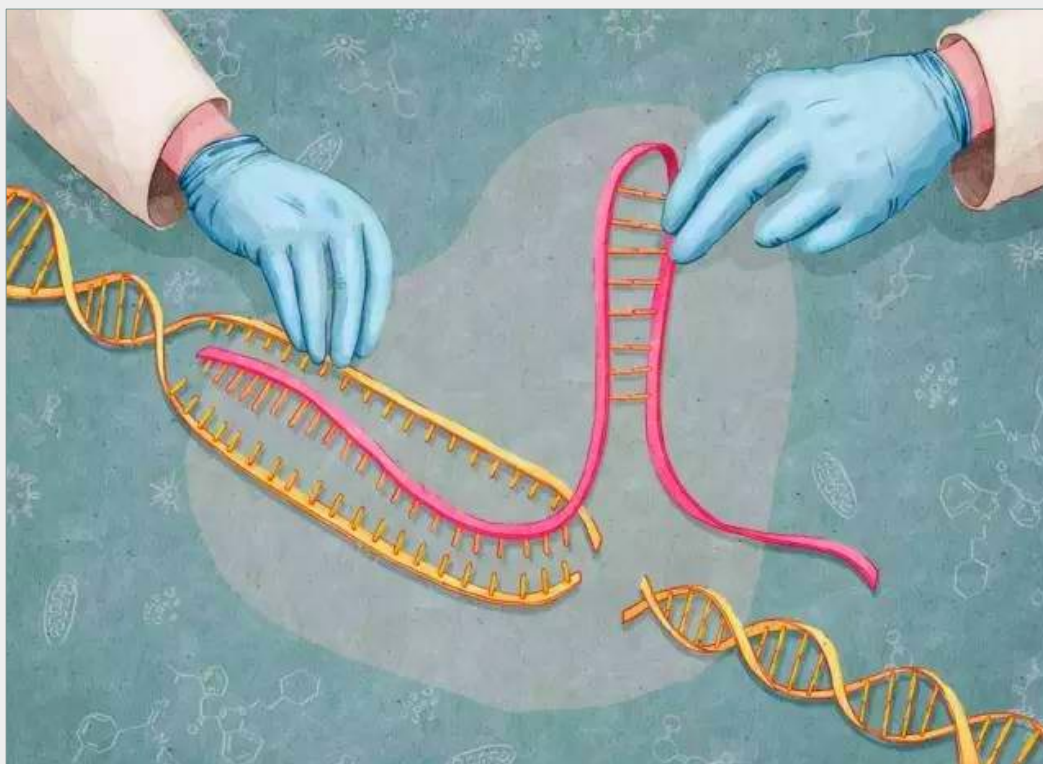


插图 Julia Yellow

以往的历史还告诉我们，伴随一次又一次工业革命的推进，“自然人”整体的功能慢慢在退化——先从体力退化开始，再在人类不断地使用自己制造的“傻瓜”设施中，开启并强化智力退化的“模式”。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里，武松只凭几口土酒，就可以制服景阳冈上的猛虎；现代人非枪即炮，否则不足以保全性命。应当说，“自然人”的体力功能已经退化得差不多了，现在正在进行智力功能向“机器人”的交付。“自然人”交付多少，自我就退化多少。在这一进一退之中，“机器人”替代“自

然人”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角，甚至成为人类的“主人”，不是可能与否的问题，而是何时完成的问题。

如果说，“机器人”还只是“集成”人的功能而超过人，那么，从基因测序、激活和编辑的技术来看，从可存活胚胎上精准操纵人类基因组，就可能创造出人为设计的“生物婴儿”来。他们就是人类，但不是男女结合的“自然人”。由于设计，他们不存在“先天不足”，体力、智力的基础优于“自然人”；生物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很容易地赋予这些“基因人”以社会历史、道德、文化等方面的信息“集成”，相比于“自然人”，他们会更富有后天的“思想”“经历”和“经验”；加上“天生而来”的强大免疫力，健康成长和寿命延长，尽在逻辑和情理之中，他们会有大大超过“自然人”的贡献时间和能量。比较，是残酷又不可回避的，“基因人”无疑将全面地优于“自然人”。

这不是科幻想象。施瓦布教授传出的信息是，基因技术发展非常迅速，目前限制其应用的，不是技术，而是法律、监管和伦理方面的阻力。施瓦布坦言，如何应对基因技术带来的现实和后果，“我们仍未做好准备”。时下“自然人”所做的，只是通过政府和社会组织把控技术，不让扩散，如同全球几个国家联合控制核不扩散一样。如果技术向前走，基因编辑类技术变得容易掌握和获取，政府和社会组织就没有办法把控了。或许，在某个日子，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传来——地球上出现了基因编辑出来的“基因人”，他们显现出的体力、智力和免疫力方面的状态，大大超出“自然人”。再往后呢？

未来的人类社会，很可能就由“自然人”“机器人”和“基因人”组成。“自然人”除了上苍造人时留下的“人性之恶”，如贪婪、恐惧和懒惰等外，体力和智力优秀的方面，不是“集成”到了“机器人”身上，就是培植进了“基因人”体内。“自然人”真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或许，恰恰是“人性之恶”，“机器人”和“基因人”并不具备，倒是成为“自然人”能够生存下来的有效武器。“自然人”通过“恶”的做法，不让“机器人”和“基因人”事事领先。但这也只是很低级的生存，“自然人”整天要与“机器人”和“基因人”进行战斗，绝对不可能是“诗意地栖居”。

有人会说，“自然人”也可以将弱、丑、恶等特质注入“机器人”和“基因人”。这是可能的。但若如此，“自然人”连“恶”的优势都没有，“机器人”和“基因人”将以坏得透顶的无限能量，让“自然人”迅速地消亡。人类曾经过高地估计过自我，否定超然的“上帝”存在，大喊过“上帝死了”。这次，就该轮到“机器人”和“基因人”来喊，“自然人死了”。两者不同的是，前者并不清楚，是不是真正存在一个“上帝”，只是自我狂妄地认为在精神上人类要替代“上帝”；后者则清楚，是实然的“自然人”创造了“机器人”和“基因人”，并且以真真切切的方式，结束了“自然人”的存在。

说到这里，作为“自然人”的我们，还能够心绪安宁？

为什么说我们是无知的？

施瓦布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是颠覆性的。在书中，他列举了到二〇二五年，二十三项人类社会可能引爆成型的新技术及其影响。秉持严肃和开放的科学态度，他在每项技术介绍后面，附加有“正面影

响” “负面影响”和“未知或利弊皆有”三个方面的分析提示。例如，在谈到“定制人类——第一个‘编辑基因组’婴儿诞生”时，他指出，“未知或利弊皆有”的影响，会包括“延长寿命、陷入讨论人类本质的伦理困境和文化转型”等方面。



在他看来，当颠覆性的革命到来时，人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技术变化的快速和剧烈，却对革命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对以“自然人”形态存在的人类社会的影响，知之有限。以智能手机为例，它几近快要消灭固定电话机了。人们惊讶、感叹并享受这样的技术进步和功能扩展时，却真不知道，如此“颠覆”的，只是把从桌子上拿起话机变成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精巧玩意儿，还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将出现断崖式变化。技术革命的直观有感，与带来深刻影响的基本无知，构成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另一幅拼图。

作为“自然人”的整体，我们现在像是温水煮锅中的青蛙。人，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就公认的理解来说，人类历史不足万年，却大到宇宙空间，小到原子质子，都探明出了一些究竟，并且“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了无以计数的“机器”。人类居然会对自己的“造物”不知影响几何，此等怪事源自何方魔力？

首先是人类的经验主义。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只是展示了人类的能量，还积淀了革命影响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经验。这种经验表明，每次工业革命都表现出辅助人、解放人、提升人创造力的功能。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当然地就一直被定位在“积极的、正面的”肯定之上。而且，每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负面问题，也是极其类似的，人类只要足够重视，就可以解决或缓和。此等经验经历时空的传播和传承，渐渐被意识形态化，浓烈的乐观情绪便弥漫到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乐观情绪又反过来，加重了经验主义的权威——关于工业革命的影响，我们内心已经有了某种恒定的评价“定式”。基于经验，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于人类的影响，不过是历次革命影响的又一次重演，虽然范围更大、程度更高和持续时间更久，本质还是对人类的辅助、解放和提升。我们又一次主动地掉进了历史的窠臼。

其次是技术进步主义。工业革命是以技术发展为特征的，在这个“主义”眼中，技术发展，不只是技术本身的进阶升级，更代表人类社会的进步，因此完全不必忧虑。换言之，任何技术都是基于人类的需要，终究也是服务人的；人类社会只会因它而更加受益——机器对于人的替代，总是在进步的意义上完善人的，不可能奴役人，更说不到取代人和消灭人了。在这里，技术就是进步的同义词。第四次工业革命说到底，是更高层级的技术革命，它所带来的，应当只有更加有利于人类社会的福祉。似乎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在技术发展出现后，通过毁灭技术，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历史上有过工人销毁机器的事情，那也只是少数人一时的对策，人类社会整体从来就没有过对技术发展任何的负面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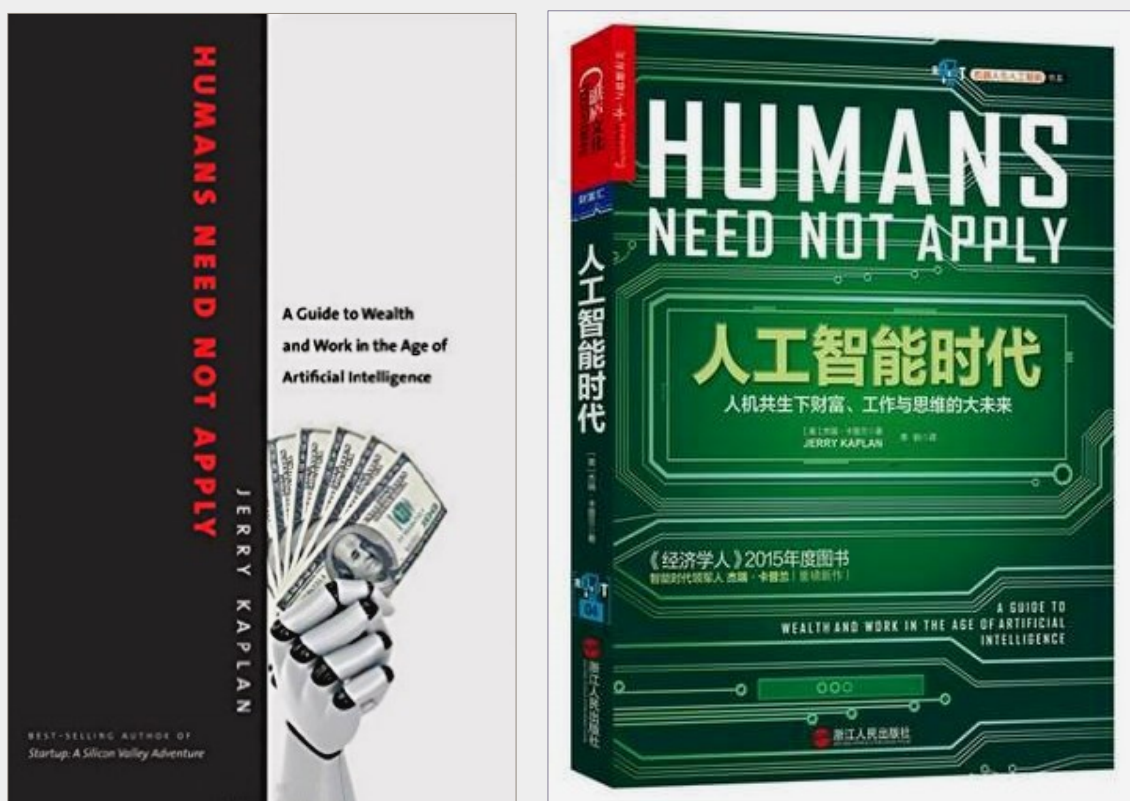


推敲下来，人类中心主义，应当是造就我们无知的终极性原因。地球之上，人处于绝对主位，一直都是人类对于世界关系的核心认知——不论自然界，还是“人造物”的世界，人，永远是它们的统治者。历史是如此，现实仍然如此，未来还将如此。对于今天“机器人”类的工业革命成果，人类当然以绝对“王”的身份出现，“机器人”神通再大，也折腾不出人的手心。最具代表性的想象是，一个张牙舞爪、硕大无比的钢筋铁骨“巨侠”正在行恶，一只纤纤小手按下关闭键，顿时“巨侠”就被控制得服服帖帖。至于“基因人”类的到来，他们也只是“人造世界”中的一员，既然人类可以制造出他们，就必定能够掌控他们，而不可能被他们所掌控。

很显然，人类中心主义之所以如此地富于信心，就在于认定那个终极的“控制开关”必定掌握在人类手中。第四次工业革命，仍然是人类制造出来的技术变迁运动，它岂能有通天神功，夺去人类的终极把控之权？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巅峰，我们当然不用忧虑。然而，新的工业革命提出的最大疑问在于，人类将自己最强大、最优质和最持久的体力和智力进行“集成”，并一步一步地转移到“机器人”身上，尤其是转移到与自己同类却更为强健和发达的“基因人”身上后，仍然认为自己还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这是不是人类自我最大也是最后的迷思？更何况，人类转移出去体力和智力优势的同时，还有弱化自身的另一个趋势伴随，那终极的“控制开关”，或许会复杂到只能由“集成”的“机器人”或“基

因人”来掌握，人类又还有什么主宰之位，又还能去掌控谁呢？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和伦理学专家，杰瑞·卡普兰教授在他的新著《人工智能时代》里，举出了人类对新工业革命“无知”的一个案例。一个油漆工和一个油漆机器人，他的思维和它的“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但人类总是以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方式，去认知机器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结果陷入了无知。事实上，人类总是按照自我意志来“由己推它”地想象“机器人”或“基因人”的“想法”和活动，那是想象不出来的——李世石九段就是基于人类思维而难以推测“机器人”阿尔法围棋的走法而告负的。可见，人类对于新工业革命的无知，归根结底，深植于人类对于自身主宰地位不可动摇的盲目乐观之中。



杰瑞·卡普兰 [美 Jerry Kaplan] 著

左图为英文原版

Humans Need Not Apply: A Guide To Wealth And Work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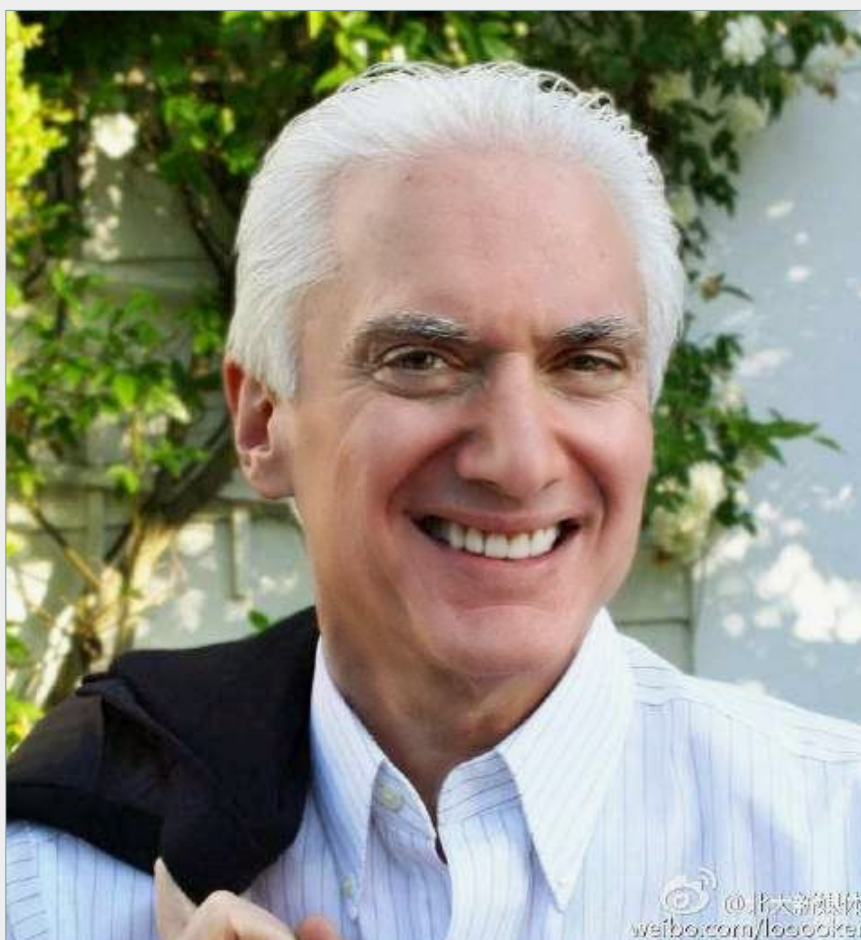
(人类无需申请：人工智能时代的财富和工作指南)，耶鲁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8 月出版；

右图为中译本，书名为《人工智能时代》，李盼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 年 2 月出版

我们又当如何是好？

无知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最大敌人。在这个意义上讲，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去无知”的历史，也是人类由无知走向有知的历史。这一点，让我们对人类的未来有理由乐观。有意思的是，人类在这样“去无知”的过程中，一边深化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一边又迷失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恰恰就是这样双重性的结果——一方面是技术知识的深化，另一方面则是技术带来影响认知上的严重缺失。如果说，前几次工业革命，人类“去无知”，主要是去掉技术上的无知，并体验、认

知技术对人类社会的直接影响，那么，这次革命所要做的，就不只是技术上的认知升级，还应当努力去革除历史沉淀下来的某些经验、知识和意识形态，以构造出新的社会影响知识。第四次工业革命是颠覆性的；我们对革命影响的认知，也必须是颠覆性的。那么，我们又当如何去颠覆既有的认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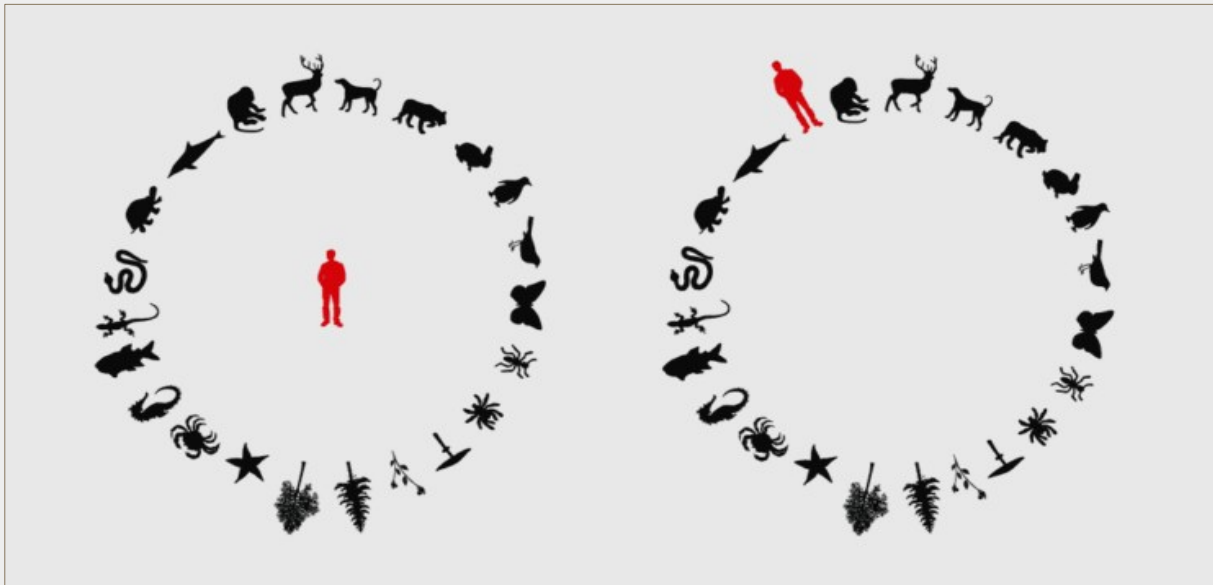
杰瑞·卡普兰 [Jerry Kaplan 1952.3.25—]

美国人工智能专家、作家、未来学家和企业家，
芝加哥大学历史与科学哲学学士、宾夕法尼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的博士，
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与伦理学教授

改变思维方式，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整个世界主义”。人类社会一直是由“二分法”的思维方式统治的，人和外部世界（即自然界和人造物世界之和）是思维中被分裂开来的两个最基本元素。人和外部世界的长期共生共存，本来是相互依赖和相互扶助的关系，却由于人过于看重自身的能量，外部世界又的确不具备主动的对抗性，助成了人的主宰之位。而人又在对外部世界施加随心所欲的改造中，膨胀了自己的霸主意识，弱化甚至失去了对大自然的敬畏，更不将自己创造出来的物件放在眼里。“二分法”的思维方式，自然而然地导引出了“人类中心主义”。

这次工业革命的初步成果，已经预示了“二分法”思维的困境。即使只在人的群体里，也将出现“机器人”“基因人”等新新人类，和我们这些“自然人”比肩并行，人类原有的思维方式已经无法面对如此场景了。实际上，每次工业革命的负面成果，都冲击过“二分法”和“人类中心主义”。大自然

出现的环境污染、地球升温、怪异病毒等现象，以及人类社会的失业、贫富差别和经济危机等，直指人类思维方式的偏颇，痛诉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明示人类在一种无知的狂妄之中，从事着自我残害的蠢事。但由于人类整体理性的孱弱，特别是各种问题的累积并未达到危险的“阈值”，思维的冲击之波被人类主宰世界理念的巨潮所吞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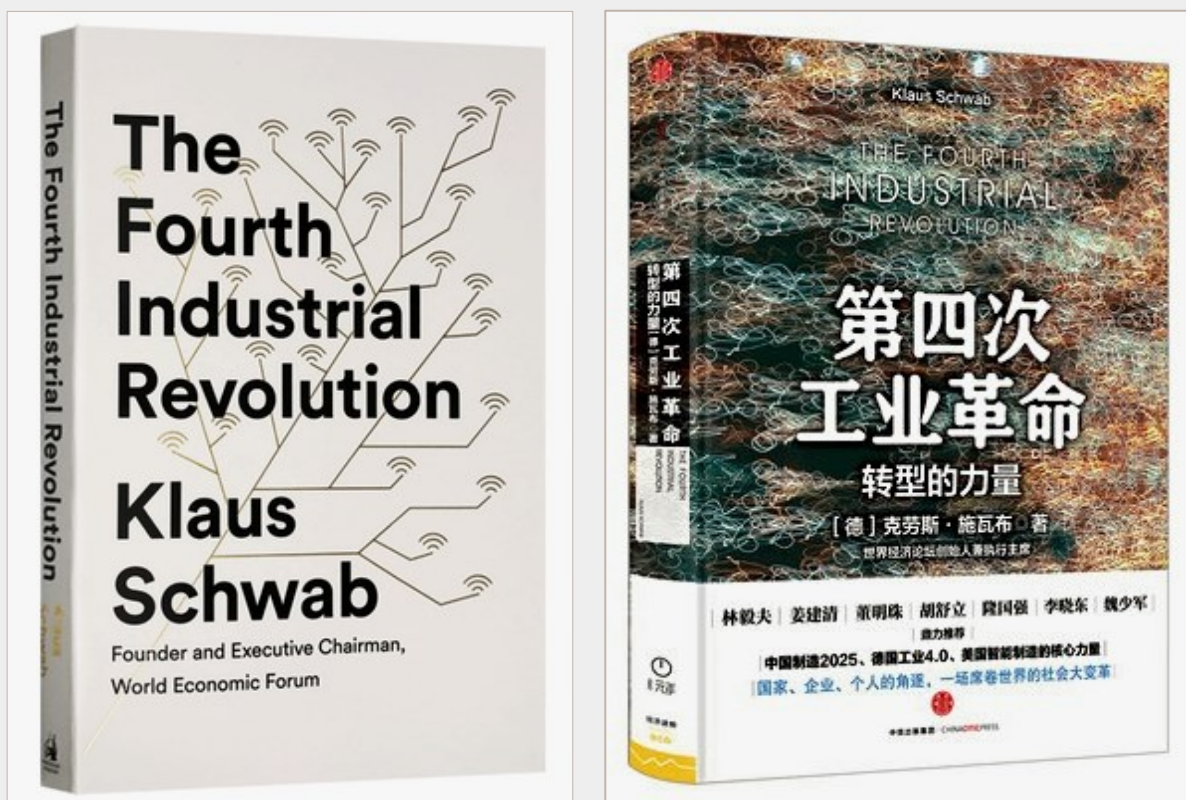


本次工业革命的狂飙，再次猛烈地撞击了既有的思维方式，在以往革命累积的问题或将危及人类生存和生活之态时，隐隐约约昭示了另外一种方向，即“整体世界主义”的思维方式将“自然人”作为世界主宰的地位卸除，仅仅作为一个平等的元素，放置在整体世界的范围之中来看待，重新理解和建立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让人与大自然和人造世界平起平坐。由此看来，改变思维方式，不只是说有必要，新工业革命的现实，也创造了可能。

重新认知技术进阶升级。在历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阶升级问题上，我们从来都是迷思者。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思维，将任何的技术进阶升级，都视为助益于人类的工具进步。而且，技术越是进阶快速，越是升级超强，越是纵横交错，人类由此得到的助益就越是被认定为巨大。历史也的确展示过这样的一面：在技术进阶升级带来“机器代替人”的前几次工业革命中，技术始终是掌握在人手中的工具，“机器”真实地助益了人类的生存和生活。但与此同时，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毒品、电脑病毒等等的技术进阶升级，却是整体上加害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这样的技术越是先进，对于人类整体上的加害，越是强烈和彻底，越是危及人类整体的存在。历史上的每次技术进阶升级，都显示过它有益和有害的两面性，我们则只知其一，而不知或不愿意知其二。

这次工业革命中的技术进阶升级，已经为当下社会深刻感知。对其是“有益”还是“有害”的理解，从某个视角上看，已经由不得我们只讲“助益”而忽略“加害”了。这是因为，本次“集成”式的技术叠加进阶升级，“助益”和“加害”也叠加到了一起，人的主体地位受到了严峻挑战。从“机器代替人”上讲，一方面，“机器人”和“基因人”的完整形态出现，将全方位地代替我们这些“自然人”来劳作，

将使“自然人”享受无须多少体力和智力付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这种代替表明，“自然人”不再需要劳作，也就不再具有任何自我生存和生活的能力，从依赖“机器人”和“基因人”，走向依附他们。这不就是实质意义上的被取代或被奴役？这离“自然人”的末日，又还能有多远？技术进阶升级的“双刃剑”特性，在这次工业革命中，已经大为显露，还将以更为丰富的方式表现出来。现在是重新认知技术进阶升级的时候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技术只有“助益”而无“加害”的片面认识，必须彻底予以抛弃。



左图为英文原版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

Portfolio 出版社 2017 出版；

右图为中译本，中信出版社 2016 年出版，

[德]克劳斯·施瓦布 著，李菁 译

重塑人类全新的、共有的道德良知。由史而今，人类社会整体的道德良知，基本上是与技术的进阶升级相匹配的。虽然经历了许多的血雨腥风，人类终究还是成长和成熟起来，在某些重大技术进阶升级发生时，尚能撮合起共有的道德良知，抵制和抑制技术基础上人类的疯狂。如核技术的进步，就是最好的一个案例。然而，人类社会远没有走上从人类整体的视角来建立道德良知的道路，民族、国家、团体、派别等的历史性存在和发展，让这样的人类理想，仅存在于一些思想者的脑海中。人类社会历史更多展示出来的，是人类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冲突甚至毁灭性的战争，道德良知大多从本群体利益出发，具有强烈的群体个性色彩。就是那种“撮合起来”的共有道德良知，通常也只是针对具体问题而来的短暂性规定，要么昙花一现，要么只是约束很小的范围。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以超越地域、民族、国家、政治团体、宗教派别的态势，在向整个人类社会发出新的挑战。“自然人”“机器人”和“基因人”等之间的冲突，很可能超过当下的民族、国家等之间的冲突，因而预示了人类社会一个自我超越时代的到来。这应当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具特色，也最有价值的地方。我们这些“自然人”，如果不想在这次工业革命中，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就必须适度地放下“自然人”内部的争斗，从整个人类的视角，塑造全新的、共有的道德良知，摈弃前嫌，团结起来，面对整个人类新的对手。可以想象，面对如此革命，没有一种主流的、共有并且是强有力的人类价值观或普世道德出现，技术进阶不仅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相反，那一定是人类社会的倒退或灾难。

早期的工业革命，让人类社会分裂出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代表，为了整个人类的平等和最终的解放，马克思曾历史性地呼喊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今天，人类社会将出现“机器人”和“基因人”等“新人类”，为了整个人类的命运、和谐和幸福，我们在此也想大喊一声：全世界自然人，联合起来！

[【返回目录】](#)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一. “云豹沙龙”简介

中评网/中评周刊作为网络媒体平台和学术-社会的沟通桥梁,每年都会就热点问题举办四、五期小型沙龙/研讨会,邀请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热点问题展开客观理性的分析向社会公众介绍知识界的专业观点和深入交流。小型沙龙通常为期半天,主题涵盖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国际事务等领域。曾举办的有代表性的沙龙诸如:

- 2011年3月,「**城市发展和公平正义**」研讨会,讨论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首经贸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刘业进等。
- 2012年3月,「**遏制部门立法 保护公平正义**」研讨会,聚焦于行政部门主导立法导致的部门本位问题。参会学者包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干帆、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田飞龙等。
- 2013年4月,「**铁路改制:问题、展望与出路**」研讨会,于铁道部改制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之际举办。参会学者包括: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荣朝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等。
- 2014年9月,「**邓小平与中国**」研讨会,于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举行。参会学者包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负责人李胜平、著名历史学家章立凡、《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等。
- 2015年10月,「**股市行为与市场规则**」研讨会,讨论2015年股灾成因及教训。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等。

二. 众筹方案

2018-2019年度,中评网/中评周刊将延续往年“云豹沙龙”年度系列沙龙活动。为此特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以筹集沙龙的组织资金。

1. 众筹目标: 3 万元 (2018-2019 年度 4-5 场沙龙的总经费)

2. 众筹资金将用于:

参会专家交通费和劳务费

会议场地、茶水费用
会议专业速记费、摄影摄像成本
会议资料编辑费
会务组织劳务费

3. 众筹回报：

1) 面向社会听众：

支持 100 元：可获得本年度系列沙龙中任选一期完整发言稿（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400 元：可获得当年五期沙龙的完整发言稿（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800 元：可获得本年度五期沙龙的听众入场券（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2) 面向内容合作方：

支持 8 千元（每期沙龙仅一位）：获得一期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可共同协商拟定该期沙龙的议题；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的独家报道权；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获得并使用该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支持 3 万元（全年仅一位）：获得全年系列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可共同协商决定各期沙龙的选题；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各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获得并使用各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4. 社会听众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至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账号：861581962310001（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
汇款附言请注明“参与沙龙众筹”+您的姓名+您的手机号或您的电子邮箱。主办方核实款项后将通过您预留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

5. 内容合作方联系方式：

内容合作方请洽陈女士商谈合作详情。

联系方式：wistom113@163.com, 13717696284。

6. 说明：

如因各种原因,2018-2019年度沙龙活动不足五期,则参与众筹者的权益将自然顺延至下一年度。
感谢您的浏览! ■

[【返回目录】](#)

中评周刊邮件订阅方式 | 读者来信: chinareview2000@gmail.com

电话联系方式: 13717696284 15011147717

您可以在以下地址下载往期中评周刊:

Dropbox:

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

Onedrive:

<https://1drv.ms/f/s!AtpheKM9vX8Zaay8vB8f0joiCdo>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nGlllI-5ehNtyrler9dKw> 密码: t9ed